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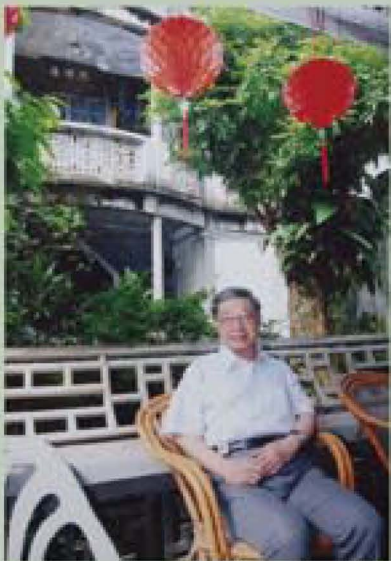
曾宪通 著

黄生有、陈真重

花城出版社

# 送中訪古留影 饒學管窺





2010年作者摄于潮州饶氏旧宅之天啸楼

曾宪通，1935年生于广东潮安，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从容庚、商承祚两先生治古文字之学，主攻战国秦汉文字。1985年起任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汉语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兼职曾担任国家社科规划语言学科组成员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合著）、《曾宪通学术文集》、《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及教材《汉字源流》（合著）等。

送中訪古留影  
饒學曾觀



曾宪通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中國·廣州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逸堂访古图影与钱学管窥 / 曾宪超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560-6748-6

I. ①逸… II. ①曾…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钱字—古文字学—研究 IV. ①I25②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8663号

封面题字: 倪宗明

出 版 人: 唐秀敏  
特邀编辑: 陈韩联  
责任编辑: 唐秀敏 李 颖 杜小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李梅  
装帧设计: 王 端

---

书 名	逸堂访古图影与钱学管窥 YI TANG FANG GU TU YING YU QIAN XUE GUAN KU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岭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1.5 1插页
字 数	160,000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图书热线: 020-37601658 3760236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hcph.com.cn>

## 目 录

- ◆ 夔府揽胜图 选堂
- ◆ 题选堂《夔府揽胜图》诗 陈永正
  
- ◆ 选堂访古随行纪实 1
- ◆ 我所认识的饶宗颐大师 71
- ◆ 大师的童心 87
- ◆ 治学游艺七十春——贺饶宗颐教授“米寿” 90
  
- ◆ 《选堂集林》读后 102
- ◆ 选堂先生与荆楚文化研究 104
- ◆ 神秘的楚帛书 119
- ◆ 选堂先生与楚帛书研究 123
- ◆ 选堂先生“三重证据法”浅析 145
- ◆ 选堂先生学艺领域的新飞跃 155
  
- ◆ 读选堂尊翁《饶锸文集》有感 160
- ◆ “饶学”之根在潮州 172



## 题选堂《夔府揽胜图》诗

画道无方不可言，  
澄神独造范乾坤。  
有情终悟菩提近，  
忘我能教气象尊。  
胸次崔嵬思滟潏，  
心中风雨过夔门。  
九州百世寥天一。  
谁与苍茫问古原。

经法先生属题选堂《夔府揽胜图》诗

庚申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先生随饶公北游访古，自广州飞抵成都，经兰州西入敦煌，留莫高窟数日。复东行至东西二京，凌中岳，谒少林寺。赴郑州，寻殷墟遗址，于小屯摩挲甲骨。遂南还武昌，拏舟畅游三峡，揽夔门诸胜。后复至北京，历济南、曲阜、南京、扬州、镇江、无锡、常熟、苏州、上海、杭州、衡山各地，及冬暮始归。计程万余里，历时三月。饶公返香港后图成此卷以赠宪通先生。

壬辰立冬 陈永正敬识

## 选堂访古随行纪实

1980年深秋，饶选堂（宗颐）先生应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的邀请，在往成都出席第三届古文字学术年会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历时近三个月，行程达数万里。在这次旅行中，饶先生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量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兴奋异常。回香港后特意请名家冯康侯先生用顾炎武名句：“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刻了一方印章作为纪念。笔者有幸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行人员全程陪同，深感饶先生不但学问渊博，而且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几乎一景一物都对他有无穷的吸引力，常常有精警的发挥，使同行者备受教益。先生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这近三个月的旅行和考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在内地作如此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也是他人生中在学术和艺术领域内一次很有意义的实践和升华，是值得细细回味的。值此先生喜逢“米寿”之际，谨据笔者记忆所及，略加整理，题名为《选堂访古随行纪实》，以为先生贺寿。

**广州** 1980年先生继欧洲、日本之行后，于9月20日从香港乘直通车到广州，住广东迎宾馆。当天会见了广东省高教局林川局长，广东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研究》主编杨越先生。第二天，与中山大学赴成都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一同乘机前往成都。



**成都**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于9月21日至27日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次会议有不少海外学者参加，尤其是日本学者来得最多。年会的热门话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卜辞的分期，二是卦爻的辨识。卦爻问题是继第一、第二届年会上讨论的热潮而有新的发展。在本届年会上参与讨论的有管燮初、张政烺、张颢、刘雨和饶宗颐先生等学者。饶先生宣读的论文题为《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后刊于《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一方面对管先生的《商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一文提出了补充意见，另一方面比较了马王堆帛书本《易经》和汉“中古文本”《易经》的异同，并高度评价了马王堆帛书本《易经》的价值，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马王堆帛书《易经》整理者张政烺先生说：“饶宗颐先生论文中对帛书《易经》卦序的推测完全正确，符合实际。帛书《易经》中假借字特别多，可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根据师承口说记下的，别字连篇，对研究当时的语言是一篇非常有用的材料。饶先生根据一片帛片，就写出这篇质量很高的文章。是研究帛书《易经》的第一篇论文，是非常了不起的。饶先生既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学问是非常渊博的。”

研讨会于9月27日上午举行闭幕式。下午，文物出版社派郑昌政先生从北京专程到成都来迎接选堂先生，开始为期近三个月的神州之旅。28日上午8时35分，我们一行三人乘146次“成兰直快”离开成都。

**兰州** 饶先生这次自费旅行所带的行李十分简单，但却随身带有《徐霞客游记》和《杜诗镜诠》，常常在列车上不时翻阅。在向兰州奔驰的列车上，先生总是喜欢离开软卧车厢到走道上来，隔着车窗看野景；当列车穿山越岭的时候，他总是留心观察峭壁上有没有留下古栈道的痕迹，想象当年李白、杜甫入川时的情景，寻找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

29日上午10时抵达兰州。在我们到达之前，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已行文到饶先生所经各地的文化局、文物局或文管会，请为协助接待饶先生和安排参观事宜。故在先生抵达时，甘肃省文化局乔南先生即到站台

迎接，下榻友谊宾馆，住后座二楼，并落实从柳园至千佛洞的交通与参观活动。

下午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会见了陈炳应馆长。饶先生对博物馆的藏品都有极大的兴趣，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近代的民间抄本，他都要仔细地观察、琢磨。甘肃省博物馆藏品有两大特色：一是彩陶多。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存已知有各类遗址1000多处。包括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等，出土了大量的彩陶，不但展厅里展出了色彩浓艳、体态各异的彩陶，仓库里也到处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彩陶，令人目不暇给。二是简牍多。甘肃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开辟河西走廊为中西交通要冲之后，一直成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故汉代遗址遍布全省，出土了一批批重要的文物。如武威、甘谷发现的汉代简册，中有《仪礼》、《十王杖》、医方药简以及优待宗室诏书简等。特别是居延地区发现的两万多枚汉简，则是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饶先生还应邀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观，看到排列密集的架子上堆满着一盒盒的简牍，工作人员正根据照片做分类整理工作。据了解，这批简牍是1972—1976年对居延地区的甲渠侯官遗址及第四燧与肩水金关所作的发掘时发现的。绝大部分是木简，竹简极少。计有简、两行、牍、检、符、觚、签、册等，内容非常丰富，已初步整理出70多个簿册，如诏书、律令、牒书、爰书、军纪、赏罚、名籍、兵器、奉廩、钱粮簿等，都各有一定的行文程序和文牍格式。其中有纪年的简达200多枚，上到西汉武帝，下至东汉初年，而以宣帝时期的简最多。先生后来有关汉简，特别是王莽时代的简牍论作即得益于此。

晚上乘车游览兰州市容，并步兰州黄河大桥，登北塔山公园，9时方归。

9月30日上午8时19分乘52次“沪乌直快”离开兰州，前往敦煌。

**敦煌** 从兰州到柳园，列车运行24小时。当列车在河西走廊上奔驰，武威、张掖、酒泉、玉门，一座座城市从车窗前掠过，作为诗人的

饶先生心潮澎湃，他玩味着唐人的有关诗作，像骑上骏马，在“丝绸之路”上来回飞驰。可是“西出玉门”之后，人烟稀少，偶尔有一两个“土围子”出现在一片沙砾之中，已经进入大戈壁的范围了。列车于10月1日上午8时14分抵达柳园。由甘肃省文化局通知敦煌县派车到柳园来接饶先生，为了减少先生旅途的疲劳，这次派来的是一部绿色的小轿车。小轿车在沙漠上飞奔，先生毫无倦色，一直在等待着据说是沙漠上常见的海市蜃楼的出现；但只见远处有一片湖泊，虚幻朦胧，似是而非，可望而不可即，始终不能满足心中的欲望。偶尔见到沙漠上的骆驼群，先生便让司机把车停下来，走近骆驼群照相留念。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于中午抵达敦煌县城，夜宿县招待所。这里还没有专用于招待外宾的宾馆，似乎饶先生是第一位从境外来到这里住宿的客人。不过还算安静和清静。饶先生生活上非常简便，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是最容易侍候的。过去先生在国外亲手摸过多少遍敦煌卷子，现在第一次在敦煌过夜，尽管条件并不尽如人意，可精神却格外兴奋。敦煌的夜晚要到9点多钟才天黑，县城只有一条长街，我们便一直在街上踟蹰。偶尔天上飘过一阵乌云，脸上虽有雨点的感觉，地上却一点湿的踪影也没有。

**莫高窟** 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深藏于一条山沟中，周围有林木覆盖，呈绿色条带嵌于荒漠之中。洞前有大泉河，属间隙散流水沟，河床早年流经千佛洞侧，沿河自北至南布满洞窟，绵延二三公里。从敦煌到莫高窟大约需要二三十分钟的车程。因为每天的交通工具无法保障，只好在莫高窟的敦煌研究所临时找个地方住下来。这样，对饶先生来说更加是求之不得的了。莫高石窟工程开始营造于东晋永和九年（353），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直至宋、元，历代增修。在莫高窟接待饶先生的除敦煌研究所负责人段文杰和樊锦诗两位先生之外，还有施娉婷女士。当即由施女士陪同游览大泉、鸣沙山。饶先生又写诗，又作画，兴致勃勃。晚宿莫高窟招待所。

第二天由施娉婷女士陪同参观千佛洞。这里现存洞窟550余座，其中492座存有精美、细致的壁画和塑像，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饶先生

看了其中30多个。次日又入洞看了20多个，前后共看过五六十个。记得1978年初夏在西安参加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之后，笔者曾与麦英豪、陈振裕二兄同游敦煌，几乎跑遍千佛洞所有的洞窟，结果没有留下多少印象。这次有施女士导游，饶先生讲解，专找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洞窟参观，学到不少相关的知识，留下深刻的印象。施女士还特地带饶先生参观当年（1900）王道士发现的藏经洞。据介绍，藏经洞中保存着自晋至宋包括近十个朝代的各种历史文物和文书约三万多件，除大量的唐人写经和画卷之外，还有买卖契约、借贷典当等文书，涉及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等内容。除汉字外，还有古藏文、梵文、回纥文、龟兹文等，并有抄本、雕本、印本各类品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形成了国际著名的敦煌学。可惜大部分已在发现后不久为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运往国外，但国内尚有一些剩余，中有不少重要资料。接着施女士陪饶先生到研究所阅览敦煌经卷，下午又乘车到敦煌县城，参观了敦煌博物馆收藏的写本和烽火台的其他遗物，收获颇丰。

饶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敦煌学大家，早年即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之作，其后又在法国与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amieville）教授合著《敦煌曲》（于1978年在巴黎出版），及出版《敦煌白画》《敦煌本文选》等著作，为敦煌学研究增添异彩。前不久又为日本二玄社编纂《法藏敦煌法书》29册，在国际敦煌学界享有盛誉。先生这次到敦煌来作实地考察，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通过参观有代表性的洞窟，了解不同时期敦煌绘画的整体结构和特色；二是具体了解没有流失国外的国内藏卷的情况及其实物资料；三是考察敦煌白画与整个敦煌艺术的关系。饶先生是对敦煌白画进行系统和专题研究的第一人。所谓敦煌白画，是指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画中的各种白描画。这些白描画，有的是洞窟壁画的底稿，有的是佛经故事或变文的插图，有的是用于供养的佛教尊像，甚至是画工的信手练笔之作。先生将它们分成人物画和动物画两大类，结合中国古代白画资料，探讨敦煌白画与敦煌画风的关系。尤其是对敦煌白画所反映的若干“技法”，先

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和分析，在敦煌白画艺术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这几天的参观活动，先生真切地认识到要研究藏经洞的白画资料，必须同敦煌石窟的壁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几乎每个洞窟，每卷画卷和经文，都对饶先生产生无穷的吸引力。在离开千佛洞前夕，先生作《莫高窟题壁》诗云：

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10月4日乘小车离开莫高窟和敦煌县城至柳园，于12时30分转乘72次“乌郑直快”离开柳园赴西安。5日（星期日）整天在火车上。

**西安** 10月6日清晨抵达西安。陕西省文物局办公室马振民主任和博物馆薛铸同志到站迎接，下榻人民大

选堂在西安  
参观唐永泰公主  
墓



厦。西安古称长安，是我国历史上建都较久的古城，几乎遍地皆有文物古迹，是古代文化遗迹、遗址和遗物荟萃的地方。当天即参观陕西省博物馆，由该馆青年书法爱好者薛铸作陪。这里原是一座文庙，陈列以周、秦、汉、唐文物为主，而以西周青铜器尤具特色。下午在碑林欣赏历代书法和碑刻，摘录了一些材料。中午在东亚饭店吃包子，先生还被薛铸邀到家中喝茶并挥毫。晚饭后，饶先生和我到住处附近的人民广场散步。在回宾馆的路上，小铸急匆匆地跑来对饶先生说：“我有个请求，不知先生能否帮忙？”先生关切地问：“什么事？”小铸说：“我家需要一台缝纫机，但只有友谊商店才能买到。我们已备好买缝纫机的外汇券，想麻烦先生到店里帮我们买下。”先生表示同意说：“商店离这里远不远？”“不太远。”“有车子吗？”“有。”小铸很快从路旁推来一辆自行车，来到先生跟前，用手拍拍自行车的后架说：“请先生坐上来吧！”先生愕然。

选堂在西安  
参观唐章怀太子  
墓





选堂在西安  
考察唐章怀太子  
墓壁画

我连忙阻止道：“这成何体统？先生从来就没有这样坐过，万一出事，你担当得起吗？”先生看着小铸一副沮丧的神情，便又说道：“走路来得及吗？”小铸连声说：

“来得及，来得及，只要走快点就一定来得及。”就这样，小铸推着自行车在前头快跑，我和饶先生在后面紧跟。来到友谊商店，只差一刻就九点钟了。当即凭饶先生的护照办了买缝纫机的手续，待到把缝纫机搬上自行车，商店也就关门了。回到宾馆，小铸挨了国家文物局郑昌政先生一顿严厉的批评。然而，饶先生这位大学者急人所急、助人为乐的精神却深深地感动着每个人。

第二天驱车临潼，沿途参观半坡遗址，华清池。在华清池用餐时，先生问服务员：“洗手间在哪里？”服务员说声“请稍等”，便端来一盆清水，弄得先生不知如何是好。可见当时内地仍处于封闭状态，接待部门对境外这种委婉说法还不了解，才弄出这样的误会来。下午参观临潼博物馆、秦始皇陵和秦俑坑，先生对秦俑坑

赞叹不已，说“作为陪葬的队伍竟如此壮观，当日的盛况更是可想而知了”。第三天参观乾陵、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壁画，在乾陵用餐。下午到咸阳市博物馆参观，该馆与临潼博物馆各具特色。再回西安参观小雁塔、大雁塔，见到许多有关唐玄奘的材料，先生向有关部门建议作一《塔志》。夜，先生作《荐福寺》（原注：旧为义净译经处，小雁塔在焉）诗云：

唐都双塔著高标，相去慈恩一里遥。  
膜拜遐方还踵接，象胥译事已冰消。  
空余行纪传天竺，想见驮经越灞桥。  
落日古槐人迹少，西风台殿叶萧萧。

又步杜甫韵作咏塔诗——《登慈恩寺塔次杜韵》：

发迈自岷陇，我行殊未休。  
顾瞻千里原，莽荡已忘忧。  
四塞有山河，古迹难尽搜。  
塔势可撑天，凿险更缒幽。  
万国争登临，声教东西流。  
俯窥一气青，蒙蒙值残秋。  
汉武拓河西，宛马复可求。  
西胡断右臂，荐草入吾州。  
太宗置安西，突厥安足愁。  
耽耽强邻迹，尚阻昆仑邱。  
登高感喟生，凌虚足可投。  
向来论形势，所贵在人谋。

9日上午8时30分乘180次列车离开西安。饶先生本拟顺道登游西岳华山，因闻华岳悬空断链，伤及游人，只好作罢。



**洛阳** 10月9日下午4时抵达洛阳，住洛阳友谊宾馆。洛阳素称“九朝之都”，地上地下文物不计其数。次日由龙门石窟保护所李小妹小姐陪同，参观伊阙龙门石窟。除著名的宾阳洞和奉先寺外，还到伊水东参观香山寺及附近三石窟。下午由洛阳市博物馆陈新先生和王城公园马爱君小姐陪同，到洛阳博物馆和王城公园参观汉墓及汉画艺术展览，至18时55分才回到宾馆。第三天原计划到登封少林寺，临开车时接到电话，说大雨不能通车，只好改到白马寺参观。白马寺是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个寺院，山门正中门额上嵌有“白马寺”石匾，是明嘉靖年间司礼监太监黄锦所立。饶先生说：“海阳人亦有一位名叫黄锦的。”先生仔细地考察了寺里目前仍保留着的三块北宋的石碑，还有清代著名和尚如琇的许多碑记，感触良多：先生记起齐云塔也有两块宋碑和一块金碑，遂建议导游带着大家来到齐云塔，真是大饱眼福。接着又到汉魏故城参观狄仁杰墓以及灵台、辟雍、太学等著名遗址。下午回宾馆休息，饶

选堂与龙门  
石窟保护所工作  
人员合影



选堂与郑昌  
政、曾宪通在龙  
门石窟奉先寺



选堂在洛阳  
王城公园



选堂在洛阳  
白马寺前留影



先生诗兴大作，成《白马寺三景和释源如琇原韵》三首：

其一：清凉台

珙琅礼器尚玲珑，曾是龙川兜率宫（原注：女真人龙川和尚元大德间开山于此，壁间嵌其遗嘱记）。犹有天禧遗记在，低徊苍桧立冥蒙。

其二：齐云塔

选堂在白马  
寺考察北宋名碑



耶律铸碑在此间（重修白马寺塔记为金大定十五年耶律垂立石），落星高塔不能攀。欲寻坏壁余秋草，白马何年绕碧峦（旧传寺壁画绘白马成群，绕塔悲鸣）。

### 其三：腾兰墓

衣冠设冢壮山隈，汉殿长年掩绿苔。不及二僧名字在，西来榆<sub>叶</sub>久成灰（此处有焚经台，如琇句云“榆<sub>叶</sub>其文是亦非”）。



选堂在白马寺宋碑前留影



选堂在蒋若是局长陪同下参  
观洛阳关林



12日上午由洛阳市文化局副局长蒋若是先生陪同参观关林。关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破坏，现正在修复中，本不开放，故须由领导特许方能进入。当时正是雨后放晴，庭院遍地堆满邙山出土的唐宋墓志。先看三大殿，两侧殿准备陈列石刻和墓志，估计有三四百方。据蒋先生说，洛阳出土的碑志约有五千多方，现存一千多方在洛阳，其余散在各地，如加以集中，确是一个大博物馆，其中保存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可补正史之失。当时饶宗颐先生正协助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整理该院收藏的中国唐宋时代墓志拓本，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一书（此书已于198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故对蒋先生的介绍倍感兴趣。下午游邙邙山。汽车沿公路盘旋而上，至山顶一片平地，真是“上山不见山”，整个洛阳城就在脚下。四周望去，邙邙山东连龙门山，西接嵩山、绵延至大别山，中间一席平原。饶先生说：“此处登高望远，气象万千，难怪周公当年即选定此地经营洛邑。”东眺上清宫，为当年武则

选堂在关林  
参观洛阳出土墓  
志





选堂在陈  
新、马爱君陪同  
下在洛阳魏王墓  
上远眺

天避暑胜地。顺访魏王墓，虽不甚高，但雨后路滑，须互相援手牵引，方能攀登。远眺四方，顿觉心旷神怡。大家纷纷在墓顶留影纪念。

13日上午10时30分乘8 / 11次“成沈特快”离开洛阳，经登封、巩县，前往郑州。

**郑州** 10月13日下午3时到郑州。河南省博物馆裴明相先生到月台迎接，下榻于中州宾馆。稍事休息，即出发参观商代古城，由杨意彬先生负责讲解。在古城址适遇文物出版社金冲及、俞晓尧两位先生。晚上饶先生打电话回香港报告行程，我到郑州大学拜访张静副校长和崔灿先生，打听到中国语言学会开会的确切消息。次日上午参观郑州市博物馆，遇张松林先生，并由他陪同参观大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看到1~4号房基、基础及墙壁残部十分清晰，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这是当时建屋的



选堂在张松林陪同下参观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一道重要工序。因其地层可以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连贯起来，是一处十分宝贵的考古遗址。时逢雨后遍地泥泞，车不能进，只好步行，但地湿路滑，如履薄冰，至中午12时30分才回到宾馆。下午由裴明相先生陪同参观河南省博物馆。馆藏展品十分丰富，尤以各种品类的文字资料最具特色，还有不少新出土的材料尚在整理之中。从河南发现的考古文物来看，夏代文化的确大有研究价值。从他们把传说中的夏代迁都地点同早商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某些早商文化确有夏代文化的特性。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几乎自夏商周至秦汉，都有丰富的文化遗存，由此证明中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少林寺** 10月15日一早，由郭建邦先生陪同到登封



参观少林寺。驱车至登封县城，趁着天气尚好，饶先生建议立刻上山。只见太室、少室二山环抱，气势雄伟。因山路崎岖，不得不换乘旅行车在山道上盘旋爬行，仍然颠簸不已。直至进入深山密林之中，寺庙即出现在转弯处。门额上赫然出现“少林寺”三个大金字，乃康熙御书。入门便见五进间，两边碑刻林立，中有李世民、武则天御书各一石，十分珍贵。余者以禅宗派系谱录最多，而以明碑为盛，从中可见明清时代少林寺的盛况。惜遭军阀石友三放火焚烧，破坏极为严重。大雄宝殿至

选堂在嵩山  
少林寺



今只剩遗址，后殿尚大致完好，如清代壁画“少林寺拳术图”及“救李世民图说”等，都保存甚好，并正在修葺中。中午在招待所用餐，遇张颌先生，并一起欣赏香港演员表演武术，拍电影《少林寺》。下午参观中岳嵩山庙。庙宇整体建筑为五进间，前有汉阙，后有黄盖峰亭，前后相隔达2000米，内有宋刻三碑，铁人四品，其中以汉阙所存汉石刻碑最为珍贵。可惜因时间关系，不能到周公观星台及嵩山书院参观，只好归去。途经密县大虎亭村，参观汉墓二座，一为壁画墓，一为浅雕石刻画墓，规模空前，令人叹为观止！

**开封** 10月16日清晨由郑州驱车至开封，由开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先生陪同参观开封铁塔、龙亭、相国寺、禹王台及繁塔等四处古迹。饶先生知道我在1961年陪商承祚教授到过开封，问我有什么变化。我说，铁塔、龙亭还是老样子，相国寺当年是个市场，沿街唱戏叫卖，人群熙熙攘攘。回看今日两边盖起新建筑，殿庙

选堂在开封  
参观铁塔





选堂在开封  
参观古吹台

正在修建中，其中八角殿整个提高地层1米，看来工程不小。饶先生说，繁塔是三国时繁钦住过的地方，后五代在此修塔，原有九级，今只剩下三层，但高大巍峨，可以想见当日的雄姿。先生指出，开封是宋代盛都，现在地上的文物所存无几，令研究宋史的学者无限感慨。午饭后驱车至花园口，这里是黄河河面最宽的地方，与兰州河面相较，自有天壤之别。每逢汛期，这里十分壮观。可惜我们到河岸上看时，只剩中间一线河道可以通航，很不过瘾。此处引河灌溉成绩十分显著，难怪我们

在开封可以吃到香喷喷的大米饭，比南方的粳米更加诱人。

当晚19时15分乘2次“长京特快”离开郑州赴安阳。

**安阳** 10月17日晨到安阳，安阳市文化局局长及博物馆四位领导前来迎接，住安阳宾馆。上午参观殷墟研究所，由杨锡章所长介绍安阳发掘情况，接着参观陈列室。饶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甲骨文，出版《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始创以贞人为纲研究卜辞内容和时代的体例，在国内外很有影响。这次来到安阳，便急于到小屯村和洹河两岸凭吊殷人，当即驱车到小屯村口大路边当年发现大批甲骨的小屯南地和妇好墓地照相留念；又特地来到洹河边，看到这条数千年的古河依然静悠悠地流淌着，可惜河水已被污染得不像样了。下午参观市博物馆，该馆设在袁世凯的陵墓内，其实是袁氏发迹史的展览馆，文物大多是复制品，却也十分丰富。墓道上有石人、石马，整个墓冢不古不今，非中非洋。墓冢上的土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铲平，石块被推到小树上，十多年来，树和石头盘根错节，更加显得不伦不类。最后登上了文峰塔（又名天宁寺塔）。这座在五代建造的古塔，上大下小，结构特殊而牢固，令人叹服！在陪人的导引下，饶先生和大家一道，一口气登上塔顶，眺望安阳这个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当晚饶先生和我乘141次列车赴武昌，郑昌政先生先返北京。

**武昌** 列车于18日晨抵达武昌。舒之梅先生前来车站迎接，宿于东湖翠柳村客舍。这里是别墅式小楼，环境幽雅，虽是深秋气节，仍然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真是休闲的胜地。中午在舒家午宴，舒夫人特地做了12道地道的东湖菜色，请饶先生尝一尝。先生与新朋老友欢聚一堂，大饱口福，十分痛快！下午参观湖北省博物馆，重点看了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以及所有共出器物。其中最突出的是8种124件的古代乐器，包括一套64件的青铜编钟，以及编磬和鼓、琴、瑟、笙、排箫、横笛等，简直是一个地下的乐宫。在谭维泗馆长的陪同下，饶先生还观看了编钟演奏的录音表演，仿佛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二千多年前的曾侯国

选堂、曾宪  
通与舒之梅一家  
在湖北省博物馆



去了。

第二天继续在馆里参观，我们把所有随县出土的编磬铭文全部录下，基本上能够通读。在库房里看到一对随县出土的漆衣箱，箱子上写有漆书铭文，其中一件书有28宿名，左下角有文6行20个字，尽是古文奇字。展厅上只有摹本，没有释文，不可通读。谭维泗馆长遂请先生为之考释。当晚，先生深入考察了漆箱文字的整体内容，推断其必与天象、乐律有关，再联系有关古文奇字的形体、意义与音读，经过反复推敲，终于写出“民祀佳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经天尝（常）和”20个字。次日先生向谭馆长交了一份

令人满意的答卷，为博物馆展厅填补了一项空白。有意思的是，二、三句末字之“维”与“四”竟与谭馆长大名相应，更是巧合，闻者无不莞尔、折服！（今按：末句“经天”二字，先生根据新出楚简资料改释为“琴瑟”，整句应读作“琴瑟常和”，整篇与天象、乐律更加密合。）

第三天上午，根据照片和拓本在博物馆对照实物，细读编钟和编磬铭文，尤其注意钟体的大小和标音铭、乐律铭之间的关系，颇有收获。还观看了编钟的仿造工艺。下午，接到严学窘老先生的通知，邀请饶先生和我参加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4时许，由华中工学院语言所办公室刘主任和严武先生前来接我们到珞珈山路军区第四招待所报到。当晚同中山大学的与会代表高华年、黄家教、李新魁诸先生会面，并拜会了王力、吕叔湘和朱德熙三位先生。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 10月21日上午，中国语言学会举行成立大会，由吕叔湘先生主持开幕仪式，王力先生致开幕词。出席大会代表共180多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许多著名的语言学界老前辈都到会了，过去只读过他们的著作，这次有机会聆听他们的教诲，真是太荣幸了。下午分组讨论，饶先生和我都被分在古代组，由殷孟伦老先生当组长。饶先生提出题为《秦简日书中“夕”（𠂔）字含义的商榷》一文（后来刊于《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此文根据战国阴阳五行家的理论解释秦简所记楚月名中“夕”和“𠂔”的意义以及每个月里“日”和“夕”的对立和消长。因为文中涉及秦简和楚简的许多新材料，又是同朱德熙、梅祖麟两位先生进行讨论，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老先生们发言很热烈，小组会开到很晚才结束。晚上看电影《第十个弹孔》，十分感人。

第二天举行学术报告会，吕叔湘先生作题为《我国语言学的现状和展望》的主题报告，谈到当前语言学界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即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与专的关系等，并提到语言学的规划问题。很受教育和鼓舞。

第三天继续进行学术交流。晚上我们整理行装，准备明天一早出发





选堂与周祖  
谟、曾宪通、舒  
之梅、滕壬生前  
往纪南城参观

到荆州去。

**荆州** 10月24日早晨，语言所陈章太先生前来给饶先生送行，同行的还有周祖谟先生。车送至东湖边湖北省博物馆后，即转乘小车。由武昌出发，经汉阳、沔阳、潜江、江陵四县，行程230多公里，历时近5个小时，于下午1时抵达荆州，住荆州宾馆。滕壬生馆长前来迎接，并安排有关活动。

午饭后稍事休息，即到纪南故城参观。故城在荆州城北7公里处，因处于纪山之南，故名。城周经钻探为31公里，有8个门，以南、北城墙保存最好。我们站在东北角的城垣上，面对纪山，东为雨台山，西为八岭山，城内有凤凰山，即出古尸的167号、168号墓所在地。但这里的所谓山，实际上只是高地，故在山并不见山；出有大批楚简的望山在西北角，天星观在东南方，不到实地考察，根本就弄不清这些著名地点的地望和方位，现在终于明白了。离开纪南古城，驱车来到荆州城。城门和



选堂与周祖  
谟、曾宪通、舒  
之梅、滕壬生在  
荆州博物馆

城墙保存得非常完好，难怪许多古装片都到这里来拍摄外景，远观近看都十分逼真。同饶先生、周先生漫步在古城垣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三国时孔明的故事，希望周祖谟先生来一段京腔清唱，可惜天色已晚，只好赶回宾馆休息。

25日与周祖谟、舒之梅先生一起到荆州博物馆参观，看到好些战国铜剑，大多是越剑，也有巴蜀剑，还有一把叫“都君用宝”的奇字剑，铭文是刻款，虽很工整，但字形讹变得很厉害。“都”有释作“楚”者，殆



误。还参观凤凰山167号、168号墓出土的两具古尸，可能是一对夫妻的墓葬。男的体魄非常健壮，所有关节均能活动，经解剖证明，他的全部内脏都很正常。尤其是那对足足有40码大的西汉麻鞋，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从这具古尸口中所含的玉片得知，死者的名字叫做“遂”。

下午在沙市码头候船，2时正，“东方红64号”驶靠码头。即同周祖谟先生等话别，周先生回武汉，饶先生、舒之梅和我三人登上游轮，准备畅游三峡。晚抵宜昌，当晚在船上歇息。

**长江三峡** 10月26日凌晨3时30分从宜昌开船，在南津关开始进入三峡范围。6时整，饶先生叫我起身看风景，揭开卧室窗帘，只见船头两道白光射向两岸，红绿二色相间的航标指示航道，两岸高山耸立，群峰突起，一轮明月离峰数尺，举手可摘。整个峡谷像披上一层薄纱，浸浴在喷薄欲出的晨曦之中。天一亮，我马上举着相机，对景拍摄。两岸奇峰独秀，目不暇接。9时到香溪，传说为王昭君当年洗脚处，有一碧绿小河从香溪流出，那便是王昭君的故乡。10时到秭归，这里是战国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过了西陵峡，便到巴东，巴东县城倚江而立，气势雄伟。中午开始进入巫峡，所谓“长江三峡巫峡长”，一点不虚。这里有巫山十二峰，峰名各异，风采殊别。当船到神女峰时，甲板上站满了看风景的人，饶先生正聚精会神地对神女峰写生。忽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说是有人落水。船身一个急转弯，饶先生正在写生的铅笔，冷不防便掉到江里去了。原来指挥台正在组织营救，急把船头转向，顺流跟踪，并从甲板上放下救生小船，四处寻觅。大概找了半小时，仍了无踪影，眼看水深流急，险滩暗礁，即使获救，也难活命，只好放弃。据轻生者的同伴说，投江者是因生意失败，血本无归，故而自沉江底，悲哉！待回头赶到神女峰，已过了一个多小时。神女依然无恙，她仍屹立在顶峰之侧，神态自若，十分清晰，似乎还不知道在她脚下刚才发生的悲剧。逆水而上正是写生的好时刻，为了不错过这个机会，我从验票员处借来一根红蓝铅笔，好让饶先生继续写生。

神女峰过后，游轮进入瞿塘峡。瞿塘以“险”著称，两岸高山壁

立，峭壁奇峻，一舟居中，仿佛在一线天中行驶。可惜天色已晚，不能尽览。8时30分到达奉节县城，登岸拾级而上，迎面为“依斗门”，进入“天街”，平坦如原，不知高山上竟有如此平旷之山城。夜宿县政府内之接待室，通透宽敞，空气清新。由县外事办公室主任冯俊强先生安排明天活动，饶先生和我们都十分满意。

**奉节** 奉节山城虽小，名气可大。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著名的诗人住在这里，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苏轼等，尤其是杜甫，他前后在这里住过三年，至今还留有杜公祠、草堂河等遗址。饶先生说：“杜甫到夔门后所写的诗是最好的。他写的夔门诗共有430多首，杜诗里所描绘的许多景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见证。”难怪先生随身带着《杜诗镜诠》经常翻阅，还不时讲述给我们听，让听者受益无穷。

10月27日清晨和先生一起在接待室的院子里散步，据说这里原来是刘备妻子甘夫人的墓地，她原死于襄樊，在刘备死后由诸葛亮命人移尸骨埋葬于此。附近还有张飞的守灵处。根据饶先生和考古学者的分析，张飞为甘夫人守灵之说不可信。倒有可能此地原来就是刘备坟，才有张飞守灵处，又移甘夫人尸骨与刘备合葬的道理。也只有这样，才与白帝城为刘备临终托孤之地的传说相符。据说前几年在附近基建时发现有大墓道，则此处为刘备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然则成都武侯祠后的刘备坟实为衣冠冢而已。

8时30分由奉节县城乘船赴白帝城，经过7公里的水路，于9时30分来到白帝城。先在白帝庙前照相留念。由文化馆主任袁仁林先生陪同参观白帝庙内刘备、孔明、关云长、张飞塑像和碑林，以及本地出土的文物展览。在碑林处发现有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刘心源的碑刻四方，他前后三次来到白帝庙，留下不少墨迹。午间在庙后餐馆用餐，这时，袁主任向先生求赐墨宝，饶先生遂于饭后到后院挥毫留念。诗云：

黄昏莫辨襄东西，赤甲白盐天更低。  
重讽苍藤古木句，惜无两岸夜猿啼。

由白帝庙休息室可以看到赤甲、白盐二山所形成的峡谷如门，这就是著名的夔门峡。两山之下原有滟滪堆，是杜甫诗中常见的诗景之一，因其有碍航道，已被炸去。站在休息室外的岩石上，便可居高临下，眺望赤甲、白盐，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十分惬意。先生中午没有休息，仍然兴致勃勃地站在岩堆上写生。我用相机的



选堂在夔门  
峡考察摩崖石刻

镜头留下了这一难忘的时刻。

因昨晚船过瞿塘时天色已晚，不及细看。为填补这一遗憾，今天下午特租一小艇，畅游瞿塘。1时出发，先到夔门的白盐山下摩崖处观看历代名人题记。来到凤凰泉，这里洞窟已修葺一新，拾级而上，有石桌、石椅供人野餐。饶先生立马创作一幅妙趣横生的素描画，笑得大家前俯后仰。登步至摩崖处，有南宋乾道七年（1171）的大碑，乃赵不忧撰文，赵公硕书写；尚有一大宋碑，已经风化，仅数字可辨，但关键的人名则剥蚀严重。和尚们的题记倒是不少，也较清晰，但多是无关宏旨。最有意思的是冯玉祥于1939年的题刻：“踏出夔

选堂在风箱  
峡远眺悬棺葬



门，赶走倭寇！”日本投降后，1945年他又补记此事。特别显眼的是李端刻的“巍哉，夔门”四个大字。先生在这里低吟细画，流连一个半小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乘汽艇来到风箱峡，这里以保存战国时巴人的悬棺葬而著名。因悬棺于十数丈高的悬崖上，形如风箱，故土人附和为鲁班师的风箱而得名。因岸边地势险峻，不易攀登，饶先生便留在艇上写生，我和舒之梅、李适田两先生又爬又攀地登上峭壁的岩堆上，除遥望高处的悬棺葬外，还艰难地走了一段古栈道，亲自体味一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滋味。4时30分准备返航，但因水情不好，不敢按原路回去，便绕道八阵图、滟滪堆，饱览夔门壮观，委实“巍哉”！当晚，县外事办公室冯科长和李适田先生在招待所餐厅设宴款待饶先生。大家尽兴而饮，十分高兴。晚上，先生作《夔门登舟拨蒙密，观大宋中兴颂摩崖，次简斋游浯溪韵》，诗云：

字大如斗杂蘚碧，舍舟入岬扪赤壁。  
中兴词句何庄严，长江至此有正色。  
滟滪堆已上下通，方舟无复愁人力。  
即今化险以为夷，万古路难缘此石。  
渔者休歇巫峡长，玄猿罢哭千山侧。  
盘涡犹有白鹭眠，独树依然怀忧恻。

28日晨6时30分起身，天色大白，今天仍是少有的好天气。7时30分饭后，由冯科长陪同参观永安宫遗址。这里现在已变成县的师范学校，只有几棵古树还略存古意。大家在树前留影纪念。最后，冯科长领着大家去凭吊江姐的丈夫彭咏梧烈士墓，据说当年彭政委被杀之后，身首异处。解放后群众为了给烈士恢复全躯，做了许多调查工作，终于把身首的骸骨复合了。这是群众对烈士的爱戴，可慰烈士于九泉之下矣。

上午10时30分乘“东方红123号”从奉节出发，沿江顺流而下，一路风景，与逆水而上自有不同。但比较而言，顺水行舟，好景稍现即逝，

选堂与舒之  
梅在汉阳归元寺



不如逆水可停留片刻，细细品尝。沿途峰回水转，重岩叠嶂，形势十分险峻。从宜昌到奉节历时17个小时，而从奉节到宜昌只需7个多小时，可见顺水与逆水是大不一样的。“东方红123号”二等舱只有饶先生、舒之梅和我三人。我们坐在船头的休息室里，两岸风光尽收眼底，饱览着三峡的顺逆和始终。下午5时30分抵达宜昌。途经葛洲坝，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站，规模很大，发电量达270万千瓦，相当于1949年全国发电量总数的3倍，十分壮观。船进码头，宜昌博物馆的小杨前来迎接，到宜昌宾馆进餐后，在会议室稍事休息，于8时正乘火车返武昌。

29日，从宜昌经当阳、荆门、丹江、襄樊，再南下经随县、安陆、云梦，于9时到达武昌。刘彬徽先生已在月台迎候。遂与舒之梅驱车至汉阳归元寺参观，寺院保存完好，香火甚盛，十八罗汉威严逼真，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中午在寺内餐厅吃素餐，饭后游翠微古池。4时至武昌车站，乘16次“广京特快”北上京华。

**北京** 10月30日9时10分抵达北京，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及郑昌政先生前来迎接，住华侨大厦。上午到民族文化宫参观少数民族古文字展览，内容非常丰富，琳琅满目，是我国民族大家庭光辉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午在华侨大厦遇见老同学邓秉钧夫妇，下午在大厦附近的中国美术馆参观关山月画展，荣宝斋藏画和木刻水印画展览，还看到张大千的好几张名画。当晚，王仿子社长在西单“同和居”设宴为饶先生接风，考古所夏鼐所长，文物出版社高履芳老社长，故宫博物院顾铁符老先生以及文物局金冲及、郑昌政等先生都出席宴会。饶先生再三感谢在座各位先生的邀请和关照，才有今次到内地参观考察的机会。这次幸会，大家开怀畅叙，频频举



选堂与曾宪通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



选堂与顾铁  
符在故宫乾清宫  
前



杯，十分痛快！晚宴结束时，王仿子社长将文物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送给饶先生。回到大厦，先生发现发掘报告中有秦简《日书》两个写本，是首次发表的新材料，非常高兴，遂提出“楚地出土文献研究”的新课题，打算以随县曾侯乙墓的钟磬铭辞、长沙楚帛书和云梦秦简日书三项内容为主，邀我共同研究。于是笔者才于1981—1983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先生指导下从事相关课题的研究。

31日，由顾铁符先生陪同参观故宫。除主体三大殿外，还观看了在乾清宫举办的晋隋唐宋元画展。中午由顾先生在萃华楼招饮。下午参观工艺馆和北海公园。原



计划看青铜器馆，因展馆正在施工，未能如愿。晚上，郑昌政先生带阎清先生来访。阎先生正在写一部有关康熙的电影剧本，经常到承德避暑山庄。阎说已联系好明天到承德旅行的事，今天晚上需略作准备，明天一早启程。

**承德** 11月1日晨5时30分起床，6时到小吃店买早点进餐完毕，即与阎清先生一道坐出版社小车到火车站，乘242次列车前往承德。整个软席车厢只有五位乘客，除我们三人外，还有两位中途下车的干部，显得格外冷清。中午1时30分到承德站，住承德地委宾馆。3时进餐毕，即步入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就在宾馆对面，山庄的丽正门与宾馆大门正面相对，两者只有数步之遥。承德山庄是康熙、乾隆时期修建的避暑行宫，它汇集全国各地的建筑风格，既有像西藏拉萨的小布达拉宫，又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蒙古包，还有像江南水乡的典型园林建筑。它既是清朝与少数民族首领联络感情的圣地，也是历代皇室到此避暑的胜地。整个范围分为山庄区和外八大庙区，山庄区又分为宫殿、平原和湖区三处。饶先生一口气就走完湖区的许多建筑物，5时30分回到宾馆，边休息边翻阅阎清送来的《承德府志》。

第二天整天上山。上午9时已登上东峰的“垂峰日照”，然后沿着山巅上的小城墙西行，大约20多华里，几乎把山庄高处的周围都走遍了。中午在“四面云山”处用餐。这是一顿丰盛的野餐，可能因为肚子饿了，感到特别可口。这时，陪同导游小周正色地向饶先生报告说，他正在酝酿一个剧本，叫做“江洋大盗三进山庄”，接着便绘声绘影地表演起来，说得很动听，也表演得很动人。饶先生笑着对他说：“你不但是个很优秀的导游，也是一个很出色的导演呀！”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下午4时30分回到宾馆，因为太累了，大家都早一点休息了。

第三天游山庄的外八庙。因旅游车未到，待到近9时才出发。先到普宁寺，再到须弥福寿之庙。12时回到宾馆，为钱云、李立二位姑娘照了几张当时还很稀罕的彩色相，感谢她们为我们调了一间有暖气的房

选堂与阎清  
在承德避暑山庄



间。下午2时30分出发，先后游了普乐寺、安远寺、普陀宗乘庙和殊象寺等，5时30分回到宾馆。晚饭后，市文物局田地局长来访，他向饶先生介绍他最近到蒙古包参观的情况，十分有趣。又同阎清先生谈了有关《康熙传》的脚本问题，10时离去。

第四天上午9时到山庄宫殿区参观，先看慈禧太后的住所，以及嘉庆、咸丰在山庄逝世的地方。然后由小周陪同，参观金山塔，登塔眺望，只见回廊依山而建，盘旋于山岭之间，周围假山怪石参差错落，疏密有致，与宫殿区的金碧辉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山庄文物商店就在假山后面的二楼，应文物商店主人的邀请，先生在

雪白的宣纸上写下两首山庄的即景诗。

一曰《题烟雨楼用王荆公韵》：

弱柳沿堤绿绕，  
夕阳山背红酣。  
莫问前朝烟水，  
断肠塞北江南。

二曰《山庄远眺围场》：

车书混一信无俦，  
来往燕云十六州。  
想见木兰秋狝罢，  
武功文治已全收。

数天来在山庄的耳闻目见，尽在字里行间，围观者不禁为之喝彩。最后，大家簇拥着诗翁在“热河泉”前照相留念。12时回到宾馆，准备乘车回京。

**北京** 11月4日晚又回到王府井华侨大厦。第二天上午，与郑昌政先生安排在京活动，并打长途电话与天津大学陈国符教授联系，两次均无结果。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博物馆筹建于1959年，当年从全国各地抽调最好的文物参展，按郭沫若“中国通史”的社会发展框架，分馆展出。每个馆的展品都十分丰富。一般的浏览也需要好几天，何况饶先生几乎对每件文物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看得很慢，花了一个下午，连“奴隶社会”部分都没有看完，只好另找时间再来了。

第三天一早，由娄师傅开车送饶先生游八达岭和十三陵。9时许到达八达岭。1959年我随容庚先生到北京时，曾经和老同学到过长城。同当年相比，八达岭最陡的一段已经重新铺设，可以拾级而上，减少攀登

的难度。先生这次一口气就登上了八达岭的制高点。只见长城内外山峦起伏，古城垣随山势绵延至无边的天际。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极目四方，饱览塞北风光。大家都夸他是条好汉！照相机镜头留下了不少先生飒爽的英姿。离开八达岭，来到居庸关，参观云台少数民族石刻。因时间关系，驱车直奔十三陵。

记得1959年发掘十三陵定陵时，出土文物曾经在故宫神武门城楼展出，现在已经转移到十三陵的陈列室，分东西两个厢房。再入地宫，除皇帝和皇后的大型棺木外，还有众多随葬妃嫔的小棺，可以看到明神宗朱翊钧当年随葬的豪华和奢侈。在外宾接待室用完午餐，即驱车长陵。这里有明成祖的陵墓，进门有白色的石碑楼，接着是连绵不断的石人、石马和碑亭，均由乾隆重修。陵墓正殿全部是楠木结构，殿柱可三人合抱，足见其大。殿旁有顺治皇帝的护陵碑和乾隆皇帝的碑文，两侧还有嘉庆的题记，都为护陵歌功颂德。饶先生说：“清朝开国皇帝注意保护明陵，而把损毁破坏明陵的责任推给李自成起义，可见历代统治者对于农民的立场是相同的。所以尽管清朝推翻了明朝，但对其陵墓的态度也莫不如此。”看完长陵，已是下午时分，饶先生还是兴致勃勃地建议一鼓作气到颐和园！于是驱车前往，参观了五殿古色古香的陈设，看到慈禧当年的显赫和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折射出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然后像走马看花般通过十里画廊，登佛香阁，上万寿山，眺望昆明湖十七孔桥。3时30分来到白石舫，想起当年王国维来此自沉，了此一生，顿觉凄楚。4时30分返回华侨大厦。晚间于豪亮先生来访，9时离去，10时就寝。

10月7日天气转凉。昨天还是天高云淡，初冬和煦的阳光洒满京畿郊野。今晨虽北风凛冽，饶先生仍坚持按原计划到天坛公园一游。先到东门参观菊花展览，群芳争艳，色彩斑斓。然后经过回廊，登祈年殿，进皇穹宇。与饶先生相约听回音壁，上圜丘，目睹古代建筑家的杰出智能：整个圜丘分为三层，每层九重，凡22块石砖组成一道直线。据说这是几何学上的空前创举，是一种富有哲理的几何图式。离开天坛来到北海，冒着寒风登白塔山，沿着画廊步行至仿膳堂，参观三希堂法帖，吃

了两个小笼包，就再也找不到地方用膳了。两人只好又回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了。这次是补课性质，主要针对重点器物，走马看花，做了详细的记录。至3时30分，先生仍舍不得离去，又上楼看了其他的展品，直到管理人员下逐客令，才不得不下楼离开。

回到大厦，胡厚宣先生已在大堂等候多时了，当即由胡先生陪饶先生前往北京医院探望顾颉刚老先生。胡先生说，顾老前些时候发烧至40℃，现已恢复正常，但患有老年支气管炎和糖尿病，所以还需继续住院治疗；不过老人家记忆力还特别好。果然一见面，顾老就说他和饶先生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现在还保存着饶先生20世纪30年代为《古史辨》写的好几篇文章。饶先生马上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批评。”顾老虽然年近九十，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却记得如此清楚，真不简单。饶先生说，顾老十分注重培养年轻人，奖掖和提携后进是他对中国学术的重要贡献，也是他深受敬重的原因之一。回到大厦，胡先生说顾老的学生们正在为顾老的九十大寿准备出版祝寿文集。饶先生立即表示，他一定与大家一道，共襄盛举。

8日上午到文物出版社，与高履芳、金冲及、郑昌政等先生商量下一段的行程。回到大厦，正遇见周祖谟先生和夫人前来邀约饶先生到东来顺吃烤鸭。来到东来顺，周小姐已在座等候多时了。菜色十分丰盛，加上主人的盛情，喝得有点醉意。周先生特意送给我两张唐代的拓本。本来在江陵告诉我是碧落碑文，可以供我补充古文的材料，现在虽然不是古文而是篆文，也足珍贵，周先生对我的关爱实在令人感动。下午饶先生同周先生及夫人一道来到广济庙，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巨赞法师迎入寺中，参观在北京的佛教中心，看了不少法器和房山刻石。3时30分，由巨赞法师领着来到雍和宫。当时雍和宫还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巨赞法师是进不去的。先后参观了五个大殿和两个侧殿，法师边走边讲解，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不少问题，还不时同两位先生进行讨论，使我得益匪浅。最后一大殿供奉着用整木雕成的大佛，高18米，宽8米，还有8米埋入地下。佛像衣褶流畅自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令人惊叹不已。侧殿有些小型的欢喜佛，色彩造型各异。时间关系，只好走马而不看花，

匆匆而过，各自回去休息了。晚上姜伯勤、阎清、于中航诸先生来访。

9日是星期天，饶先生和我陪友人到友谊商店买电视机，8时30分到达。初无黑白机，但排队甚长。不一会儿，来了10台日本三洋牌12寸黑白电视机，价钱260元，便宜极了。可是我们没有经验，当我们正在数外汇券时，电视机已被人们一抢而光。原来许多是由本店职工代熟人买下的，难怪如此神速！等到10时左右，还无新货到来，只好离去。由赵诚兄陪饶先生造访张政烺先生。因为是不速之客，张先生住的地方又很小，没有余地招待客人，张先生感到很不好意思，连声表示歉意，并把一本新出的马王堆帛书本《老子》送给饶先生。饶先生表示感谢，也连连说道“很对不起”。下午回到大厦，在大堂里见到夏承焘老先生夫妇。原来是前天饶先生过访不遇，今天特来回访的。夏老当年81岁，他老人家总是不停地介绍自己的夫人吴闻，前后达七八次之多。临别时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大声介绍说“她叫吴闻”，深怕人家听不到似的，弄得大家捧腹大笑。晚上王尧、马雍、姜伯勤先生来访。

10日上午9时，饶先生到沙滩红楼国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作学术讲演，题目是“谈谈敦煌曲子”。先生重点介绍法国和日本藏的敦煌卷子上的词曲材料。他说：“敦煌写本中有一些是小和尚写的曲子，附着在卷子的背面或文本的空白处，这是文学史上罕见的材料，可以补一般文学史的不足。”还指出日本印刷精美的墓志，是很好的骈体文。并介绍日本学习汉字的情况，说日本出土的铁刀和铁剑上面都是汉字，其书法全是北朝的作风，可见其受汉字的影响甚早。最后还回答了大家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至11时结束。中午先生在红楼“打坐”，休息片刻便又兴致勃勃地观看居延汉简照片。晚10时乘187次“京济直快”离开北京，前往济南。高社长等前来送行。

**济南** 11月11日清晨8时30分抵达济南。因北京通济南的长途电话打不通，没人来接。只好租车到山东省文物局。9时，卢传贞同志派车送至济南饭店，住215房。午饭后即到山东省博物馆参观。这里原是一座道观，规模不大。展室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最具特色。对于大

汶口陶尊上的刻符，唐兰和于省吾两先生都认为是文字，饶先生颇持异议，他以为刻符分明是祭坛上日、月二形的结合，很可能是古代祭祀“明神”的标识。在馆里会见了朱活老先生，他是研究古钱币的老专家，陪同饶先生观看了所有的展室。到4时30分开始看馆藏字画，因为天色转黑，灯光不足，看得很吃力。至5时回饭店休息。

12日上午参观趵突泉，由萧健莹女士陪同。三眼突泉已比1959年低了很多，但周围溪流仍泉涌如注，清澈见底。又参观了李清照纪念馆，有郭老和吴无闻等人写的诗词书画，遍地菊花，令人想起易安居士“人比黄花瘦”的名句。接着来到大明湖，古诗有“四面荷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湖”，写的就是大明湖的湖光山色。又乘汽船登上古亭岛，这里曾经是杜甫和李北海畅饮抒怀的地方，杜诗有“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至今仍脍炙人口。岛上还保存着不少碑刻，有阮元、翁方纲等人的手迹。最后参观了辛弃疾纪念馆，对稼轩词中倾注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到济南博物馆观看馆藏书画，饶先生对几位宋、明名家的画作的看法，得到在座多位书画鉴赏家的赞赏。观后饶先生即席挥毫，为李易安居士、辛稼轩纪念馆题词留念。

**灵岩寺** 13日上午8时30分，山东省文物局派车送饶先生到长清县灵岩寺参观。这里是泰山的余脉，依然保存着挺拔秀美的雄姿。灵岩寺是我国古代四大名刹之一，保存十分完好。除碑亭、大殿之外，以千佛殿了身藤胎髹金、铜铸佛像和四十身泥塑罗汉像最负盛名，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之一。据说这些罗汉像体内还藏有各种重要文物，如铜镜、钱币、丝制内脏以及墨竹题记等。这些罗汉身高1.6米左右，呈环状置列于殿内四周下层壁坛之上，形象逼真，体态各异，衣纹刚劲有力，又富于质感，体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和精神状态，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午饭后游三眼泉，泉水清澈甘甜，用来泡茶特别提神醒脑。乾隆下江南时三到此地，留下三块诗碑。还有李世民的“御书阁”篆书，苏东坡的《醉狂歌》，以及梁启超的“海内第一名塑”题匾等。苏氏《醉狂歌》云：

醉中走上黄节岗，满山乱石如群羊。  
岗顶醉倒石作床，仰观白云去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唤使君狂。

苏氏书法笔走龙蛇，恣肆放荡，诗情字境，尽在“醉狂”之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泰安** 13日傍晚到达泰安，泰山文物管理局李先生接待，住泰山下岱庙对面的泰山宾馆。14日早餐毕，即乘车从西路上山。由长寿桥到中天门是一段黄土路，比较平坦，很少盘道，可以行车。西路景点除长寿桥外，还有黑龙潭、扇子崖和白龙池，但因不是雨季，虽有飞瀑细流，不甚壮观。接近中天门一段正在修路，只好下车绕过一道颇陡的山坡，众人搀扶着饶先生，在两棵树间排成人墙，攀援前进，终于登上中天门。这里有牌坊一座，伏虎庙三间。庙内祀黑虎神像，神像身旁伏着二虎，传说是为了镇压山上各种野兽。大家在庙前小憩、喝茶和照相。从中天门仰望南天门和泰山绝顶，高耸入云，中天门就像在山脚下一样。据茶亭的老板说，从中天门到南天门山路特别陡峭，别看只有1700多级台阶，脚力好的年轻人不停步地一口气走也要2小时，平常人需3小时，年纪大的更需要5个小时以上。回忆1959年容老带研究生来泰山，我们一群年轻人爬到南天门便躺着不动，第二天下山时，有人竟是一级级“坐”下来的。估量一下时间和体力，只好取消走天街的念头，从中路边看风景边下山。

中路是泰山景点比较集中的旅游路线，有朝阳洞、御帐坪和五大夫松亭、壶天阁、歇马崖、水帘洞、斗母宫、罗汉崖、万仙楼、王母池和八仙桥，以及孔子登临处石坊等。一路走走停停，在景点稍事歇息。饶先生建议去看“经石峪”。于是从三官庙翻过小岭，来到了经石峪。这里相传为晒经石，宋时称为经石谷，明代才叫经石峪，是在成片的石坪上，刻着金刚经的全文。字径在一尺以上，是历代大字的鼻祖。有人称它为榜书之宗，列为妙品。但经石写于何时？书者是谁？由于没有记



载，说法很多，无法确指；饶先生认为北齐韦子琛写的可能性大些，因为韦氏在邹县也有刻经，字体大致相若。经石原有1000多字，因年久风化，现仅存数百字而已，且大多已模糊不清。为防止继续风化和裂塌，已楔下大钉加以保护，并准备在上游建造水库，防止因大水的冲刷而被破坏。饶先生对经石峪情有独钟，除仔细琢磨外，还留下多张照片继续观摩。十多年后，先生更以如椽大笔书写《心经》，如此鸿篇巨制，正可与经石峪之丰润恢宏相媲美，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15日参观岱庙。古时的岱庙分上庙、中庙和下庙。上庙在岱顶的东岳庙，中庙在王母池前的岱岳观，都因年久失修，早已倾颓不存。现在的岱庙就是下庙。这座岱庙建于泰安城内的西北角，原占泰安城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可见规模之大。经过历代时毁时修，已经大不一样，但也可以想见当年的盛况。目前见到的岱庙仍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宏伟的古建筑。岱庙大院的南面有正阳门和遥参亭。亭子共五间，建筑在一个方台上。据文献记载，遥参亭为入庙之初阶，古代帝王



1980年饶教授参观泰山的“金刚经”摩崖石刻，萌发了创作大型《心经》书法的构思。《心经》是儒、释、道三教所共尊的宝典，饶教授将自己挥毫的《心经》书法赠予香港市民。“心经简林”现在香港大屿山上（本版照片采自《东洲鸿儒》）



饶教授在写给曾宪通的信中提到泰山经石峪照片在英文本《东方》刊出

先在这里举行简单仪式，然后才通过正阳门、配天门和仁安门，进入岱庙的主殿——天贶殿举行大祭。这里是仿照古代帝王宫殿模式建成的古建筑群。

二是丰富的古碑林。岱庙大院古碑林立，分别有四类，一为秦汉古碑，以秦李斯与秦二世的小篆残碑和汉朝的衡方碑为最古，它们在金石学上极有价值。二为当年来不及运到山顶或后来从山上移到山下保存的碑，如“大观峰”碑原应立在绝顶；“五岳独尊”、“翔凤岭”和“飞龙岩”的大字碑本应立在南天门下。三为历代重修泰岳庙碑及祭告碑等。四为历代文人咏泰山的诗刻，其中以杜甫《望岳》诗碑最为著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

三是古松古柏参天。岱庙满院古柏苍翠，遮天蔽日。作为岱庙名胜的“龙升”、“凤落”，指的就是古老的龙柏和凤柏。院内保存有汉柏六株，遂有“汉柏院”之称。还有咏赞汉柏挺拔葱郁精神的诗图碑群，成为岱庙的一大奇观。

四是保存完好的古代壁画。天贶殿内祀东岳泰山之神，是古代帝王祭岳神的主殿。大殿九间，重檐八角，彩绘斗拱，黄瓦覆盖。殿内东、北、西三面画着高10尺，长170尺的壁画。以北面墙壁中间为界，东向为“启辟图”，西向为“回銮图”，描绘东岳神启辟回銮的情景，衬托当世帝王的威严，是十分难得的古代壁画。

下午3时30分离开岱庙，乘车前往曲阜。

**曲阜** 16日晚6时抵达兖州，由兖州外事办孔繁林先生安排，入住曲阜中旅社。这里原是孔府的一部分，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加以改装，外观仍保持古建筑形式，室内安装现代化设备，周围亭台楼阁，古木苍翠，是一座园林式的旅舍，十分舒适。由于曲阜活动内容安排得很丰富，饶先生建议多呆一天。

第二天一早，由兖州文管会副主任孔繁银先生陪同参观孔庙。孔庙是历代祭孔的圣地，规模非常宏伟：碧水桥前有三坊二门，即金声玉振坊、棣星门、太和先气坊、至圣坊及圣时门；碧水桥后又有三大



选堂在曲阜  
孔子故居之唐银杏树下留影

门，即弘道门、大中门和同文门。进入奎门阁，两旁立有十三座碑亭，为元、金、明、清所立大碑。经大成，进杏坛，就是大成殿。据孔主任介绍，大殿正中原有孔夫子巨型塑像，两旁有颜回、曾子、孟子和子思四人的塑像，“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捣毁，现仅存一些法器而已。两庑原有七十二弟子像，今则改成汉石刻和碑林，内有汉碑17块，可谓集大成者矣。其他还有不少唐宋元明的碑刻，都十分珍贵。大成殿后是寝殿和圣迹殿，最后到了阙里。阙里是孔子的故居，庭院里长着汉柏和唐银杏树，枝叶繁茂，色彩缤纷，我特地在这里为先生留下一帧彩照。院子正后方有一堵围墙，前面树一块碑，上书“鲁壁”二字，据传孔子九世孙孔鲋，当秦始皇焚书时藏书壁中，其后参加陈胜军，曾为秦博士，死后无

人知道壁中藏书。直到汉景帝时，鲁恭王为广其宫，坏孔子宅，才在壁中发现竹书多种，即所谓壁中古文书者是也。由于我在成都会上宣读过《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一文，与孔子壁中古文一脉相承，故先生特地为我在“鲁壁”留一彩照，作为本人游心于鲁壁古文的一个纪念。

下午参观孔府：孔府就在我们下榻处的隔壁。大门有李东阳书“圣人之门”四个大字。二进门为重光门。孔主任说，过去凡迎圣旨及重要官员皆由此门进入，入前先在钟鼓楼鸣钟鼓十三响，然后开门迎人，仪式相当隆重。正厅为衍圣公办公及接待宾客的地方。二堂、三堂和前堂楼、后堂楼为日常理事及家眷住处。后花园又叫“铁山园”，以园中有礪石铁为假山而得名。孔家为世袭封衍圣公，由长子继承，故只有长子才能住在孔府。孔府里至今还保存有孔子第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的资料和第77代孙孔

选堂为曾宪  
通在“鲁壁”前  
留影



德成当年住所的陈设，俨然同王府一样尊贵。在文物库里还看到一幅据说是赵孟頫所画的“三圣图”，就在人物衣褶的线条里写了一部《论语》，密密麻麻的，小如蚂蚁，令人叹为观止。据说赵是孔家的亲家，难怪他会如此卖力。也有人对此画的真迹表示怀疑。库房里的文物非常丰富，还有乾隆皇帝送给孔家的商周铜器十多件，均极精致。因为乾隆帝的女儿就嫁给当年的衍圣公，孔林中还有这位公主的陵墓。

18日上午开车到孔林。因为大雾，绕林一周依然对整个范围不甚了解，只好下车步行，在重要的陵墓前参谒照相。孔林以孔陵为中心，围墙如宫墙般高，十分威严。孔子墓就在洙泗之间，一进门就可以登上洙水桥。现在的洙水已变成小沟一样，洒水虽大，也已经没有什么水源。孔子墓前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旁有子贡庐墓处。子贡在这里守墓达六年之久，还手植许多桧树。右边有好几个亭子，原是历代皇帝前来晋谒驻蹕的地方。孔子墓附近有二世祖洙水侯和三世祖子思的大墓，其余按世袭衍圣公依次排开，一直到76世祖的孔令贻墓，井井有条。旁系孔姓墓碑更不计其数，著名如孔尚任的墓地等，则在林内的显眼处，并不难寻找。据孔主任说，“整个孔林占地为清初3000亩，合今近5000亩。据1951年统计，古树达22746棵，30年来又不断增植，估计现在达50000棵以上。”又说：“许多外国人对这个孔林非常感兴趣，认为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家族的墓地能够延续得如此长久，如此完整，且如此保存原貌，真是太难得了。”

归途还参观了颜子庙，其规模仅次于孔庙，据说比邹县的孟子庙还要大。颜子庙内有正殿和寝殿，还有陋巷碑和乐亭，连颜回的父母也都有殿有庙，可见历代对儒家的推崇了。

下午没有安排活动，饶先生和我漫步到城门外掠影，又到汉碑林和阙里，重温昨天参观过的古迹，直到夕阳西下，似乎兴犹未尽，便回宾馆，准备乘131次“青沪直快”去南京了。

**南京** 19日凌晨3时30分到达南京车站，出站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人来接。四处静悄悄，连找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饶先生建议叫辆三轮



车先到旅行社去。4时30分乘上人力三轮车，在南京城外的马路上奔跑。时逢弥天浓雾，有灯处白蒙蒙，无灯处黑漆漆，不明前方，不辨方向，心中生怕出事。5时到达中旅社。经查明，原来看电报的人看错了车次，把131次错看成13次，误以为下午1时到达，故未派人来接。吃了一次苦头，也是一次教训。

南京景点甚多。上午游鸡鸣寺、钟鼓楼、玄武湖、中山陵及明孝陵等古迹。下午游栖霞山石刻。这里有栖霞古庙，始建于北齐，隋唐修治，南唐重建。又有三圣殿和千佛岩，现保存有隋仁寿舍利塔、北齐造像、六朝石刻和大小徐（铉、锴）题字等。然后驱车到栖霞山甘家巷参观梁安成康王萧秀及其家族的坟墓。萧秀墓地面上还保存有一组石刻，有一对石辟邪、一对石柱和两对石碑，是迄今六朝陵墓石刻中保存最完整的一组。附近还发现有萧融、萧恢的墓葬，也有不少有价值的遗物。第二天上午游雨花台、瞻园、天王府、莫愁湖。下午参观省、市博物馆，在南京博物院看到梁桂阳王萧融及其妃王慕韶的墓志。两方墓志是目前出土最为完好的梁代



选堂在南京  
栖霞古寺留影

选堂在南京  
栖霞山巧遇海外  
友人



选堂在栖霞  
山石刻前与友人  
交谈

墓志，其文字已是十分成熟的楷书，在书法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第三天游秦淮河、清凉山、扫叶楼和朝天宫。下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唐圭璋教授及其助手曹齐平先生前来造访饶先生。唐老是词学名家，与饶先生

有许多共同的爱好，饶先生同他谈起有关《全明词》的编纂工作，唐老大加推许，深表赞同。

**扬州** 22日上午从南京乘汽车到扬州。扬州市文管会蔡起先生、博物馆陈达作馆长前来迎接，住扬州宾馆。当天上午先游瘦西湖，参观史可法纪念馆，顺便逛逛扬州市容。饶先生说：“扬州现在没有铁路，经济不太发达。但在唐宋时期，这里是长江和运河的交叉口，得东西南北水路之利，许多商贾大户都集中在这里，到处莺歌燕舞，十里洋场，非常繁华，可以说，当时的扬州就是现在的香港。”翻读唐人咏扬州诗句，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不一而足，方知先生斯言不虚也。下午陪饶先生到扬州师范学院看望任中敏（半塘）老先生。任老是敦煌学专家。20世纪70年代，饶先生在新加坡大学执教时，常接到任老的信讨论敦煌曲子的年代问题，意欲以用韵为曲子断代。先生复信深谓不然，并以《敦煌曲》一书奉赠。任老终于放弃是说。饶先生谓任老秉性倔强，坎坷一生，听说最近卧病在床，必须前往探望。来到任家，老先生深为感动，一定要家人为他穿好衣服，与饶先生对坐交谈。12年后，先生得知任老谢世，有感于任老揄扬曲学之功，终不可没，因作《水调歌头》一词挽之。

次日参观扬州博物馆，适逢馆里举办“扬州八怪画展”，展出扬州、镇江、常州三组画派49家，共计182幅，是一次了解扬州画派的大好机会。在这次画展中认识了美籍华人张昕先生。张先生是美国纽约州大学的美术史教授，现正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做访问学者，这次到江南一带作学术考察。见到饶先生特别高兴，因为他有一篇论文是请饶先生写评议书的，他也住在扬州宾馆，说是向饶先生学习的好机会。张先生也准备到上海去，希望能够同行。就这样，由张先生备好车子，从这天开始，我们一行三人在江南一带漫游。当天下午原准备过镇江，因受大雾所阻，不能渡江。





选堂与张昕  
在大雾中的瓜州  
渡口

**镇江** 24日早8时赴瓜州渡，过江来到镇江，由镇江博物馆季长隽先生接待。上午看馆藏名画，仍以扬州八怪为主。饶、张、季都是鉴赏名家，他们讨论的都是行家门道，津津有味。下午在博物馆参观，有南宋周瑀墓古尸，有甘露寺出土李德裕题词的石函和大碑，有北固山出土的飞天纹金棺银椁，以及大量具有南方特色的瓷器和明清绘画联展等，内容丰富多彩。第二天由季先生陪同，到焦山参观著名的瘞鹤铭（拓本。五套）和焦山澄鉴堂全碑，此全碑包括宋至清初的名人题记，由200多块石、74位名家组成一壁，真是书家咸集，五彩缤纷。又到甘露寺，登多景楼，从北固山上望长江万里。下午参观金山寺，看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题的



选堂与张  
昕、季长雋在镇  
江金山寺

“江天一览，千古雄观”八个篆字和一个很长的碑廊，自然会联想到从这里演绎出的一连串精彩感人的民间故事。



选堂与张  
昕、季长雋在镇  
江博物馆论画



选堂与季长  
雋在镇江博物馆



选堂在无锡  
博物馆

**无锡** 26日驱车到无锡，由无锡博物馆冯普仁先生接待，住蠡园宾馆。当天参观惠山公园，园中有惠山寺、二泉、华孝子祠和纪念吴太伯的至德祠。又到锡山观看名联：“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期湖水水平湖。”再到将惠山、锡山连成一片的愚公谷，此谷为明万历湖广提学邹迪光所辟，邹号愚公，故名。最后来到著名的借景园林“寄畅园”，此园为明正德年间所建，一进门有



选堂、张昕  
与无锡博物馆工  
作人员合影

乾隆御笔所题园名。内有唐陀罗尼经幢和宋仿唐的普利院大白伞盖神咒幢。下午游太湖鼋头渚，顺道参观梅园、天新台、招鹤楼和念劬楼，尽兴而归。

**常熟** 27日从无锡到常熟，由常熟县文管会黄步青先生和柯女士接待。上午登虞山，游虞山公园。有言偃墓、商逸民周公墓、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及萧统像、琴川等。午餐后由柯女士陪同参观常熟最大的苏绣厂。下午参



江苏常熟兴  
福寺方塔

观兴福寺塔。此塔为四方空筒形砖塔，俗称“方塔”，总高67米，有四面九层，逐层递收，立面轮廓呈抛物线状，翼角起翘，塔顶为盔帽形，曲线柔和流畅，造型和结构都很有特色。方塔始建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咸淳加修。又驱车到常熟城郊陈家桥谒清代画圣王石谷先生墓，据说附近尚有黄公望、翁同龢先生墓，因时间关系，不及前往。在汽车往苏州的路上，饶先生向司机打听明末遗老钱牧斋先生墓地，司机称未听说过；下车





选堂在常熟郊野发现明末遗老钱谦益墓地



选堂、张昕在苏州博物馆

询问路人，也无人知晓。但先生似乎心有灵犀，坚信就在附近，于是下车四处寻找，终于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在一片荒野中，展现一巨型墓碑，上书“明赠官保礼部尚书景行钱公之墓”，其墓旁有记：“公讳世扬，字称孝，号景行，邑庠生。子谦益，孙上安，曾孙锦城俱祔葬。嘉庆廿四年七月，奚浦鹿园两支族同立石。”饶先生说，这是钱牧斋没后，祔葬于其父之侧，遵王时有所忌讳，不敢竖碑，至嘉庆间方由宗族立碣。而钱泳所立者但题“东涧老人墓”，旁记“集东坡先生书，尚湖渔者题”，可见仍有所畏忌也。翁同龢与牧斋为同乡，有《东涧老人墓五律》云：“秋水堂安在，荒凉有墓田。孤坟我如是（注：墓与河东君邻），独树古君迁。题碣谁摹宋，居人尚姓钱。争来问遗事，欲说转凄然。”可见钱氏后人之萧条。饶先生说，有人告诉他，常熟县城犹有河东街，以蘼芜所居得名。而其墓在拂水岩，与东涧相去数武，规模宏伟，则为陈文述官常熟令时所修，今亦倾圮矣。因作《常熟吊柳蘼芜文》。文用赋体，上阕开头云：

惟冬初之凄厉兮，忽临晚乎吴中。  
陟虞山之渐渐兮，俯尚湖之泂泂。  
抚东涧之坏碣兮，邻拂水之閤宫。

下阕结尾云：

惟夫人之绸缪兮，无救乎家变之相攻。  
竟一死以殉之兮，有重于泰山之崇。  
凛惊风之殒叶兮，信芳草之埋英雄。  
诉我愤懑而献吊兮，泣斜日于寒虫。

凄厉愤懑，令人感慨不已。



**苏州** 28日到苏州，驻南林饭店。苏州市博物馆张英霖、姚世英馆长前来迎接。苏州博物馆的藏品富有特色，就展品而言，一是苏州新开河出土的战国青铜器群和市郊出土自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陶瓷，都具有明显的吴文化特点。二是1956年修复虎丘塔中发现的五代至北宋文物，以及1978年在瑞光塔发现的经卷、经幢、经袱和佛像等。三是明末遗民的画展。饶、张两先生对画展尤感兴趣。陪同他们参观，听听他们的议论，就如同上了一堂生动的画论课。他们认为，遗民作品奇肆豪放，不守绳墨，磊落昂藏的气魄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蕴蓄其间。如石涛的奇肆，石溪之苍古，八大之精练，龚贤之纯厚，梅清之秀逸，查士标之爽利，莫不独具风采。饶先生对近年在昆山曹澄墓发现的《青天歌》作者，更有

选堂、张昕  
与苏州博物馆张  
英霖、姚世英馆  
长留影





选堂与曾宪  
通在石涛故居

精湛的研究。曹澄墓出土的《青天歌》，因署名徐渭，论者或目为伪物，或误以《青天歌》为徐渭所作。先生据元王价《青天歌注》，断《青天歌》乃长春真人丘处机之所作。并指出：“王注谓其演音三十二句，乃按度人经三十二天运化之道，奇辞奥旨，赖以抉发焉。曹墓所出，知明人喜诵此诗，故形诸楮墨。徐书狂放，颇异常规。今睹原卷，似鹭鸟之乍飞，若崩崖之可怖，洵为上上妙品也。”对于世人的议论，先生则以为：“遗迹信足振采，则书者何庸刻舟。”可谓见解独到矣！因作《论书次青天歌韵》长诗以和之。

第二天上午游苏州园林，走马于拙政园、留园、狮子林和怡园，这些把私宅和花园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古典园林，集建筑、假山、水池和花木为一体，使人不出城郭而享山林之怡。还特地到石涛故居去观赏石涛假山，二位先生从不同角度照了不少照片，流连忘返。下午游



选堂与张昕  
在石涛故居

太湖东山，来到紫金庵，寺院仅一殿一堂，规模不大，然寺中塑像技艺精湛，神形兼备，名闻遐迩。在展室看到澄湖出土的鱼篓形黑衣陶壶，器上有五个刻符，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遗物，引起先生的关注，以为很有研究价值。遂详为考释，其成果收进后来出版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中。

第三天游寒山寺、虎丘、灵岩山寺和天平山。寒山寺位于城西阊门外枫桥镇，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因唐代高僧寒山来此主持而得名。唐天宝年间诗人张继途经枫桥，写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名句，从此钟声诗韵，传诵千古。现寺院有山门、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左右两侧有罗汉堂、钟楼、枫江楼、霜钟阁和碑廊等，整个建筑以曲廊贯穿全寺。虎丘在城西

选堂在石涛  
故居



选堂在太湖  
东山紫金庵



北，传说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由于风景优美，历代文人在此留下不少遗迹。现存古代建筑仅有宋初云岩寺塔和元代断梁殿二处。主要景点有海涌桥、憨憨泉、试金石、真娘墓、孙武子亭、千人石和剑池等。山顶上有虎丘塔始建于五代末年，成于北宋初年。凡七级，呈八角形，全为砖砌，不用寸木，在建筑史上是个创造。灵岩山岩壑奇秀，泉石清幽，林木苍翠，殿阁参差，景色佳丽。传说春秋时吴越争霸，越王勾践献美女西施，吴王夫差在此筑“馆娃宫”，与西施同乐。历代文人名士都曾到此访古探幽。灵岩山寺坐落在馆娃宫遗址上。东晋时始建，之后屡有兴废，现存寺宇规模宏伟，多为民国高僧印光法师重建。灵岩山寺是目前中国佛教净土宗的著名道场之一，在东南亚一带颇有声望。1962年我陪容庚先生来访，当时的妙真法师招待容老观看寺藏书画，吃素菜，并在方丈房过宿。今天看到当年的接待室里只存妙真法师遗像一帧，心中十分怀念，感慨万端。驱车来到天平山，此山以怪石、红枫、泉水著称三绝，且有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政治家范仲淹以及清初帝王的许多遗址和遗迹，景点遍布山麓，形成园林式的山景人文景观。山上花岗岩石纵横错落，好似无数古代的朝笏。著名的“一线天”两崖对立如门，仅容一人上下，形势奇险。饶先生兴致极高，必欲亲身经历，同行数人拥着先生拾级而上，虽小雨亦无大碍。尽管先生已过耳顺之年，然步履稳健，毫不气喘，一直登上山顶亭台，俯览群山，极目太湖全景，但见芦苇片片，渔舟点点，景色宜人，胸襟为之一爽。

**上海** 12月1日从苏州来到上海，住锦江饭店。第二天到河南路上海市博物馆参观，沈之瑜馆长在迎宾室接待了饶宗颐先生和张昕先生。沈馆长从库房里提出十几件最近收藏的青铜器，让我们手自摩挲，把玩良久，不忍释手，逐件作了释文。接着一连两天都泡在陈列室里，尽情享用馆内丰富的收藏。除整体浏览之外，我们重点观看了铜器馆、陶瓷馆和绘画馆，内容非常丰富。许多过去见于名家著录的重器、名器，现在都一一呈现在眼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赏和研究，并做详细记录。

4日到上海松江县城参观，县文化馆杨嘉祐、李俊杰先生接待。松



江古称华亭，春秋时吴王寿梦在此“始筑华亭”，秦汉置华亭县。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吴主孙权封陆逊为华亭侯，这里是陆逊的封地，此后在江南一带一直很繁荣。五代时造兴圣教寺，北宋建塔，元至元改县为府，建华亭府城皇庙，造壁有大型雕砖。抗日战争期间，寺、塔、庙荡然无存，但造壁仍保存完好，有麒麟像，为洪武三年（1370）所造，其实是怪兽。还有鹿



选堂在松江  
考察唐代大经幢

（禄）、猴（侯）等图饰，其中“莲生三戟”则谐音为“连升三级”，寓意深长。附近有唐大中十三年（871）经幢，又称唐陀罗尼经幢，高9米多，原一半埋在地下，上下各3米，是唐经幢中的杰作。这里曾经是地灵人杰，名家辈出，仅松江籍画家就有董其昌、陈继儒、莫石龙等人。位于中山路西河边的董其昌旧宅，现已不存，只有董氏所书“尚书坊”牌坊的遗址。下午参观松江博物馆，会张兰森先生。这里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刻花陶盆和陶壶，有凤凰山出土的春秋末期镶嵌盘蛇纹青铜尊，有陆机写给同邑人的《平复帖》（原件在故宫），有明刻皇像草书《急就章》，有倪云林的小像和墓铭合刻的墓志铭，有南宋朱熹手书的《易经》刻石以及严衍的草书手卷等，都是松江金石文物的名迹。

5日上午又回到上海博物馆，专看陶器的刻划和纹饰，如1974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出土的灰胎黑陶划纹罐，半坡型彩陶动物纹饰，大汶口划纹黑陶片和上海马桥出土陶器刻划等。下午参观城隍庙和豫园，并拜访了施蛰存老先生。6日乘79次“沪昆直快”离开上海到杭州。

**杭州** 12月6日下午列车抵达杭州，浙江省文管会文物处周中夏、梅福根先生前来迎接，住杭州饭店。第二天到浙江省博物馆参观，由陈列部徐润芝女士陪同。浙江省博物馆展品有两大特色：一是富有东南地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在距今7000多年的文化层第四层，出有敛口罐、圈足盘、方盂、刻划陶盆等陶器，还有木器，发现了建筑史上最早的木榫结构。在第三层和第二层（分别距今6000多年和5000多年）发现了不少河姆渡人的原始艺术，如象牙雕刻、鱼藻、猪纹、兽纹以及双鸟朝阳纹等。此外还有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许多器物，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人已具有相当水准的生产力和艺术观。二是富有吴越文化特点的青铜工艺，如绍兴出土的越王矛，鄞县出土的钺及矛，长兴出土的“越王州句自作用剑”，以及青铜钺和青铜戈、铍等，都有浓厚的越文化色彩。他如1974年鄞县韩岭出土的青铜编钟，1976年德清出土的原始瓷钟，1976年绍兴出土的配儿句罍，以及从里安征集到的麦鼎等，都是十分难得的珍贵资料。下午在徐女士陪同下

选堂在杭州  
浙江省博物馆



参观了在博物馆附近的西泠印社。印社成立于1903年，是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团体，社址设在西湖孤山，社内亭台楼阁，古木参天。这里有清代篆刻名家丁敬的石刻坐像、邓石如的石刻立像以及近代篆刻家吴昌硕的铜像。在“汉三老石室”中保存着极其珍贵的汉碑。该碑于1852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吴昌硕等为了阻止该碑外流，集巨资将它买下，并造碑亭妥为保存。饶先生一行特地在石室前照相留念。

8日游西湖。从市区经柳岸闻莺到花港观鱼，这里有大片柔软草坪，种植很多名贵花木，沿湖有漫长的花径和竹阁长廊，开辟大型锦鲤鱼池，真正具备有花有港有鱼的特色。乘船来到湖中最大的绿洲“三潭印月”，据说当年苏东坡疏浚西湖时，在湖中心三个深潭处特地造了三个瓶形的石塔作为标志，禁种菱芡，防止湖泥淤积。后来又加筑了圆形的堤埂，成为“湖中之湖”，是湖中最优美的公园。又乘船到湖心亭，这里绕岛皆水，环水皆山，可眺览苏堤、白堤及周围湖光山色。经湖心亭纪念塔在岳坟上岸，游岳庙。再乘车来到灵隐山麓的





选堂在杭州  
西泠印社汉三老  
石室前留影

灵隐寺。这里是杭州最大的佛寺，由僧人慧理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创建，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在的庙殿是清顺治年间所建，大雄宝殿高45米，宏伟庄严。灵隐寺前有飞来峰，山峰奇突，峰下有龙泓、玉乳、青林等洞景。半山上有翠微亭，原是南宋名将韩世忠为纪念岳飞而造的。飞来峰石壁凿刻有精美绝伦、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佛像，据说不少是五代和宋朝的作品。

9日游六和塔。此塔在钱塘江边的月轮山上，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共九级，后毁。宋绍兴年间重建，改为七级，元明以来屡毁屡修。1953年重新修建，占地一亩三分，外表为八角形，塔高约60米，外观为13级，内分7层，拾级盘旋而上顶层，可以远眺钱塘江景色，气魄雄伟，是杭州著名的胜景之一。饶先生因心仪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意欲作一番实地考察，收集画稿。因驱车从钱塘江口沿富春江岸西行，登严滩钓鱼台，领略江山钓滩之概。因下午即将离开杭州，不能远行，便匆忙折回饭店，准备行装，拟乘79次“沪昆直快”前往衡山。临行与张昕先生话别，彼此都有点依依不舍。结伴同游，既是一件乐事，也是一种缘分，是很值得珍惜的。

**衡山** 12月10日到衡山。南岳衡山自然风光绚丽多姿，山势雄伟，古木参天，历代帝王常到此巡狩祭祀，也是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南岳大庙系宫殿式九进间建筑，可与岱庙、嵩庙匹配。此外还有佛教丛林的祝圣寺，七祖道场的福严寺，日本佛教曹洞宗视为祖庭的南台寺，以及珍藏明太祖赠大藏经的藏经殿等，都是驰名中外的文明奥区。先生有《衡岳用退之谒衡山庙韵》诗云：

丹灵四顾廓然公，敢谓须弥在掌中。  
下视紫盖如培楼，天柱石廩丧其雄。  
潮阳太守尝到此，绝顶未登胜难穷。  
精诚能扫三峰雾，炎方洞想高风。  
黄帝盐传古乐曲，霓裳仿佛神相通。  
落日亭皋遥望久，清词野鹤唳清空。  
厚坤万古称赤帝，简书分明陈祝融。  
马祖庵前哀磨镜，邺疾祠畔思巍宫。  
一从霜雪交摧折，山花尚放浅深红。  
于今祠宇空无有，升阶何以明至衷。  
灵期曩记人莫识，成行松柏徒鞠躬。  
庙貌诚可比嵩岱，岳渎佳气古今同。  
我行万里斯仰止，欲觅怀让与韩终。  
俯临突兀峰千百，征车立可收奇功。  
来时冥冥羌昼晦，归去云雨兼瞳眈。  
神仙邈矣不可接，何必苦索东海东。

饶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宗教学专家，对衡山在宗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了如指掌，但这次来到衡山，其兴趣似乎不仅在于宗教的精神世界，而更在乎山水的自然神韵，他在参观大庙和寺院的同时，更急于去观赏起伏的峰峦和攀登衡山之绝顶。据介绍，衡山共有七十二峰，头在衡阳的回

雁峰，足在长沙的岳麓峰，而以祝融、石廩、天柱、芙蓉、紫盖为最高，其中祝融峰为衡山之绝顶，海拔1290米。当先生登上巅峰时，乱云穿度，狂风呼啸，夹着浓浓的水气和细雨，大家急忙走进上封寺一避。上封寺原名光天观，隋大业改今名。寺后有望日台，为元至元十三年（1276）建，侧有“观日出处”。不一会儿，雨过天晴，站在望日台极目天际，峰峦叠嶂尽在眼底。先生有《登祝融峰绝顶》七绝为证：

岭似儿孙相率从，凭高喜见九州同。

陇岷嵩岱都行遍，更上朱陵第一峰。

第二天参观船山书院和王船山纪念室，晚乘15次“京广特快”返广州。

在返回广州的列车上，我向饶先生请教有关治学方法的问题，当谈到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时，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胡适有三件事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一是他与反对他的人不但能兼容，而且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他每天要花不少时间给反对他的人写信；二是他的老婆是个小脚女人，而他有那么高的地位，但仍从一而终，不找时髦的女人；三是始终坚持他的方法论，即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又说：“胡适的小心求证是可取的，但是大胆假设就不一定对。由于他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不够，外国的基础也不够，所以他所提出的假设是脱离实际的。他的前提错了，就往往会劳而无功。而且求证的方法也太烦琐了，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先生这一席话，令人茅塞顿开。

**广州** 12月13日晨抵达广州。广东省社科院杨越先生前来迎接，住广东迎宾馆。上午饶先生拜会广东省高教局局长林川，由我汇报此次全程陪同饶教授在国内进行学术考察的情况，先生对林局长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晚间由林局长假座东方宾馆餐厅为饶先生洗尘。次日，宾馆里备有文房四宝，先生为应各方好友的请求，馈赠墨宝，即兴挥毫。

最后，先生用秀雅流丽的行草给笔者写了一首唐诗，正欲落款，先生停笔问道：“你的‘大号’？”我说：“晚辈只有贱名，未敢自号。求先生赐号！”先生稍加思索，便在上款写下“经法贤棣”四字。这就是笔者“经法”一名的由来。下午，饶先生在潮州的亲人前来团聚。12月15日，先生乘广九直通车返回香港。

关于这次历时三个月的旅行，先生在后来的著作中间亦有所提及。2002年8月，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先生“八五”大寿举办“饶宗颐教授书画展”，在“饶宗颐先生书画艺术研讨会”上，当我提及当年同饶先生在国内这段经历时，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宪通与我有过三个月的共同生活，我们一起跑了十几个省市，看了33个博物馆。

又说：

其实还不止这三个月。在那以前，我曾到巴黎开一个文字学会议，那个时期大家讨论世界文字，发表了许多论文。接着我又到日本去，不断地讲学、旅游，一直呆了三个月，还写了一百首诗。所以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一年，获得很多的知识，至今不忘。很多人在一生中都有很多的奇迹。我那一年的健康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从欧洲一直到日本和中国，持续不停地走，精神一直都很好。所以说有一些东西是天给的，假如有上帝，可能是上帝赋予我的一种体力吧！（见唐朝轶《学贯中西，入古出新——汕头“饶宗颐先生书画艺术研讨会”纪要》，载郭伟川编《饶宗颐的文学与艺术》484~497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出版）

2003年，先生将荣休以来所作诗词结集为《苞俊集》。现在我把先生在《苞俊集》所写的一段引言作为本文的结语。先生写道：

余自退居以后，足迹几遍禹域，舟车所至，未废吟哦。友人冯康侯取亭林语为刻一章曰：“九州历其七 五岳登其四。”行经华岳时，值悬空链断，不获攀陟，无可如何！昌黎犹临崖而号咷，予则尚未识其险也！若岱岭虽登，恨未兴咏，齐鲁青葱，终古未了，以杜公诗在上头，何敢饶舌耶！记清刘继庄登南岳句云：“圣人久不作，岳渎为短气。”然不久遂有船山之出。盖山川荐灵，纵不登昆华，亦有玉英之可采，荣苣之可结。苞俊咀华，是在其人耳。（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第606页，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出版）

（原载《华学》第七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 附记：关于选堂访古照片的说明

1980年深秋，选堂先生北上访古，女公子清芬小姐特地为先生此行准备了一部新出的简便照相机（俗称傻瓜机），并上好菲林，随时可以使用。从成都出发，路经兰州和敦煌，选堂先生兴致勃勃地在诸多景点照了不少留影。到了西安，眼看照下的次数已经超过菲林的张数了，可相机为什么仍然没有打住？拿到照相馆打开一看，原来菲林还在原处不动。照相馆的人员说，这是装菲林时没有装好的缘故。吃一堑，长一智，只好向照相馆的专业人员学习如何装好菲林。饶先生说，新的东西因为缺乏经验，不一定好用。之前浪费不少表情，固然可惜，更加可惜的是在敦煌的许多宝贵镜头无法弥补了。这就是本组访古照片为什么开始于西安的原因。当然旅途中也有因菲林不济而漏拍的。旅行结束后，部分照片由先生保存，这里采入行文中的照片，就是由本人保存的主要部分，其间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霜，如今献给读者的，只是硕果仅存而已，然亦弥足珍贵矣！

——曾宪通补记于癸巳正月

# 我所认识的饶宗颐大师

今天有幸到伟南先生国际会议中心跟大家见面，潮州市社科联领导要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饶宗颐大师。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太容易做，因为饶先生的学问实在太渊博、研究领域太宽广了。如果用个把钟头的时间来介绍，光是书名和篇名就恐怕念不完，即使念出来，听者也可能会不知所云的。所以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就是讲讲我从近距离接触、观察和了解到的饶宗颐先生。现在先说一说自己跟饶先生的一段情缘。

## 一 我和饶宗颐大师的一段“情缘”

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先后在潮州、汕头念初中和高中。1955年秋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我第一次拜见我的导师，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教授时，他听说我来自潮州，劈头就问：“你是潮州来的，你认识潮州才子饶宗颐吗？”老实说，解放初期由于政治运动不断，信息闭塞，一个中学生是不太可能认识饶宗颐先生的，所以我只能摇摇头。老师看着我满脸狐疑的样子，显得很不高兴，就指着饶先生刚从香港寄给他的《老子想尔注校笺》说：“这就是潮州才子的新作《老子道德经》！你来自潮州还不认识潮州才子饶宗颐，能算是个合格的潮州人吗？”老师的这番话对我刺激很大。后来我才知道，容老师的两个好朋友——顾颉刚和钱穆很早就跟饶先生有过笔墨交情。饶先生在顾颉刚主编的《禹

贡》上发表文章，与当时的学术权威钱穆论战过《楚辞》的地名和江名；顾颉刚非常赏识饶先生的胆识，请他主编《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自从听了老师的那番训词之后，我便在图书馆和老师家里尽量寻找饶先生的书来看，希望有机会接触和了解这位深受学界推崇的饶宗颐先生。

过了二十多年，机会终于来了。那是1979年的冬天，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中山大学召开。这个会议由我的另一位导师商承祚教授召集，我负责秘书处的具体工作。我们把饶先生作为第一位境外学者请来赴会。饶先生当时刚刚从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教授”岗位上荣休，便欣然应邀出席。这是他离开大陆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内地参加会议，当时的省领导非常重视，时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先生特地在广东迎宾馆设宴款待饶先生，还找了一些跟饶先生比较熟悉的人作陪，我也有机会忝陪末座。席间，吴书记对饶先生说：“希望先生今后多回内地走走，多回家乡看看！”饶先生显得很激动，他说：“我从小研究《楚辞》地理，读过许多地方志，对各地地名非常熟悉，可是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到过。自四九年离开潮汕，到今年刚好三十年。三十年第一次回来，真的很想到处去走走，去看看！”吴南生书记当着在座的高教局林川局长说：“宪通跟着容老、商老到过不少地方，比较熟悉。饶先生什么时候来，就以高教局的名义派中山大学的曾宪通全程陪同，也是向饶老学习的大好机会。”林川局长马上表示支持，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会后，饶先生便专程到长沙洞庭湖畔去实地考察《楚辞》的地名和江名。

第二年，即1980年9月下旬，饶宗颐先生到四川成都参加第三届古文字研究会，先生这次还率同日本、香港等一批海外学人前来赴会。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才称得上真正的国际性研讨会了。饶先生在会上宣读了题为《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的论文，引起热烈的讨论。会后，我陪同饶先生从成都出发，先后到过兰州、敦煌、西安、洛阳、登封、郑州、开封、武汉、荆州、奉节、安阳、北京、承德、济南、泰安、曲阜、南京、扬州、镇江、无锡、常熟、苏州、上海、杭州、衡山等地，一共走了十一个省市，参观了三十三三个博物馆。历时三

个月，行程数万里。先生回香港后，特意请名家刻了一方“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的印章，作为纪念。

饶先生这次在内地旅游和考察，首先到各地参观博物馆的展品和藏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是中国考古发现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在我们到达每个地方之前，香港新华社通过北京国家文物局已行文到各地的文化局和文物局，请为协助接待饶宗颐先生和安排参观事宜，故所到之处都受到周到的接待和欢迎。饶先生一进博物馆，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彩陶，先秦时代的甲骨、铜器、货币、玺印、竹简、帛书，到秦汉以后的石刻、碑帖、写本和各种书画、艺术品等，都一一目验，有的还要亲自摩挲。常常是看过展室的展品仍不满足，还要到库房里去看藏品。饶先生说，好些东西过去只在书本上看到，现在有机会见到实物，就不要轻易放过；还有许多新出土的东西是从未见过的，更要仔细琢磨，命我做详细的记录。其次是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写生、吟咏。先生这次登泰山，游三峡，一路写生，不但亲自领略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也为其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如登泰山，他特地到经石峪考察和拍照，成为后来创作“心经简林”的先声。又如登白帝庙观夔门峡，可以俯览赤甲、白盐二山所形成的峡谷如门的壮观。先生站在休息室外的岩石上，居高临下，又写生，又摄影，忙个不停。先生每到一处，常常应接待者的请求，即席挥毫。或兴之所至，吟诗应对，抒发情怀。可惜当列车经过华山时，听说山上发生悬空链断，伤及游人的事故，因而取消了攀登西岳华山的计划。因为先生非常崇拜韩愈到过华山而“临崖号咷”，这次为自己不获攀临，未识其险，没有机会同韩愈和诗而感到无可奈何。此外，这次旅行还会见了许多学界名流，拜访了老朋友，结交了新朋友，估计在百人以上，也是难得的收获。总之，饶先生在这次旅行中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量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会见了大批故旧新知，兴奋异常。在旅途中，他一直思考着用什么课题可以反映这次北上访古的收获。由于先生对楚地的人文历史和出土文物情有独钟，所以，当他看过楚地出土的许多文物后，就同我商定好一个研究课题，叫“楚地出土文献研究”。包括三大内容：一是湖北云梦出土的



秦简《日书》；二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磬；三是湖南长沙出土的《楚帛书》。并邀请我于第二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楚地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

秦简《日书》是1975年从一座秦始皇三十年的墓葬里发现的，共有两个写本。墓葬的年代虽然在秦，写本的年代可能早至战国，有可能原来就是楚国的日书。所谓日书，就是选择时日宜忌，预测人事吉凶的“择日通书”。秦简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有关秦国的法律文书，日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七十年代我在北京参加过这批秦简的整理工作，当时有人认为日书是属于封建迷信的，所以第一次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的秦简释文时，并没有日书的内容。这次饶先生到北京，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设宴招待，把刚刚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赠送给饶先生。先生发现发掘报告中有过去尚未公布的秦简《日书》两个写本，如获至宝，认为它是古代数术的重要内容，因而萌发研究秦简日书的念头。我到香港的第二年，即1982年5月，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就出版了。这是系统研究秦简《日书》的第一部著作。饶先生对日书中二十多个项目进行了透辟的论述，揭开秦简日书神秘的面纱。并写了“卷前语”阐明日书研究的意义，还特意推荐我所写的《秦简日书岁篇讲疏》一文，说是在他提出“日夜分平”的基础上证明“分平”即春、秋分，并论秦简“日夕七式”与汉人七舍、七衡及十六所的关系，“研究更为深入”。先生奖掖后辈可谓不遗余力。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教授在《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评论说：“饶宗颐 and 曾宪通坚持了中国学术的传统，值得赞扬。他们博大精深的评注涉及广大的领域，成功地展现了秦简日书隐而不露的意义。在这卷精炼的书中，差不多所论述的每一个条目都会有助于历史学家们去探讨中国的宇宙观。”让学术界对日书刮目相看。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编磬是1978年发现的，从墓中出土的一枚楚王钟可以知道，这些钟磬是在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年）下葬的，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了。这套编钟群共有八组六十五枚，上面刻有错金铭文二千八百多字，分别标记着曾国的音阶铭和列国的乐律铭。伴出

的编磬也刻有同类的铭辞。饶先生把我们合作的第二部书的书名，就叫作《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此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钟磬铭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通过钟铭所记载的列国律名的歧异，来看乐律思想的演进，从而说明汉代乐律学的来龙去脉。进而根据编钟的音高体系，来阐释所有的标音铭和乐律铭的确切涵义，证明我国战国初期的乐律学，已具有很高的水平。该书于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被音乐界誉为中国乐律学的奠基之作。

“楚帛书”纵38公分、横47公分，上书蝇头小字近千文，四隅及周边绘有青、赤、白、黑之四木及十二彩色图像，是一幅图文并茂的十分珍贵的古代墨书真迹。1942年在长沙南郊子弹库由土夫子（盗墓者）盗掘出来后，为古董商蔡季襄所得。几经辗转流到了国外，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饶先生六十年代在美国有机会见到这件实物。在楚帛书传到国外以前，国内只留下一个摹本，是由蔡季襄的儿子蔡修涣靠肉眼摹写的。当时他能识别的字不足五百个，还不到帛书原文的一半。后来日本出了一张全色照片，就是用黑白相机照出来的，比肉眼看到的效果好一些，学术界能认识的字可以增加到六百多个。不久，饶先生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楚帛书研讨会，会上用的是红外线照片，效果更佳。但却有好些海外学者对帛书提出质疑，认为是后人造假的，里面的一些图画也是假的。饶先生在会上舌战群儒，他举了五条证据，论证楚帛书确是楚人的作品，不可能是假的。帛书的藏主非常高兴。会议结束以后，收藏者特地把原帛书放大十二倍的照片（共接印为110幅）空邮寄来送给饶先生。楚帛书的原字本来只有绿豆般大，放大后变成拳头那么粗。饶先生就是靠着这套放大的红外线照片，多认出了一百多个过去无法辨认的帛文。就这样，接近千字的楚帛书基本上就能够读通了。原来楚帛书是一幅图文并茂的缣帛，帛面由三部分文字所组成，中间是两篇互为颠倒的短文，8行的一篇讲的是创世神话，13行的一篇讲的是天象，四围的边文，则分别是十二个月的行事宜忌，并配以十二月神的彩色图像。从中可以看出，帛书的构图别出心裁，寓意耐人寻味。饶先生把我们合作的第三本书的书名，就叫做《楚帛书》，1985年由香港中华书局

印行，书中有饶先生所作的楚帛书新摹本和楚帛书新证，以及本人所作的楚帛书研究四十年和楚帛书文字编，是研究楚帛书的资料和成果最为集中的著作。

上面讲的是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受聘为访问副研究员，前后两年多的时间，在饶先生的指导下合著了三本著作。去年在饶宗颐先生九十大寿的祝寿会上，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我陪饶先生在国内走了三个月，在香港合作出了三本书，有幸参加过三次祝寿会，这三个“三”使我跟饶大师结下了难忘的情缘。这个“缘”影响着我一生所走的学术道路。

## 二 饶宗颐大师的家世和经历

有关饶宗颐大师的“家世和经历”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我就不多讲了，这里只简单地略为介绍。饶先生的祖先原在江浙一带，到宋代大概是理宗年间才开始离开。宋末因避战乱从福建进入广东，先在大埔落户。在大埔经过了十一代，都在农村务农。十二代以后转到潮州来，还是农民。十三代后进城，开始做小生意，此后就慢慢地发迹、发达起来。到十六代已经是潮州的首富了。传到先生的父亲饶锬正好是第十八代。饶锬字纯钩，是个精通佛学和地方文献的学者。先生出生于1917年，即农历丁巳年的六月二十二日。他为什么叫宗颐，是他父亲希望他能像宋代五子之首的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先生字伯濂，又字固庵，号选堂，他自己都有文章解释这些名号是什么意思。先生出生的时候家里的条件非常好，他自己有一段话说：“我的家族可以说是潮安地区的首富，我的祖辈是商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的钱财，自己发行钱票。有钱就可以买书，大型的书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我们家都有。父亲喜欢买书，有个藏书楼叫天啸楼。伯父是个画家，会画山水，又喜欢收藏，收藏了很多拓本、古钱，数量多达数千种。”可以想见，先生从小就受到古代典籍和书画古董的熏陶，条件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了。饶先生自己也说：“现在

的大学生毕业了都未必有我六七岁看到的東西多。”再加上先生的天分高，資質好，他長時間在知識的海洋里浸泡，自己的知識就像海綿一樣膨脹起來。先生六七歲就能寫小說，集詩稿。七八歲時寫過《后封神榜》，16歲發表過《詠優曇花》詩，引來很多老宿以為他是位老先生而競相唱和，可見先生從小就才華橫溢。18歲完成父親的未完稿《潮州藝文志》，20歲撰成《楚辭地理考》，與錢穆賓四先生有過激烈的爭論。關於《楚辭》的地名、江名問題，1979年先生來廣州開會後到洞庭湖去實地踏勘，再次證明《楚辭地理考》的論據是充分和可靠的。

先生21歲到30歲這段時間，主要是應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研究員，現在我們還能查到當年廣東通志館人員的名冊，他當年21歲。不久前我在《潮州日報》上看到一篇談饒先生在韓山師範學院代課的文章，作者姓名記不清了，大意是說：他父親跟他談起饒先生當年在韓師代課是十九歲，听课的学生有的年齡比他還大，不大願意听他讲课。校長出來做工作，說你們坐下來听听，如果讲不好就到此为止，如果讲得好再继续请他，只是他还不一定愿意来呢。听完课后，學生们都簽名希望校長把他留下來。那時，他还只是个代課老師。所以，先生其實只上过一年的中學，代過半年的課，就到中山大學去做研究工作了。前幾年中山大學八十周年校慶，請饒先生題詞，先生感慨地說：“我是在中山大學起步的。”饒先生在中山大學通志館是研究地方志的。那時全國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學校，除北京大學外，就算中山大學了。饒先生幼年在天嘯樓熟讀地方文獻，又到中山大學通志館研究地方志，所以先生對古地理、古歷史，特別是對廣東、潮州的地方文獻非常熟悉，善於融會貫通。由於參與《楚辭》地名的論戰，更使先生從紙上文獻結合到地下出土的實物，由廣東一隅之學發展到四裔之學了。

早在1938年，饒宗頤先生在香港協助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先生編纂《中山大辭典》的書名和篇名辭條，又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傳世文獻和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為研究文學、經學和古文字學打下了基礎。1949年饒先生因為編潮州志的關係再度來到香港。當時方繼仁先生是潮州志的資助人。方先生對饒先生說，你就不要走

了，留在香港做，资料与资金由我来提供，你可以在这里遥控汕头的编写小组。就这样，饶先生做出了人生中最大的抉择，没有回来，留在香港继续编写潮州志。1952至1968年到香港大学工作，出版了很有影响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又到欧洲、日本讲学、考察。这段时间，饶先生与海外的汉学界有广泛的接触，大显身手。值得指出的是，先生研究敦煌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大家知道，1900年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里面三万经卷随后都基本上被外国人拿走了。第一个拿走的是英国的斯坦因，第二个拿走的是法国的伯希和。1980年，我陪饶先生到敦煌，饶先生去敦煌有三个目的，其中之一就是看看没有流出去的卷子究竟还有多少，是什么内容。外面的东西饶先生都看过了，就是留在敦煌的东西尚未经目验。饶先生之所以能够看到流出海外的写本，是因为方继仁先生用高价把斯坦因的微型胶卷买下一套。当时那个价钱真是天价，只有日本人买得起，中国人是买不起的，可是方先生舍得花大钱，买下一套送给饶先生研究。从此，他开辟了一条研究敦煌学的新路子。饶先生研究敦煌学有两个开创性，一是给《老子想尔注》做了笺证。这是一部早期道教的经典，已经失传了，只有敦煌卷里保存着，先生把它找出来，与《太平经》及河上公《老子注》作比较研究，使道教原始思想之渊源与脉络灿然大明。法国宗教研究院因而把它列为道教的教材。他们把饶先生请到法国宗教研究院当教授，就是专门讲授这部书的。饶先生通过这部名著跟许多汉学家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北京大学在一百周年校庆时，第一个被请去作主题演讲的人就是饶先生，是哲学系请他去讲早期的道教，讲的专题就是“《老子想尔注》与早期道教的考古发现”。饶先生的另一个建树就是发现了敦煌白画。敦煌藏经洞里有很多画稿，这就是白画。大家知道，敦煌有五百多个洞窟，每个洞窟都有很多壁画，从隋唐一直到宋代，一层一层的，每层都是一圈一圈的，一直到洞顶。有人做过统计，如果将这些壁画一圈一圈地拉开，几乎可以绕地球一周。画壁画是需要打稿的，这些画稿也叫白描。过去没有人发现它的价值，是饶先生第一个把它们挑出来作专门的研究，写成一部著作叫做《敦煌白画》，书中根据这些画稿总结出壁画的各种类别和技巧，把有

关动物的、人物的、技法的、设色的，还有构图和布局的，都集中起来，分门别类加以探讨，这些对于研究敦煌壁画具有重要的价值，开辟了敦煌艺术研究的新领域。所以，饶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是世界性的。

自1968年到1973年，饶先生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段时间，他除了教务之外，还写了几部著作，积极与海外汉学界开展学术交流，还学会了梵文，研究了梵学。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知道，中国的古文已经够难了，但它是经过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中间没有间断过，所以今天看来并不是十分困难。可梵文与现代印度文脱节了，中间有断层，是接不上的，所以梵文很难学。当地人懂的少，专家更少。印度有个汉学家叫白春晖，他要学中国的古文字，特别是对甲骨文很感兴趣，他知道饶先生在香港大学出过一本甲骨文的书叫《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就让饶先生教他的甲骨文，由他教饶先生的梵文，作为交换。就这样，每周见一次面，每次三小时，学了三年就学会了。现在中国懂梵文的恐怕数不到十个人。还有另一种古文字叫钉头字，也就是西亚的楔形文字。饶先生又是怎么学的呢？上次来潮州为饶先生祝寿的法国学者汪德迈，是法国研究院的院长，他是饶先生的老朋友戴密微的学生。因为汪德迈的博士论文需要饶先生当评委，另有一位评委是西亚学的专家蒲德，他就是研究钉头字的。钉头字最著名的著作叫《近东开辟史诗》，饶先生通过汪德迈找到了蒲德，向他学习钉头字，然后用娴熟的文言文翻译了《近东开辟史诗》，让人读起来，就好像读屈原的《楚辞》一样，这也是翻译史上破天荒的大事。1993年中山大学聘饶先生为名誉教授时，他的主题讲演讲的就是《近东开辟史诗》，当时由我当报告会的主持人，请他给文学院的学生讲讲《近东开辟史诗》。这篇史诗讲的是人类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怎样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人和人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还同中国殷代的卜辞作了比较，讲得非常精彩。先生是用《楚辞》的笔法来翻译的，确实是翻译史上的杰作。饶先生很注意史与神的关系，《近东开辟史诗》既是史又是神，先生对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一个拓荒者，把近东的文化引进到远东来了。

1973年以后，饶先生又回到了香港中文大学，除了担任讲座教授之外，还有很多国外的任职。1978年9月他就退休了。退休之后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云游四海，不停地在世界各地飞，在国内到处走。前面讲过我在国内陪他走了三个月，其实这一年他走了两大洲，五个国家：一个欧洲，去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一个亚洲，先到日本，先生在日本不住酒店而喜欢住在庙里，日本的寺庙很多。这次他住在日本京都的三缘寺，一边讲学，一边作诗，一共写了一百多首诗。然后才到中国来，走了三个月，我送他回香港时已经接近元旦了。他自己说过，我这一年的体力不知是哪里来的，也没有生病，走了很多地方，做了不少调查研究，还写了很多诗，这一年总共写了两百多首诗。从饶先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没有停顿过研究工作的，特别是退休以后，由于解除了各种束缚，他的精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因为饶先生的性格是最不愿受到束缚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前离开新加坡的原因。他回到了中文大学特别是退休之后，就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现在的著作有一千多万字，恐怕有超过一半是在他退休以后写的。

饶先生的头衔很多，几乎每个著名的大学都给他一个客座教授或顾问教授的头衔，或给他一个名誉博士的称号。这不是他本人的需要，而是别人的需要。他最有影响的一个是60年代法国给他的“汉学儒莲奖”，他自己很高兴，饶先生学术馆里就有这个奖牌。再一个就是1993年由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个也是破天荒的，因为这个奖项过去只发给自然科学界，没有发给人文科学的。这是法国第一个发给人文学科的骑士勋章，而第一个获得这枚勋章的就是饶先生。还有就是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发给他一个“大紫荆勋章”，这也是当年比较重要的事件，荣获这枚勋章的消息，正好我和饶先生在台北参加国际汉学会，开头以为听错了，后来证明是真的。过去人们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余秋雨就说过，香港有饶宗颐、有金庸，香港就不算文化沙漠。所以，先生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去领这个“大紫荆勋章”，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的。



### 三 饶宗颐大师治学的特色

饶宗颐先生治学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就是渊博。自古至今，从渊博这个角度看，似乎没有第二个人。有几点值得注意：1984北京大学副校长、东方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根据饶先生的学术著作归纳出八大方面：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2003年，原来打算在广州出版，后来转在台湾新文丰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根据新的材料归纳为十四个方面（十四卷二十册）：即史源（即历史的源流）、甲骨、简帛学、经书礼学、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这里比季羨林先生所概括的“八大”有些交叉和重叠，有的独立出来，有的则是全新的，从中可以看出饶学的新发展。

如果就先生精通的语言来讲，他除了中文汉语之外，还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还有就是前面提及的梵文、希伯来文，和刻在泥版上的钉头字（即楔形文字），他还是第一个把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来，并同甲骨文作比较。其实他还懂我国少数民族的古文字，如西夏文、女真文。还有他最近指出明本潮州戏文里有蒙古语，如果他不了解蒙古文，怎么知道明代的戏文里有蒙古语？

从中国的传统文献来讲，历来把它归纳为儒藏、道藏、佛藏。去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在香港为先生贺寿时就讲，饶先生是唯一一位能够精通三藏的大学者。通一藏已经了不起，能够通三藏就更加了不起了。现在儒藏还未编出来，由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主编，估计得得上亿字。

除此之外，饶先生在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即兼通学术与艺术，他很自谦地说自己只是学艺“双习”而已，有人说他是学艺“双馨”，总之，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深具影响的。所以有人把先生列入甲骨文“四堂”（即雪堂、观堂、彥堂、鼎堂）中又加一个“选堂”，而饶选堂却比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多了一个艺术。从以上几

个方面来看，饶先生是够渊博的了。这样的人不论在古代、在现代，都是不容易找到的，可谓“独步古今”了。

第二个特点是精细或精巧。饶先生做学问的特点是动与静结合、文与物互证、史与神交融。而这些手法却是交叉和综合运用的。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先生受顾炎武的影响很深。小时候，他的父亲做《汉儒学案》，他也学着做《清儒学案》，重点研究的是顾炎武。对顾炎武做学问他最佩服的就是走路读书，不是关在书斋里读书，而是在调查研究中做学问。所以，饶先生经常到外面去“游学”，就是把读过的东西拿到实践里去验证、去拓展，饶先生一直坚持这样的学风。1980年我陪饶先生在国内考察，先生的行囊非常简单，但却随身带了两本书：一本《徐霞客游记》，一本《杜诗镜诠》，一路上不时翻阅。顾炎武这种走路做学问对饶先生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凡到徐霞客到过的地方，他一定要按图索骥，亲历其境，发思古之幽情。书上没有的，也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考索。举个例子，在从无锡到常熟、常熟到苏州的路上，他就一直在寻找钱牧斋的墓。在车上他反复地问司机，不知道。问路人，也不知道。到了一个荒野，先生好像心有灵犀，突然叫司机停车，说我们下去走走。果然在草丛中出现一堆荒冢，细看还有墓碑，被杂草覆盖着，拨开杂草一看，上书“明赠宫保礼部尚书景行钱公之墓”，其墓旁有记：“公讳世扬，字称孝，号景行，邑庠生。子谦益，孙上安，曾孙锦城俱祔葬。嘉庆廿四年七月，奚浦鹿园两支族同立石。”饶先生说，这是钱谦益没后，祔葬于其父之侧，遵王时有所讳忌，不敢立碑，至嘉庆间方由宗族立碣。可见，清代对前朝遗老的控制还是比较严的。饶先生的这个发现，恐怕当地人还不一定知道呢。

还有一个是台湾潮州城的故事。1993年我到台湾高雄讲学回来，路过香港时去看望饶先生。我向饶先生请教，台湾有个潮州城，为什么他们都不会说潮州话，这是怎么回事呢。饶先生说，他编《潮州志》的时候，其中有一章要编到潮州移民。文献记载台湾有个潮州城，饶先生就去做实地调查，可他们一句潮州话都不会说，讲的都是客家话。这

个谜怎么解开？后来他到中央图书馆找材料，可什么材料也找不到。再后来，他终于在新竹图书馆看到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叫《乌呼！忠义亭》，讲的是郑成功在南澳招兵，招了一批潮州人，到台南造了潮州城。郑成功是抗清复明的，潮州人支持郑成功，而客家人支持清廷打郑成功，后来郑成功失败了，客家人就占了潮州城。他说，如果后来没有找到《乌呼！忠义亭》这本书，这种事情恐怕谁也解释不了。这个例子说明做学问还是要到实地做深入的调查，才能解决问题。

文与物互证的方法是王国维提出来的。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是指纸上记载的文献要与地下出土的实物相互印证，在学术界深入人心，应用很广。饶先生在1982年提出“三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有文字的部分划分出来叫出土文献，构成传统典籍、出土文献和考古器物三重材料相互印证，很有说服力。举个例子，先生在湖北博物馆的库房里看到一对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衣箱，箱子上写有漆书铭文，其中一件书有二十八宿名，左下角有文六行二十个字，尽是古文奇字。展厅上只有摹本，没有释文，不可通读。谭维泗馆长遂请先生为之考释。当晚先生深入考察了漆箱上文字的整体内容，推测其必与天象、乐律有关，再联系古文奇字的形体、意义和音读，经过反复推敲，终于写出：“民祀佳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经天尝（常）和”二十个字。次日，先生向谭馆长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为博物馆展厅填补了一项空白。有意思的是，二、三句末字的“维”与“四”竟与谭馆长大名相应，更是巧合，闻者无不莞尔、折服。顺便指出，末句“经天尝和”的“经天”，最近先生据新出的楚简资料改释为“琴瑟”二字，整句应读作“琴瑟常和”，与先生原推测与音律有关更加切合。

饶先生的精细，也是潮州人做学问的一个特点。举个例子，先生在奉节白帝城看到“甘夫人之墓”，旁边还有“张飞守灵处”。一般的解释是，甘夫人死在襄樊，刘备死后，甘夫人的尸骨就被迁葬到白帝城来。饶先生敏锐地感觉到此说不可信。他的观点是，有张飞的守灵处就不是甘夫人的墓。应该是刘备的墓。很可能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才把

甘夫人的尸骨移过来合葬，张飞才会在旁守灵。所以，他怀疑墓中应是刘备，而不是甘夫人。只有这样解释，才与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传说相符。第二天，接待处人员证明，前一段时间在这里发掘出一条大型的墓道，说明里面埋的不是尸骨，而应该是一个大人物的墓葬。四川文物管理处也证明成都武侯祠后面的刘备墓只是衣冠冢而已。由此可见饶先生的判定是准确的，后来，先生的这一说法也得到考古文物界的确认。

饶先生治学的第三个特点是新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先生自始至终置身于二十世纪学术潮流的前列。学术界归纳二十世纪学术潮流经历了“信古—疑古—证古”三个阶段。少年时期的饶先生正是在“信古”的大环境中打下治学的根基的，但他并不一味信古；青年时期的饶先生即开始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在顾颉刚老先生的带动下，从事辨明古史与古书的时代和真伪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内地相继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古书，先生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重建古史的工作，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其次是学术的创新。前面讲到先生治学的十四个方面，有的是老学科，有的完全是饶先生新开辟的新学科。他的特点是从多个老学科的边缘处切入，开辟出一个新的支撑点，产生一个新的学科。例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及悉昙学等，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国际上称为三大显学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饶宗颐先生都是这些学科的开拓者和重要推手。先生长期在很多陌生的领域里辛勤地耕耘，不断地播种、开花和结果，建立一个个新的领域和学科。有人归纳饶先生的创新点，姜伯勤归纳为八个“第一”，胡晓明归纳有四十多个“第一”。我们平时管经济叫增长点，饶先生在学术方面，则可说是新学科的增生点，后面有很多人跟着他在做，这就是“导夫先路”的工作。

最后讲一讲饶宗颐先生成功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先生有超人的天资。他的天资是我们的韩江水与潮州土孕育出来的。如前所述，从祖上到他是十九代，如以三十年为一代计算，近六百年才孕育出这么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应该说是天下奇才。

第二个就是环境与机遇。饶先生自己就说过：“我今天成为一个学人，这是有因缘的。因缘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条件好，应该有的条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经历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的要做学问。”饶先生一路走来都是吉人天相。你看，二十岁之前，他主要靠家学、师承跟自学。二十岁之后，他是靠着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这位伯乐，登上了学术的殿堂。到香港后，先是为王云五《中山大辞典》写辞条；又为叶恭绰助编《全清词钞》，这些对做学问都是大有裨益的。再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方继仁先生。方先生把他留在香港，饶先生说这对他有得也有失。得的就是可以避开了内地各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专心致志做学问；失的就是天啸楼的藏书没有了，早年的手稿也没有了。香港和新加坡是先生走向世界的舞台，他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海外东方学的专家，可以学楔形文字，学梵文，还有学外语。总之有很多机遇，凡做学问该有的条件他都有了，用不着花时间去创造，这也是命中注定要做学问的。六十岁之后，正逢内地改革开放，先生才有机会在国内跑那么多地方，见到那么多珍贵的材料，有条件运用他多年积累的海外汉学经验，全身心地投入到丰富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去，写出那么多的著作来，突显他超人的才华。所有这些也都是环境与机遇造成的。

第三个因素是饶宗颐先生有良好的生活方式与养生之道。饶先生能出这么多成果，跟他的长寿直接相关，跟他长期保持精力充沛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尝说先生有三个“永不知”，即永不知足，永不知老，永不知疲倦，而且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在先生八十五岁诞辰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贺寿的小文，叫做《大师的童心》，提到“童心”就是先生长寿的秘诀。先生有很规律的起居习惯，吃东西也不多。在我有缘随侍左右的日子里，他总是准时六点起床，十点睡觉，中午不休息，要打坐。日本人教他打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胸式呼吸法，一种是腹式呼吸法。教他胸式呼吸的人先死了，所以后来他就不用胸式呼吸法了。为什么呢，因为胸腔是护住心脏的，胸式呼吸是要把自己扩张出去，很

用力撑开的，那胸就压迫心脏，胸跟肺之间有矛盾，以致心脏受损。腹式呼吸法就没有这个束缚了，腹部是可以自由伸张的。我们平时用脑，血聚在脑上，如果用腹呼吸，就可以调节心跟脑之间的血液循环。饶先生打坐讲究“五心向上”，即两掌心向上，两脚心向上，自己的心也向上。先生端坐的时候是从不靠背的，总是笔挺挺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是精神抖擞的样子。先生走路长期养成脚跟先着地的习惯，好处是稳健，不易前倾；第二个好处是脚跟先着地，可以通过脊椎将动力传到大脑。由于先生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能够活得这么长寿和精力充沛。先生不仅愉快地欢度过“米寿”，而且正满怀信心地迎接“茶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米寿的“米”是指八十八岁，茶寿的“茶”则是在“米”上再加“艹”（二十），就是一百零八岁了。我们祝愿他老人家越来越健康长寿，安享“茶寿”之福，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

（此文为曾宪通在韩山师范学院伟南国际会议中心的学术演讲稿，由韩师中文系王奎光博士据录音整理，原载《潮州社科》2008年第一期）

## 大师的童心

今天是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八十五华诞的大喜日子，我作为亲受饶先生栽培的后辈学生，感到由衷的高兴。借此机会，祝愿我们的寿星公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饶先生十六岁写了一首《咏优昙花》诗，一鸣惊人，开始涉足学术和艺术领域。从那时候算起，到现在正好七十个年头了。七十年来，饶公足迹遍及世界的四大洲和神州大地，写了五十多部著作，四百多篇论文，共一千多万字的鸿篇巨著，此外还有无数的书画佳作，是当代集学术与艺术于一身的一代宗师。这是我们全球潮州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潮汕地区的骄傲！

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20世纪初至90年代，正是中国学术处于“信古一疑古一证古”的转型时期，饶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七十年中，一直置身于每一个历史潮流的最前列。不消说，少年时期的饶先生正是在信古的大环境中打下治学的根基的，但他并不是一味地信古，青年时期的饶先生，即开始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继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提出古书的真伪和年代问题之后，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古史辨》，就是专门辨明古史和古书的时代和真伪的。其中第八卷有关《禹贡》的内容，由顾老专请饶先生主编。1980年饶先生在国内作长时间的学术考察，特地到北京医院探访了90高龄的顾颉刚老先生。顾老见到饶先生，寒暄之后就马上说：

“你当年编的书稿还在我家里，我一直保存着呢。”饶先生很客气地说：“那是我小孩子的时候写的，还请顾老多多指教。”这二期《古史辨》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虽然没来得及出版，但这说明青年时期的饶先生已经投身到这一学术主流的漩涡去了，并且在国内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空前的黄金时代，相继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古书，许多过去被认为是靠不住的书，现在已被证明确有来历，其实并不伪。在这种情况下，饶先生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提出了著名的“三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 and 没有文字的遗物、遗址补足纸上之材料），并且断言，对于古史和古书的研究必须走出疑古的时代，在理论和方法上为“证古”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和规范。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干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饶宗颐先生就是20世纪学术史上能够得到“预流果”的少数著名学者之一。

前不久，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栏目重点采访了饶宗颐先生，在饶先生和主持人的对话中，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主持人问：“先生为什么能精通那么多学科？先生是如何做学问的？”先生想了一想说：“我做学问的基础是在十六岁以前就打下了的，在我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分什么学科。”诚然，人类的知识本业就是一个整体，学科之间每每是相融互通的，对于才华横溢的学者来说，人类的知识根本就没有此疆彼界可言。饶先生的治学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大体上包括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和书画等八大门类。当代汉学大师季羨林先生认为，评介宗颐先生的学术成就，必须从“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异国故书与吾国旧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三个方面加以具体阐述和细致分析。并且指出，“尽管这三大方面有很大的概括性，但仍不能包容一切。本选集中还有不少文章是无法归入这三大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可见饶先生的治学是何等的博大精深！从先生的治



学历程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饶先生就已经集文史、诗词、书画、琴艺于一身，后来随着学术和艺术的拓展，几乎所向披靡，在诸多领域独步古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是饶先生的特异之处。主持人又问：“先生写自传吗？”饶先生马上说：“不，不，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好写。”接着便哈哈大笑了。的确，饶先生没有准备为自己写传记，但并不是没有什么好写，而是因为先生长期以来养成了勇往直前的惯性。他简直没有时间去清理自己的过去，更不用说是写自传了。在他面前，总是摆着许许多多新的材料，冒出许多新的热点和新的课题，有许多新的领域正等待他去开拓。事实上，凡是新发现的和有价值的资料，总很难逃过他的法眼，他的许多真知卓识，就是从这些有价值的新材料中不断提炼、升华和演绎出来的。七十年来，先生始终乐此不疲。

人们不禁会问：饶先生的学术生命为什么能够如此旺盛和生机勃勃呢？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秘诀，就是因为他有一颗永不知老的“童心”。尽管先生现在已到耄耋之年，但他常常说自己还是十六岁的心境。的确，先生不但保持着十六岁写《咏优昙花》诗时的心境，而且永远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永不知足、永无止境的求新精神。只有先生这种耄耋之年而童心未泯的“大师之童心”，才能解释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在先生一千多万字的著作中，几乎有一半以上是先生六十岁以后所作的。“大师的童心”就是先生长寿和高产的秘密所在。在此，我们再一次祝愿饶公这棵泰山顶上的不老松“四季常青”，“童心长驻”！继续为繁荣中国的学术和艺术作出贡献。

（原载《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3辑，《潮学研究》第10辑，花城出版社2001年12月）

## 治学游艺七十春

——贺饶宗颐教授“米寿”

饶宗颐教授乳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是海内外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和书画家，又是出色的翻译家。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名誉文学博士，法国索邦首位荣誉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历任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科学中心、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多次访问学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教授，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兼讲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韦伦讲座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顾问，主持出土文献研究计划，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0年被选为法京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93年获法国政府颁授文学艺术勋章。现兼任国内外多间高等学府及学术机构顾问，咨询委员、名誉教授及研究员。2000年7月作为香港学术界的杰出代表获香港特首亲自颁发的大紫荆勋章。2001年获聘为北京亚欧科技学院院士。

—

选堂先生1917年6月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纯钩）博学多才，

工于诗文，精于考据，尤擅谱志，著有《佛国记疏证》（稿）及《潮州西湖山志》。所建天啸楼是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家藏典籍积至十余万卷，是潮州有名的藏书家。选堂先生幼承家学，聪颖过人，诗词书画琴艺，初试即露锋芒，故早享神童之盛誉。16岁《咏优昙花》诗，一时惊诸老宿，竞与唱和。弱冠之年即为其父整理遗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1935—1937年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1939年8月应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年中山大学迁校云南澄江，先生取道鲨鱼涌拟经香港赴滇，因病滞留香港。留港期间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辞典》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又佐叶恭绰编定《全清词钞》初稿，并完成《楚辞地理考》等著述。1941年返潮州。1943年赴广西桂林，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至1945年，其间两度深入大瑶山。1946年被聘为广东文理学院教授。1947至1948年任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主任及《潮州志》总编纂兼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49年为《潮州志》之编写赴港咨询并工作。在此期间，先生著述甚丰。但其时正当日寇侵华之艰难岁月，生活颠沛流离，故积稿多未刊行而散佚殆尽，仅存流寓粤西所作之《瑶山诗集》，殊感可惜！先生早岁见重于顾颉刚教授，由顾老邀约编著新莽史及《古史辨》第八册（古代地理），均因战乱未及印出，其目录载于《积善》半月刊（齐鲁大学印行）。

1952—1968年，先生先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主讲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文学批评及老庄等专题。课余则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楚辞书录》（1956年）、《楚辞与词曲音乐》（1958年）、《九龙与宋季史料》（1959年）、《词籍考》（1963年）、《潮州志汇编》（1965年）、《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1970年）等。与此同时，先生更注重于新发现材料的整理与探究，如《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50年）、《从考古学上论绘画的起源》、《长沙楚帛书山鬼图跋》、《战国楚简笺证》、《者亼编钟铭释》、《居延零简》、《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记略》、《金匱室藏楚戈图案说略》（1956年）、《长沙楚墓时占图卷》、《帛书解题》（并1954年）、《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

筴》（1956年）、《日本所见甲骨录》、《巴黎所见甲骨录》（并1956年）、《长沙出土战国简书新释》（1958年）、《海外甲骨录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并1959年），等等。这一时期，先生对敦煌学、甲骨学、楚帛书用力最勤，创获良多。如《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筴》考定《想尔注》成于张鲁之手而托始于张陵，对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它引起欧洲人对道教研究的兴趣，成为后来汉学界之道教狂热。此书在国际上负有盛誉，被巴黎研究院定为教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开创了以贞人为纲排比卜辞的先例，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超越前人，对了解各个贞人的占卜内容及其所属的时代很有参考价值。此书一出，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足见它在中外学术界影响至巨。先生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刊出之后，与印度友人白春晖（V.V. Pahanjepe）交换，从其学梵文三年；1963年，遂应班达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之聘，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之蒲那（Poona），从事中印关系之研究。复从V.G. Paranipe老教授学习梨俱吠陀（Rig-veda），足迹遍及印度南北。归途游历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各地，所到之处，寻幽搜秘，别有《佛国诗集》纪游。先生后来从事“东方学”研究，其梵学知识即植基于此。1965年，先生在纽约楚帛书藏主戴润斋处获睹帛书原物，积疑冰释，因写成《楚缙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年），证成帛书图像首字即《尔雅·释天》十二月名，遂成定论；又据楚帛书红外线照片作《楚缙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及印度古神话之比较》及《楚缙书疏证》（并1968年），把楚帛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1968年至1973年，选堂先生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聘，任该校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教学之余，先生专事搜求当地华文碑刻，《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69年）和《新加坡古事记》二书，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还刊行《欧美亚甲骨录存》（1970年）。前度在法京与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教授合著《敦煌曲》（于1978年在巴黎出版），为敦煌写卷词曲之集大成者，在敦煌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选堂先生对敦煌卷子十分重视，并用以进行多方面的

研究。除上述《想尔注校笺》外，尚有不少专论，多有发明。如从敦煌《通韵》中对四个梵文字母（R、 $\bar{R}$ 、L、 $\bar{L}$ ）的不同译法，研究唐人作佛教赞歌时的“和声”；从宋初开宝七年（974）十二月十一日的批命本子，研究七曜与十一曜的关系，阐明了古波斯占星学对中国古天文学的影响，皆发人深省。由于先生曾留学印度梵学研究中心攻治婆罗门经典，通晓梵巴诸语文，因而能够揭示刘熙《释名》渊源于婆罗门经《尼卢致论》（Nirukta），韩愈《南山诗》实受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前人未发之覆。先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期间，还两度外出讲学，其中1970—1971年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2—1973年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均有不少力作。

1973年9月，先生重返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旋又兼系主任，直到1978年9月退休。这一时期，印行在美国所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1977年）及在法京巴黎编著之《敦煌白画》与《敦煌本文选》（并1978年）二书，为敦煌学研究增添异彩。过去研究敦煌绘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先生独具匠心，特地将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研究敦煌画极重要的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有图有说，使沙洲画样的来历得以阐明，从而填补了敦煌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进而融入自己的画作中，使人物、线条极具独创性。还出版《黄公望及其富春山居图》等，此外尚有大批手稿待刊。1976年先生第三次莅法京巴黎，在远东学院工作。除继续研究敦煌经卷外，还遍读沙畹当年在华搜集所得的全部金石拓本，遂有《唐宋墓志》之作。复以暇日从J. Bottero教授治楔形文字，正式接触西亚文史知识与遗物。先生后来从事比较古文字学的研究即渊源于此。

选堂先生荣休后并未离开教席，继续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东亚大学担任荣誉教职，并培养研究生。1978—1979年，在法国高等研究院（L'E'coie Pantigue clis E'tucles）第五组宗教部门任客座教授一年。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五个月。1980年初冬，先生到成都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后，即到内地参

观考察。笔者有幸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员一路陪同。此次历时三个月，先生行踪遍及14个省市的许多博物馆和考古文物单位，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批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料，兴奋异常。11月中，先生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看到展品中有曾侯乙墓出土衣箱漆书20个字的摹本，尽是古文奇字，尚无释文，不明句读。谭维泗馆长请为试释。先生经过一番琢磨，终于写出：“民祀佳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经天尝（常）和”20个字。闻者无不折服。随后又写成《曾侯乙墓漆书文字初释》一文，详加考证，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十辑（1985年）。在武汉时，先生有感于新出资料的重要，又得到湖北省博物馆的支持，便与笔者商定以“楚地出土文献研究”为课题，回港后即邀笔者共同完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2年）、《随县曾侯乙墓钟磐铭辞研究》和《楚帛书》（并1985年）三部著作。前二书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四十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的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际上，先生荣休之后，由于摆脱了日常行政杂务，更加自由自在地云游四海，更能集中精力于学术的探讨与著述，故自80年代以来，又有多种著作相继问世，除上面提及之外，还有《唐宋墓志》（1981年）、《选堂集林·史林》（1982年）、《虚白斋书画录》、《敦煌书法丛刊》29册（并1983年）以及《固庵文录》（1989年）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90年代初期，先生一方面开始着手编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准备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番全盘的清理和总结；一方面仍继续醉心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硕果累累。举其要者，如《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敦煌琵琶谱（编）》（并1990年），《词学秘籍之一——李卫公望江南》、《老子想尔注校笺》、《文辙——文学史论集（上、下）》（并1991年），《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1992年），《广济桥史料汇编》（与张树人合编著）、《画史——国画史论集》、《梵学集》、《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与曾宪通合著）、《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编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

(以上并1993年),《新加坡古事记》(1994年),《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并与李均明合著,1995年),《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韩文译本)、《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黄挺编)、《澄心论萃》(胡晓明编)、《敦煌曲续论》(并1996年),《文化之旅》(1997年),《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1998年),《清晖集》(1999年),《甲骨文通检》(主编,共五巨册,1989—1999年出齐)。此外还主编《华学》杂志和主持以地下出土资料补资治通鉴史料之长编稿系列。前者自1995年至今已出版六辑,后者也有多种《出土史料系年长编》问世,荦荦大观,在学界深有影响。此一时期,先生虽年逾古稀,依然怀着一颗勇于缁幽黝险的童心,在诸多领域中不断地开拓创新。试举三例说明之:

《近东开辟史诗》全文用楔形文字刻于七大泥板之上,是一部记载阿克得人开天辟地的神话文献,上半部记述天地开辟之初诸神之间互相争斗,后来才产生出太阳神马独克(Marduk)。下半部叙述马独克安处宇宙间,由三位最高神明(Anu, En-lil及Ea)兴建巴比伦神庙的经过,以及他们如何从反叛者身上沥取血液来创造人类的创世故事。饶先生第一次将这部楔形文字译为中文,并以书中之宇宙论与《淮南子·天文训》、彝族宇宙论和古代楚人的天道观详细加以比较,进而指出近东和远东两个地区开辟神话和造人神话的异同,这在世界比较神话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此书饶先生用铿锵典雅的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韵味无穷,令人叫绝,堪称翻译史上之杰作。此书已经由辽宁出版社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在国内出版。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是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书中利用考古发现的陶符和图形文,融会民族学的若干资料,从多角度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探索原始时代汉字的结构和演进的历程,说明文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其与地区分布的交互关系,并与腓尼基字母、苏美尔线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较研究。指出中国历来统治者施行以文字控制语言的政策——“书同文字”,致使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造成汉字这一枝



叶葱茏、风华绝代的大树，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文字、文学和书法艺术的连锁效应，则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进而揭示汉字在未成形的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线性符号多与腓尼基字母相似，类似于西亚早期的线性图文。作者认为，古代闪族人在使用字母时，曾经尝试过采择彩陶上的符号来代替楔形文字的雏型字母，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成为比较古文字学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甲骨文通检》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类索引，具体编纂由沈建华负责，先生于每册均撰有长篇的“前言”，阐述与各分册相关的甲骨学问题。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第五册“田猎”。这些基本上总括了卜辞内容的所有类别。先生于每类几乎都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如“地名”一项，先生发现《史记》只有“河渠书”而没有“地理志”，但通过甲骨文通检的编著，计得商代地名总数1100多个，又运用史籍文献对勘的方法，对《夏本纪》禹后以国分封诸姓之地名作具体研究，从甲骨文中揭示并复原禹后地名构成的规律。又如，卜辞中有帝乙征伐人方的记载。但关于人方的地望，过去因受王国维、董作宾的影响，以为不出于黄河流域。选堂先生根据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关的历史记载，将人方释为夷方，定位在现今陕西及西南一带，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范围，这不但极大地扩大了殷商时代的版图，而且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 二

以上我们把选堂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著作按五个时期作了粗略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先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根据先生自己的归纳，其著作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和书

画等八大门类。每个门类先生都细致深入地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有重要的建树。纵观先生六七十年来的治学道路，大抵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献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大有创获；壮年由中国古代的研究扩展到人类文化史的研究，晚年兴趣逐渐转移到印度和西亚，填补了中国学术史上不少空白。其成果则以开创性及文献整理开路为多。关于选堂先生的学术成就，当代东方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中分别从“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异族古书与吾国旧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三个方面作了高度概括。本文仅据笔者的一孔之见，试就选堂先生的治学特点略作补充。

先生治学，可以“博古通今，东西融贯”八字当之，先生自幼于中国传统文献（包括经史子集）早已熟谙在胸，又长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及战国秦汉文字，故对地下发现的新材料皆随手拈来，左右逢源。加上通晓英、日、德、法等国语文及印度、巴比伦古代文字，这些使其在原始材料的占有和运用上具有无上的优越条件。打开先生的著作，几乎每一种书都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资料细目。作者的许多真知灼见就是从这些翔实的材料中演绎升华而来的。先生罗致材料可谓不遗余力，概括言之，时不分古今，地不择内外，取材不拘巨细，从新石器的陶片到现代科学的资料，从亚洲近东直到欧美各地的史实，只要与论旨有关，概在搜罗之列。读先生书，无不为其旁征博引及系统剖析的渊博学识所折服。

其次，先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又旁通西方治学的门径，故能认清时代学术的潮流，踊跃投身其中。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20世纪初至90年代，正是中国学术处于“信古—疑古—证古”的转型时期，在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七十年中，一直置身于每个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当今被称为世界显学的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以及中外关系史等，先生都不失时机地利用新出土的资料，致力于证古和释古的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新成果。对于某些比较复杂然而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论题，先生一方面运用前代朴学治经治史的经验，深入阐明研究对象的内涵，同时又从人类文

化史的高度，追根溯源，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演变的规律，即从微观入手以窥宏观，故能极尽抉微发幽之能事，发前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先生治学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多种学科的互相渗透和交融，积极开拓交叉学科的新领域。从先生的论著中可以看到，有不少论题是几个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学问，过去很少有人注意，更无人做过深入的探讨。先生凭借他那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思，纵横驰骋，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如由卜兆记数推究殷人对于数的观念；用滇蜀出土的故事画拟测屈原所见先王祠庙的壁画；从唐代石刻论述武后之宗教信仰；由《齐书》之昆仑舶论证海道之丝路并不亚于陆路；利用湖南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推测楚地信奉黄老之学由来已久；由马王堆《老子》后佚书论证五德终始之说实起于子思而非邹衍。凡此种种，都是先生巧妙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相关知识，近搜远讨，反复钩稽，可谓得心应手，令人信服。

在国际会议上，先生时有精警言论，匡正一般误解，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楚帛书研讨会上，有人怀疑它是后人伪作的赝品，先生列举若干铁证，指出其疑所不当疑，是第一个指证楚帛书为确凿可信的学者。在法京世界文字会议上，提出《汉字与诗学》的论文，纠正H. Poud对汉字偏重象形的错误；1986年9月，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庆祝一百周年纪念，举办世界礼学会议，先生提出《〈春秋〉中之“礼经”及重要礼论》，指出“礼”字的宇宙义，不能仅仅看成礼节，把它译成Ritual并不妥当，足见先生对经学之理解精细入微，造诣高深。

要之，先生治学严谨而不拘泥，渊博而虚怀若谷，著作宏富而又汲汲于求新，故能高蹈独步，无往而不利。

### 三

选堂先生在骈文、诗词、书画方面也有卓著的成就，不过为学术所掩，不大为人所深知而已。先生足迹，九州行其八，五洲历其四。

舟车所至，探奇访胜，辄以诗词记事抒怀；时为自注，考事征文，蔚为大观。论者以为先生以学人而有才人之诗，诗中有史，极具特色。1978年，《选堂诗词集》印行，辑有《选堂诗存》13种，《选堂乐府》4种，即为其代表之作，而其中《黑湖》诸集已译成法语，宇内共赏，声名远播。至其所作俚体文尤为出色，在其近刊《固庵文录·俚体篇》中，收录骈文共40篇，“沉博绝丽，比之清人，惟孙星衍、凌廷堪可相匹敌。”（陈盘《书后》语）至于翻译文字，典雅庄重，铿锵可以上口，于译吠陀无二颂，可以见之。其《近东开辟史诗》，为汉文第一部译著，尤尽创辟之能事。1999年，作为先生韵文、骈文创作合集的《清晖集》印行，内中“韵文集”收赋13篇，诗17种，词6种；“骈文集”收颂、赞、铭、文、序等30余篇。先生在《跋》尾中说：“余半生行役，五洲已历其四。所到之地，多模山范水之篇，既寄心于无垠，聊密尔以自适。所作赋、诗、词三类，皆韵文之属；间亦取则伐柯，偶为俚体。……兹总汇各稿，统名曰《清晖集》，以山水之作独多故也。”季羨林先生为本书作《序》云：“选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为性情中人，有感于怀，必发之为诗词，以最纯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挚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先生自谓为诗人开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实无第二人。”

在书画艺术方面，选堂先生也早有渊源。先生6岁即开始用毛笔写字描画，喜欢描绘各种人物，尤其喜欢画佛像。12岁正式从师，学习山水、花鸟、人物技法；师宗任伯年，曾将任氏作品通临一遍。至17岁，他写任派作品已可达到操纵自如的地步，为日后画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后又对中国传统绘画作穷幽探赜的研究。五六十年代，先生画风受南宗黄（公望）倪（云林）、北宗马（远）夏（珪）影响最深，拥有南派的浑厚华滋和北派的奇雄苍劲；70年代以后，先生之山水技法转向多元，上自宋代李唐、郭熙，下至清初四僧（石溪、石涛、八大、弘仁）和张风等，兼收并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白描人物画则充分吸取敦煌白画（壁画画稿）的精髓，深得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赞赏。先

生书法初习汉隶，后临魏碑，继以碑法入行草，故其书清超醇雅，工丽隽妙。复规摹甲骨、钟鼎、帛书、简牍及历代名迹，篆隶兼施，古朴雄浑，别具一格。先生以书款写诗入画，使诗情画意融成一体，相得益彰。说者谓先生之书画特点可以妙、雅、新三字概括。妙指题画诗文隽妙；雅指书法醇雅；新则是画法生新、画意清新。可见先生不但诗、书、画三者兼长，而且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为先生于香港大会堂举办书画展览，并印行《选堂书画集》。此后又在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举办了一连串书画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1986年，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饶宗颐教授从事艺术／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七十大寿书画展”，气魄十分雄伟：山水与题句交辉，法书则众体竞美。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宗颐书画集》。1991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主办“饶宗颐书画展”；1992年，香港艺苑出版社出版《选堂书楹联初集》和《饶宗颐翰墨》；1993年，在广东画院举办“93广州饶宗颐书画展”，并由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饶宗颐书画》；1994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研究院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于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一时轰动京华艺坛，好评如潮，声名大振。1999年，澳门基金会以澳门市花——荷花为主题，举办“清凉世界——饶宗颐书画展”，同时出版《清凉世界书画集》。2001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古韵今情”饶宗颐书画展，同时出版《古韵今情》书画集；选堂先生特创作十八尺水墨荷花巨幅致赠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不难想像，广大书画爱好者从这些接踵而来的“书画展”和目不暇接的“书画集”中，一定可以尽情领略先生的诗之情、画之意、书之态、印之姿，或许会惊叹先生的艺术造诣并不在学术之下的。

饶宗颐教授是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而又多才多艺的学者兼艺术家。数十年来，先生足迹遍及世界的四大洲和神州大地，写下了五十多部著作和四百多篇论文，总计达一千万字以上，此外还有无数的书画

佳作，是当今集学术与艺术于一身的一代英才。目前，饶宗颐教授的家乡——潮州市和饶教授工作过的香港大学都分别建有“饶宗颐学术馆”，以彰显先生的生平业绩及其对人类学术和艺术所作的卓越贡献；而集先生著作之大成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最近也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和发行。文集分14类20册，洋洋大观，人们可以从中学领略饶宗颐教授七十年治学游艺的发展历程。值此饶公届临“米寿”之际，我们衷心祝愿饶公这棵南山的不老松“四季常青”，“童心永驻”，继续为繁荣中国的学术和艺术作出贡献。

2003年12月增订

（原载《华学》第七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 《选堂集林》读后

饶宗颐教授论文集《选堂集林》的《史林》，最近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是继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出版）之后的又一学术巨著。钱、饶二氏皆一代学人，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又旁通西方治学的方法，表现在二家的著述中，便有许多共同的特色。因此有人把这两部著作誉之为南北的学林双璧。

据说《集林》将分史林、艺林、字林、文林四部先后印行。从这个庞大的规划，即可看出饶氏学识的渊博。他除众所周知的擅长文史之外，还兼及许多不为人所深知的学问，如考古学、古文字学、敦煌学，以及书画创作等，都有精湛的造诣。这多方面的学识，对于完成《集林》这项宏伟的工程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条件。

已经出版的《史林》，分上中下三册，收论文六十二篇（内附说四篇）。其内容，上自史前至魏晋，中历隋唐宋，下逮元明清及东南亚。作者透过若干论题，旁征博引，系统剖析，以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如由卜兆记数推究殷人对于数的观念；用滇蜀出土的故事画拟测屈原所见先王祠庙之壁画；从唐代石刻论述武后之宗教信仰；由《齐书》之昆仑舶论证海道之丝路并不亚于陆路。凡此种种，都极尽抉微发隐之能事，发前修所未发，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作者还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沟通历史学和有关学科的联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和探究，着力开拓史学的边缘地带，使历史研究别开生面，大放异彩。饶



氏是第一个把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与汉语系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结果发现，这种不明语系的图形文字竟然与中国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着许多类似的迹象，这就为寻找这一古老文化演进的线索和中印文化的交流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题中，作者系统探求“发问”文学的发展与演变，发现这种文体不但在中国源远流长，在印度和伊斯兰等古文献中，也都有这一文体的类似句型。因而，作者提出了文字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的新课题，主张把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上来，探讨人类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的种种表现，了解每种文化形态孳生和形成的过程。换言之，饶氏开拓史学边缘地带的目的，是朝着人类文化史的方向前进的，这就成为饶氏治史的一大特色。另外，作者对史料的搜罗和驾驭，也是本书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翻开《集林》一看，几乎篇篇都有一个自成体系资料细目。作者许多真知卓识，便是从这些翔实的史料中演绎出来的。饶氏罗集资料不遗余力，概括言之，时不分古今，地不择中外，取材不拘巨细，从石器时代的陶片到现代科学的数据，从亚洲、近东直至欧美各国，只要与论旨有关，概在网罗之列。书中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是作者实地考察和反复调查得来的，如韩江流域的史前遗存和文化，韩江流域的畬民，潮州宋瓷小记等。特别是有关东南亚一带的文物，更属难能可贵。作者将地面遗存结合历史文献和当地社会习俗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至今仍不失为探讨该地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饶氏之博学多才，尚且本顾宁人《广师》之义（见《小引》），以《集林》之印行求教四方；这与钱氏用“管锥”名篇，以喻其小，立意正同。笔者对于《集林》，可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上面浅陋之见，正如“以蠡测海”，是永远量不出汪洋的深度来的——这才是笔者最深的感受。

（原刊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香港《大公报》）

## 选堂先生与荆楚文化研究

荆楚文化是选堂先生涉足最早，持续研究时间最长，而且成果相当突出的一个重要领域。大体而言，主要包括《楚辞》研究，楚文化史研究和楚地出土文献研究三个方面。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 一 《楚辞》研究

选堂先生认为“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奥眇”。（见《固庵文录》后序）故先生早年即醉心于萧选与《楚辞》的研究，并以“选”字名堂。四十年代初，学术界对楚辞地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是钱穆发表《楚辞地名考》，认为“屈原放居，地在漠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水，本在江北。”方授楚对此提出异议，撰《洞庭仍在江南屈原非死江北辩》一文与之针锋相对。钱氏又作《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交相驳议，反复论难。鉴于楚辞地名涉及对屈原死地的认识乃至整个楚文化的理解问题，青年时期的选堂先生即著《楚辞地理考》一书，参与讨论。先生在“题记”中写道：“楚辞地名之讨论，为近年来文史界的一大事，拙作《楚辞地理考》三卷，即为解决此问题而作也。”书中考释自“高唐”至“楚黔中”共二十篇，以为旧说屈子早居在汉北，实无明证；《楚辞》所陈洞庭、沅澧诸地，疑在江南。力主屈原本无流放江北之事。童书业《序》谓饶书“钩沉索隐、多

所自得，乍闻其说，似讶其创，详考之，则皆信而有征，并世治古史地理者，未能或之先也。”

为了正确理解和辨识错综复杂的《楚辞》地名，选堂先生在本书“自序”中提出两大原则：一是“辨地名”；二是“审地望”。前者追溯名称的由来和所指的范围，属于“考原”之事，必须区分地名的泛称、专称、合称、别称、借称和混称等类别和情况；后者在探求其地之所在和迁徙沿革的过程，属于“究流”之事，必须留意于民族的迁徙与建置沿革的关系。先生最后指出：“古代地名，多同号而异地，或殊名而同实。其纷纭繁赜，至难悉究，然亦有大例，可资循考，循是以求，或可得其情实。”

试举一例说明，本书卷上《涔阳考》引《九歌·湘君》：“望涔阳于极浦，横大江于扬灵。”句中之“涔阳”，汉唐时人都以为是洲、渚之名，接近郢都；宋以后人却以为是浦名、镇名和港名；唐人诗歌又将澧州称为涔阳，而两《唐书·地理志》皆不载。对于这些旧说，选堂先生都一一加以爬梳和稽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涔阳以在涔水之北而得名。涔水在澧州北七十里处会澧水入洞庭，因知涔与澧源异而流同，故涔水与澧水可以混称或合称，称其为澧水或涔水均无不可。后世称澧州为涔阳即由此而来。选堂先生进一步指出，《湘君》“涔阳极浦”与大江对举，而下文言“捐予玦兮江中，遗予佩兮澧浦”，亦以澧水之浦对江中，可知澧浦即涔浦。因此，《九歌》“涔阳极浦”只是泛指涔水以北的远浦，与澧水之浦名异而实同，则江南初未有涔阳之名亦由此得以判明。后人以《楚辞》推之，误以为州名、渚名、碕名、浦名、镇名、港名，更进而以为是滨涔水的澧州城之名，便离史实越来越远。如果用这些互相递变而派生的地名去解释《九歌》例远非其朔了。

综观《楚辞地理考》，几乎篇篇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翔实的论证，言之凿凿，令人折服。地名学家称此书是中国地名学发凡，筚路蓝缕之功，使它成为先生早期的成名之作。

十年之后，选堂先生继之而有《楚辞书录》之作。此书是集录《楚辞》书目之大成者，分书录、别录和外编三大部分。

“书录”部分收知见《楚辞》书目一百一十八种，包括通行本、古写本、正文本、篆文本和日人著述等。其中对《楚辞》重要著作考核尤详，如王逸《楚辞章句》共录十三种版本；朱熹《楚辞集注》共录二十七种版本，从中可以看到二书流行和传播的情况。此外还收录元以前《楚辞》佚籍二十六种，拟骚五十一种，图像二十二种，译文二十七种，大凡五十年代以前中外存佚之《楚辞》书目，可以一览无遗了。

“别录”部分收录近人《楚辞》著述三十一种，论文要目一百一十三篇。限于当时的条件，对大陆方面的有关著述未及寓目，搜罗不易，有不少遗漏，但此书提供了台湾、香港方面的重要信息，亦属难得。

“外编”移录日本所藏之旧刊秘籍，钩沉辑佚，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资料。如据足本《史记·索隐》知“离骚”二字《史记》一本作“离·𪛗”，与《楚辞》异；据郭璞注《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援引《楚辞》之文辑录郭氏《楚辞》遗说，并从郭注《山海经》引《离骚》文间称《离骚经》，与王逸注本同，推知晋唐古本有称《离骚经》者；据僧道骞《楚辞音》残卷指出有裨于楚辞考证之八事；据唐本《文选集注》中之《离骚》残卷撰为校记，其中有可补证旧说者，如唐本无“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六臣本《文选》亦无之。洪兴祖疑后人误以《九章》二句增此，今唐本正无此二句，可为洪说佐证；移录唐陆善经《文选·离骚》注注文六十多条，中有不少新义，如解胡绳为冠纓，与叔师异诂；𪛗颌亦作咸摇，殊于他本，并足以资考镜而广异闻。又比较扬雄《反离骚》唐宋二本之异同，有唐本义长可证宋本之讹者，有宋本可证唐本之误字者，有异文且有关文义者，均一一加以校疏。凡此异文剩义，均有裨于《楚辞》之校雠与训诂，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本世纪下半叶是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大批楚墓和遗迹发现的楚文物层出不穷，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不断更新和进步，在这种情势之下，选堂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建立楚辞学这个新学科，才能在广度

和深度上有力地推进楚辞的研究。他是第一个提出建立“楚辞学”的学者，并且长期乐此而不疲。一九五七年，他发表了《楚辞与考古学》（英文本）的学术论文，提出《楚辞》应与各种出土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指导性见解。同年八月，先生出席在德国马堡举行的第十届国际汉学会议上，又发表了《楚辞对于词曲音乐之影响》一文，此文开章明义地指出：“《楚辞》和《诗经》，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木本水源，一切韵文无不由它产生出来。历代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受过楚辞的影响。沈约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各相慕习，原其颢流所自，莫不同祖风骚。’因此有人说，‘诗歌不从楚辞出者，纵传弗贵，能从楚辞出者，愈玩愈集。’（明蒋翠语）楚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可见一斑。”一九七八年，先生在题为《楚辞学及其相关问题》的讲演中，进一步阐发建立“楚辞学”的意义，他指出：“中国文学重要总集，如诗经与文选，都已有人著书成为专门之学，像诗经学，文选学之类，楚辞尚属阙如。”他强调说：“本人认为，以今日治学方法的进步，如果配合新材料和新观念，楚辞的研究，比较诗经更有它的重要性。”力主楚辞应该成为一门专门之学。

至于如何建立“楚辞学”？选堂先生主张要重视新的材料，引进新的手段，并且身体而力行。例如，山东临沂出土“唐革”的残简九枚，合一百三十余字，经先生与《淮南子·览冥训》互相比勘，部分内容得以通读，这是一篇言御马驰骋之术的佚文，作者为楚人唐勒当无疑问。唐勒与宋玉、景差同时，是新发现与楚辞有关的难得资料（见《唐勒及其佚文——楚辞新资料》1980年）；再者，先生认为《楚辞》之学的发展，有赖于利用神话学、民族学和考古学各方面的新观点和新资料，来考察《九歌》、《天问》上的各种问题。《九歌》的云气迎神人物图、《天问》的历史壁画，均可于同时代的考古文物或同区域的后世材料中求之。他在《楚辞与古西南夷之故事画》中指出：“楚国壁画，现已没有直接资料可为佐证。可是从四川汉代文翁学堂的壁画，和现存云南霍承嗣晋墓的壁画，能够得到一些了解。蜀滇都是楚文化沾被的地方，借重这些材料来拟测屈原所见的先王祠庙中的壁画，自可提供重要线索。

我所以主张利用同一地区或其统辖下的区域之材料来帮助研究，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选堂先生对《楚辞》学的贡献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奠基的作用，二是向导的作用。目前，《楚辞》之学如日中天，成果卓著，是同先生所做的基础工作和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 二 楚文化史研究

一九七〇年，选堂先生发表了《荆楚文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二分）的长文，略谓：过去对于楚国的史事只限于纸上材料，近数十年来，楚地墓葬不断有极重要之文物出土，而铜器铭文涉及楚国者亦提供了不少新知，楚文化由是灿然大明。对于这一地区文化的认识，较之王逸、洪兴祖又推进一步。选堂先生在这篇长文里，基于对这一地区文化的认识，为我们勾画出楚文化的基本轮廓来。

### （一）楚与荆、荆楚与楚荆

卜辞楚字从足，字从艸从林兼见。《说文》“楚，丛木；一名荆。从林疋声。”《谷梁传》：“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荆与楚是一名，俱训丛林，在西周是泛指森林丛薄未开发的地区。楚在熊渠以前，犹称为荆，春秋改荆用楚，在僖公元年。西周金文屡言“伐荆”（贞簋）、“伐反荆”（过伯簋），又称“伐荆楚”（𠄎簋）、（按新出土之“子犯和钟”则称为“楚荆”），都是熊氏之楚的别名。

### （二）楚族之迁移拓展与楚文化的渊源

楚人始祖是炎帝和祝融，本居中原，活跃于河南一带，后来祝融的传说向南传播，及于湘水流域，故衡山有祝融峰。楚族早年活动可能及于陕西一带，熊绎封于丹水之阳，地在汉中，原是三苗的旧疆。楚人国于丹水之阳而启荆山。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篳路蓝缕，以处草莽。”荆山、草莽乃指森林丛薄未开发之地，即荆、楚一名的由来。周夷王时伸展至鄂；周宣王、平王时开发濮地；在当日诸雄

中，楚地最大，至战国末年，禽𠩺鼎上有“三楚”之称。从楚的疆域逐渐向东南拓展来看，楚文化的成分应该是多元的：商、周、三苗、百濮（羌）及吴越，都和它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 （三）楚国的财富及工商业的发展

荆地方五千里，地大物博、出产极丰。从长沙、信阳、江陵各地楚墓出土品物的工巧，可为有力的证明。而郢禹、殊布和蚁鼻钱等通货，更是财富发达的象征。

### （四）楚人的宗教意识与巫风乐舞

楚人的宇宙观，是以九天配以九地，神民异业，绝地天通，无相侵渎。楚之先南正“重”与火正“黎”起了很大的作用。神民分开，神属天而民属地，各司其责，使“司民及司神之官各异”，此种观念成为楚国的传统思想。由于神民地位上下悬殊，民对神即下对上必持“敬”的态度，民对神是否持“敬”，是招致祸与福的主要依据，这点在楚帛书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神民意识的支配下，楚俗信巫鬼、重淫祀，蔚然成风，与之相应的舞与乐也盛行起来。

### （五）楚学术思想与楚人才之盛

楚人本居中原，又徙陕西，颇受到周文化的熏陶。从《楚语》及《楚辞》观之，楚国涵濡于文、武、周、孔之教甚深。从学术思想而论，《大学》里面的三纲领——明德、亲民、至善，成为楚国先贤时时论及的主要观念，并以此构成了楚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可说是与儒家息息相通的。由于楚文化的发达，造就楚国人才辈出，从楚先世鬻熊为文王师，著《鬻子》二十二篇，至后来诸子百家，大半出自于楚。

### （六）楚制度的特点

从制度上考察楚文化，最突出的无如官制和兵制，此外还据新出鄂君启的舟、车两节铭文，述及楚的交通与关税驿传之制。这些方面，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将有大量的补充。

从以上概略的叙述可以看到，选堂先生关于楚文化史的研究是相当全面和深刻的，它既初步理清了楚文化形成的来龙去脉，又揭示了楚文



化的内涵与特征，亦是一种奠基性的工作。从文化学发展史这个角度来考察，实在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首先，选堂先生是最早提出“楚文化”这个名称，并给这一地区性文化加以系统阐发的学者，这对于楚文化的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众所周知，提倡区域文化的研究是最近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趋势（见李学勤《中国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最新成果》1995年），而这一趋势的形成，可以说是以楚文化的研究开其端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大陆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标志着对这一区域文化的认识逐渐明确起来，并将其研究工作正式提到日程上来，付诸实施。自此之后，楚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方面甚至是突飞猛进的。一九八五年，俞伟超同志在楚文化研究会第三次会议上对楚文化的形成作了历史的、科学的解释，他说：“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对东周楚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长沙、江陵、当阳等地的发掘而得到的，那是东周楚文化的中心区，那一带东周楚国遗址和墓葬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可说是典型的东周楚文化的。”又说：“楚文化的源头现在尽管还看不清楚，但已知西周的楚文化不会是从某一个新石器文化单线条地进化为青铜文化并直线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楚文化应是由多支早期文化汇聚而成的，各个源头虽有主次之别，但绝不是从一个源头发展来的。”俞伟超同志从考古学方面得出的结论，同十五年前选堂先生关于楚文化的成分是多元性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选堂先生对楚文化的渊源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八十年代以来，楚文化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涉及这一区域文化的时空范围，族属关系，文化内涵与特征等，都取得可喜的成绩，这也同选堂先生的率先提倡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启示。选堂先生之所以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是同他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的。在楚文化研究方面，选堂先生既重视传世典籍的运用，又重视考古资料的应用；考古资料中，既重视没有文字的遗物遗迹的考察，更重视出土文献即古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这也就是选堂先生最近总结出来的“三重证据法”，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发展和补充。在《荆楚文化》这篇四五万字的长

文后面，附有“楚境内重要遗物遗址发现简表”及“楚吞灭各国及置县略表”和篇末附有“引用书目”一百一十四种，这些洋洋大观的材料就是最好的证明。先生把中华文明看作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总合体，区域文化是这个总合体的一个成员。要揭示这一成员的文化面貌，必须从纵的历史方面探讨其先后衔接的层次；从横的区域方面考察其交流和传播的史实；然后从错综的交叉中寻找其因果的关系，这就是选堂先生在荆楚文化研究中在方法论上给予我们的启迪。

### 三 楚地出土文献研究

一九七九年冬，选堂先生首次回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年会，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吴南生书记亲自设宴欢迎。席间，吴书记希望选堂先生今后多回内地看看，先生即表示，自己年青时写过《楚辞地理考》一书，可是书里考过的那些地方一直还未去过，很想此次能够前往考察。会后，先生便迫不及待地到两湖去参观访问，大有收获。第二年，选堂先生接受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的邀请，在赴成都出席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之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我有幸作为“陪同”一路随行。这次历时三个多月，行程数万里，先生的足迹遍及全国二十九个大小城镇，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看到许多新出土的文物资料，非常兴奋。然而，选堂先生对楚地出土文物依然情有独钟，在考察过程中，即同笔者商定以“楚地出土文献”作为近期的研究课题，邀我共同研讨。在先生的向导下，我也进入这个诱人的领域。八十年代初，我们先后完成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磐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在香港出版。九十年代初复加修订和补充，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先生还陆续发表了马王堆帛书研究的系列论文。以上这些论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选堂先生对荆楚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其年代自战国早期至西汉前期，包括楚地出土的青铜器、竹简和帛书。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已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征引和采用，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下面谨就个人接触所及，略作介绍。

### （一）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

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套距今二千四百多年的完整编钟，共八组六十五枚，铭文都二千八百余字，伴出还有成套的编磬，亦有同类的铭辞。选堂先生三度访问过湖北省博物馆，对编钟、编磬作过实际考察。先生除对铭辞中若干待定的古文字重新辨认之外，特别结合传世典籍中的乐律资料，对乐律术语、五声倍律的异名，以及一些乐律史上的问题试作说解，获得不少新知，例如钟磬铭辞记载着周、曾、楚、齐、晋各地不同的律名；而楚国使用的律名，则以吕钟为黄钟，六律之中有四个称曰某钟，而且特别指明其浊音，并不沿用周律，自成体系，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又从训诂学的立场，根据金文所见钟上字的命名，讨论古代音乐美学的若干观念。更涉及楚国乐律学与琴艺，对《楚辞》中关于“劳商”的涵义作出合理的解释。此外，与曾侯乙编钟同出的漆器上铭文，向来未有人作过研究，先生不但破译了漆书上的古文奇字，提供了可靠的释文，还进而探讨了古代乐理与天文的关系，使漆书的天文学内容与同出乐器群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充分的揭示。总之，先生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结合钟磬铭辞的记载，阐明先秦乐律思想的演进，从中可以看到汉代钟律学形成的来龙去脉，所以，陈应时教授称它是“一部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是并不为过的。

### （二）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

自五十年代以来，长沙楚帛书一直是选堂先生不停地探索的重点课题之一。他前后发表过许多文章，有着不可磨灭的业绩。随着帛书文本清晰程度的提高，先生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创获越来越多。有关选堂先生对楚帛书研究的贡献，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见《饶宗颐先生与楚帛书研究》，载《论饶宗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11月出版），这里只作几点补充。

1. 楚帛书于一九四二年被盗墓者掘出之后，不久即为蔡季襄所得。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蔡氏携楚帛书到上海，由美国人柯克思（John Hadley Cox）带至美国。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学术会

议上，有人对楚帛书的可靠性提出怀疑，选堂先生列举多项证据，证明楚帛书是真实可靠的楚地文物，决非作伪者所能造作。先生精警的言论解除了人们的疑问，匡正了一般的误解，维护了楚文物的价值，得到收藏者沙可乐（A.M. Sackler）氏的赞扬。会后，沙氏为了表示对选堂先生的谢意，特地将会上用作展览的放大十二倍帛书红外线照片共一百一十张，空邮赠给选堂先生。这套照片将原来只有黄豆大小的帛文放大到拳头般粗，它对了解帛书文字结构和书写风格、特别是对辨识笔画模糊和残缺不全的字形尤有裨益。据这套红外线照片，帛书实存字数包括完整和不完整的文字在内，可达九百二十二文。一九六八年选堂先生根据这套照片制作的摹本精确度最高，它比前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商（承祚）氏本和林（巳奈夫）氏本来，正确无误的字竟激增了一百数十字。由于此百余帛文的被发现和被认识，使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新的飞跃。另一方面，选堂先生反复从放大十二倍照片中潜心领悟帛书真迹的运笔体势，故能体现帛书书法的结体和神韵，看来十分逼真。李零评价“此本最为存真，是目前所见的最好帛书摹本”。并非过誉。由此可见，选堂先生在为学术界提供准确可靠的原始材料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2. 在帛书文字的释读中，认识帛书边文的月名是关键之所在。一九五六年李学勤氏在《战国题铭概述》的“补论”中，发现帛书周边文字与《尔雅·释天》的月名有关，但是由于李氏所据摹本的边文残泐太甚，难以理解，李氏的说法并未为人所接受。一九六四年选堂先生在纽约见到帛书原物，经过仔细辨认和反复勘读，证明帛书中与十二图像相配的边文首字，确与《尔雅·释天》月名相同或相通，因作《楚缙书与〈尔雅〉十二月名核论》证成李说，从此，帛书周边的十二月名方被正式肯定下来，“始取（𠂔）终𠂔（涂）”的十二月序亦随之得到承认。由于帛书月名与其结构、性质密切相关，选堂先生一贯主张以“八行为正”的置图方式也得到进一步确认。后来李学勤氏在马王堆帛书中意识到“以南为上”可能是楚地置图的传统，因而修正自己过去以“十三行为正”的意见，改从以“八行为正”的摆法。选堂先生进而

阐发八行正置而十三行逆置的理由，指出：“甲篇（八行）道其常而乙篇（十三行）言其变，故甲篇居前而乙篇列后，前者顺写而后者倒书，所以昭其顺逆。两篇特殊结构的用意，可以推知。”先生此说揭开中间二篇颠倒为文的奥秘所在，是迄今对楚帛书奇特构图最为合理的解说。

3. 选堂先生的《楚帛书新证》，是作者三十多年来研究经验和心得的结晶，篇中除对若干帛书文字作重要审订外，重点放在释读中间甲乙两篇帛文与某些疑难问题的探讨上，尤以甲篇创获最多。例如作者据《易纬·乾凿度》知庖牺亦号大熊氏，与帛书篇首“曰故（古）大熊電戏”一语正合；据《墨子·非攻》知楚先世居于睢山，可证帛文“居于𠄎”乃楚先所居之地，而𠄎亦可定为睢之繁文；据《地母经》知女娲亦曰女皇，则帛文“某某子之子曰女皇”确指女娲。由此可知，由帛文電戏、女皇、四神、炎帝、祝融、共工等所组成的神话系统具有鲜明的南方色彩，皆与楚之先世有关。这对理解帛书的神话渊源颇关重要，且篇首残缺最甚的一段文字亦由此得以贯通。研究帛书者无不折服。

### （三）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

睡虎地秦简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出土，共一千一百五十枚，经整理小组悉心研究，发现大部分属于法律文字，其中有名为《日书》者计有两个写本，甲本有竹简一百六十六枚，乙本二百五十七枚，两本共一万八千零四十字。墓葬年代为秦始皇三十年（前273年），竹简的年代亦可据此而定。

秦墓竹简公布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但这些成果大都是研究文书的，有关日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冷落。选堂先生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是第一部研究秦简日书的专著，它首次打破了秦简日书少人问津的沉寂局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书本是古代日者用来占候时日宜忌，预测人事休咎，以教人如何避凶趋吉的历书，带有相当浓厚的数术色彩。太史公自序提及作《日者

列传》，但今《史记》此传仅述楚人司马季主之议，不及其他，知非史公旧文。此秦简日书正可补《史记》之不逮，故可珍贵。选堂先生通过“建除家言”、“稷辰”、“玄戈、招摇”、“反枳”、“归行”、“禹符、禹步、禹须臾”等十二个专题，结合文献记载，详加疏释。其中勘《淮南》剡与杓之异文，证反枳即反支之殊写，揆之音义，若合符节。此书对日书中比较常见的数术项目作了详尽的解释，为研究数术者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林剑明教授称它是研究秦汉数术的“奠基之作”。随后，选堂先生还写有《秦简日书剩义》、《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和《帛书丙篇与日书合证》等论文，都是从数术学的角度研究日书的。先生指出，《禹须臾》虽无写明十二律之名，但所记干支日辰，都符合五行分配下隔八相生的律吕现象，所以在乐律史上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它说明秦人已用十二律吕配五音、五行以占出、行之休咎。这是选堂先生的一大发明。新出放马滩乙种日书果然有十二律吕与五音、五行相配的明确记载，与先生的推论完全相符。

选堂先生认为研究秦简日书有两点意义：一是为考古天文学补充一些资料，如秦简记时的资料，日夕七舍资料等；二是帮助宗教史解决一些难题，如禹符、禹步、禹须臾等，这两个方面正为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明。

还应该指出的是，将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放马滩秦简日书比较，便可发现两者各具南北不同的特色。睡虎地秦简出于原来楚国的南郡，保留着楚地的某些习俗是理所当然的，如诘咎篇中的那么多鬼名，就是楚人尚鬼的反映，这类资料当然也是研究荆楚文化所不可忽视的。

#### （四）长沙马王堆帛书研究

马王堆帛书发现于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的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上距楚为秦所灭已有五十五年。但长沙为南楚重镇，帛书文本不少是抄写于秦楚之际甚或更早的时期，故马王堆帛书可以作为荆楚文化下限转化期的重要资料。选堂先生对马王堆帛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帛书《易经》、《刑德》、《医书》和《老子》几种写本方面。

帛书《易经》选堂先生有《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谈马王堆帛书〈周易〉》和《帛书〈系辞传〉“大恒”说》等论文，认为帛书《易经》卦序与今本《周易》不同，且异文也多，从帛书本常见“无咎”一词及用“彙”之古文作“𠄎”来看，马王堆本应同于中古文本；年代与贾谊为长沙傅时相近。《周易·系辞》通行本“易有太极”句，帛书本作“易有大恒”，“极”之作“恒”，当是汉以前《系辞传》的本来面目。而“大恒”转写为“太极”或“太一”，也因为它们本是一事的异称。选堂先生还指出，“太一”在楚是主帅，而“恒”的道理在楚人著作和记录中也特别流行。

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于各个方格之内填写干支与神明名字，其中六神之名为刑德、丰隆、风伯、大音、雷公、雨师。选堂先生认为，六神以刑德居首，次为大音，大音即大阴。其余之神为云、雷、风、雨。《论衡·祀义篇》“风伯、雨师、雷公，是群神也”，而不及丰隆。《广雅·释天》：“风伯谓之飞廉，雨师谓之萍翳，云师谓之丰隆。”是丰隆为云师矣。四仲之神有湍王和摄氏，先生认为湍王即颛顼，与炎帝相对之神，非颛顼莫属；摄氏即摄是，当即摄提，毫无疑问。颛顼、摄提之名，过去未见于出土文物，此次在帛书上出现，极为可贵。摄氏之为摄提，既是星名，也是神名。以往有人认为摄提格为外来语，此可证其不确。刑德属阴阳家，帛文自刑德以下，军吏编配，各当其日辰，如图所记，一一符合。故先生以为乙本九宫图应属于风占，从四隅诸神与风角有密切关系，亦可佐证。

在马王堆帛书的医书中，有一部分唐兰氏定为《却谷食气》篇者，全文约三百余字，先生认为是古代“六气学说”中的残膏剩馥，与王逸《楚辞章句》引《陵阳子明经》甚近，故选堂先生考定此帛书六气说，当出自《陵阳子严明经》的佚文。

马王堆帛书《老子》以“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说者以“德经”在前是法家《老子》本的本来面目。选堂先生不以为然，他说：“法由道而生，法家不特不贬道，而实尊道。法家解老自宜以道为先，岂有反以德居前之理。”因此，选堂先生推测说：“马王堆帛书《老

子》之先德后道者，殆写经者偶然之例。”也就是说，选堂先生以为《老子》无论“先道后德”还是“先德后道”，都是道家的经典，与法家无关。

楚地出土文献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新资料，它既加深人们对原有观念的认识，也促使人们改变某些旧的观念，树立新的认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选堂先生在一次题为《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的讲演中，列举马王堆帛书《十大经》中的“黄宗”，《养生方》中的“黄神”，《五十二病方》和秦简《日书》中的“禹步”，以及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社神图和符箓等，说明楚俗与道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并谈及自己对楚文化的新认识，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湖、湘境内的文化早就相当发达，决非“蛮陬遐壤荒江寂寞”之地。前些时候，在疑古风气笼罩之下，有些历史学家对《楚辞》的发源地抱着怀疑的态度。目前由于地下新材料层出不穷，在证明纸上记载的可靠性，殷商遗物在湖、湘境内都有重要的发现，证明“楚文化不过长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参看高至喜《楚文化不过长江辨》，载《求索》1981年二期）

第二，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文化呈纷歧及多型性，可谓多彩多姿。从音律、星占、历法各方面均可见之，楚国在这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许慎《说文序》言“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其实应该再加“音乐异律，星辰异占”等等，这些已得到考古遗物的证实。

第三，楚文化既为一综合体，可从物质及精神两方面加以观察。物质方面，楚地的冶炼钢铁和丝绸技术的发达都值得称道。精神活动方面，楚人的高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宏业。这是由于她有特殊的神话背景和宗教信仰所造成的。楚人的宗教意识和巫医关系非常密切，从马王堆出土的各种文书来看，几乎包括《汉书·艺文志》中的数术和方技略。这些写本相当于后来《道藏》内涵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楚人信巫鬼，崇奉“黄神”，使用禹步、祝咒之术用以治病，说明当时虽无道教之名，而有道教之实，作为楚文化内涵的“巫”，同道教的萌



芽和形成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选堂先生强调指出：“楚文化”这一名词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楚可以说是南方文化的综合体。它吞并许多小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吸收了北方中原华夏文化，和南方若干地区土著民族独特的崇祀鬼神的巫文化融合、升华，构成楚文化的特色。保存在荆楚地区的丰富神话，处处可看到楚人的想象力、创造力的卓越与雄伟，在楚辞文学里更有充分的表现。以上这些，就是选堂先生根据楚地出土的新材料，对荆楚文化总体的新认识。

（原载曾宪通主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11月）

## 神秘的楚帛书

在造纸术发明以前，人类长期用竹简、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墨子·明鬼篇》：“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指的就是这种写在缣帛上的书。可见帛书有着悠久的历史。墨子以前的帛书已不可考，现在能见到的，是以湖南长沙出土的楚帛书为最早，但它的年代可能比墨子要迟数十年至上百年。

楚帛书于1942年在湖南长沙由盗墓者掘出，不久即流到海外，现藏美国纽约都城博物馆。埋藏地下二千多年的楚帛书，其帛面宽度略大于纵长（约47×38厘米），上书蝇头小字近千文，四隅及周边绘有青、赤、白、黑的四木和十二彩色图像，是一幅图文并茂的古代墨书真迹。它的出现，一直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一则由于它是“土夫子”盗掘出来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对于出土的时间和地点秘而不宣，甚至出东道西，故意混淆视听，使人弄不清它的真正来历；二则帛书在水中浸泡多年，绢本早已变成深褐色，几乎与墨书笔迹无别，文字难以辨识。第一个据帛书实物临写的摹本，所认得的字还不及帛文之半，无由得知其详；三是帛书的结构十分奇特，整幅帛书由三部分文字和两组图像所构成，中间两部分文字顺序颠倒，各自为篇。周边文字与十二图像相配，分列四方，随帛书边缘循回旋转。四隅绘以四色树木。帛文布局 and 神像构图都别出心裁，用意耐人寻味。因此，它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广泛感兴趣并努力索解的古谜。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

步，楚帛书的神秘外衣正慢慢地被剥除下来。最近，长沙马王堆遗物正在港岛展出，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也出版了由饶宗颐 and 曾宪通合著的《楚帛书》，此两者为人们解开这个难以索解的古谜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这次展出的长沙马王堆遗物中有帛画影本二件，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一幅《人物御龙图》（原编者按：此影本目前正在湾仔文物展览馆展出），是与楚帛书同一遗址所出的宝绘。据调查，楚帛书出土的确切时间是1942年9月，墓地在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纸源冲。考古工作者后来对这座被盗过帛书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和清理。除弄清了墓葬形制和棺槨结构之外，还出土了这幅《人物御龙图》和一批器物。由一起出土的陶器组合和泥金版的特征，可以断定这座墓葬的年代约在战国中晚期之交，帛书的年代也可据此而定。墓主是一位年约四十岁的男性，根据战国棺槨制度结合帛画上男子形象来判断，墓主应是士大夫阶层的贵族，帛书的内容和性质，可能与墓主生前的身份有关。

帛书文字的考释，是随着写在缣帛上文字资料的清晰程度逐步完善而逐渐推进的；对帛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也是随着帛文的获得确解而相应加深的。帛书文字据早期临本所见仅459字而已，还不足帛书原文的一半，根本谈不上对帛书内容的真切了解。端赖摄影技术的进步，为帛书的释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先是用滤色镜头拍摄的全色照片，比肉眼察看实物还多认出114字；继而采用红外线摄制的照片，又比全色照片多认出242字。目前我们所见的红外线照片，除非缣帛本身受到严重的破坏（如断裂或磨损过甚）者外，帛书上原有的笔画墨迹都可以明朗清晰地显露出来。红外线技术的运用，使浸泡二千多年的帛书真迹无所遁形，为认识楚帛书的真面目打开了广阔的前景。

饶宗颐先生对荆楚文化向有浓厚的兴趣，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对早期流行的帛书临本进行研究，写过《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在港大《东方文化》上发表，在获得弗利亚美术馆的楚帛书全色照片后，立即加以临摹，并以《长沙出土楚缣书新释》为题将帛书摹本公诸同好。1964年饶先生初次在纽约楚帛书藏主处见到原物，发表《楚缣书十二月名核论》，继李学勤揭示帛书十二神名与《尔雅·释天》十二月

名有关之后，更从原物观察参以古籍所记与帛书图文相印证，李氏之说初不为人接受，至是才被学界肯定。接着，美国都城博物馆用红外线拍摄帛书照片获得成功，图文异常清晰。1976年饶先生撰《从缙书所见楚人对于历法、占星及宗教观念》一文，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术研讨会专刊，会后沙可乐秘书寄赠放大十二倍之红外线照片110帧，遂作《楚缙书之摹本及图像》，将最新的帛书红外线照片加以刊布，新作摹本在同类摹本中享誉最高。与此同时又发表《楚缙书疏证》，广搜故实，征显阐微，对帛书全文详加诠释。陈槃庵氏在《跋尾》中盛赞此篇“胜义络绎，深造有得，精见卓识，斯可谓难能矣”。

此次收入《楚帛书》的选堂专论共有四种：即《楚帛书新证》、《楚帛书十二月名与〈尔雅〉》、《楚帛书之内涵及性质试说》、《楚帛书之书法艺术》。其中后两种是新作，前二种则在旧作的基础上，删除繁芜，益以新知，并参时贤近著重新加以改订而成。《楚帛书十二月名与〈尔雅〉》汇合新旧资料，引证浩瀚，补清人郝懿行《尔雅义疏》之所不及，尤有裨于训诂学。《楚帛书新证》集中反映了帛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作者三十多年来研究经验和心得的结晶。篇中除对帛书文字作若干重要审订之外，重点放在训释中间两篇帛文与某些疑难问题的探讨上。尤以甲篇创获最多，例如作者据《易纬·乾凿度》知庖牺亦号大熊氏，与帛文篇首“曰故（古）大熊𩇛戏”一语正合；据《墨子·非攻》篇知楚先世居于睢山，可证帛文“居于𩇛”之“𩇛”乃楚先所居之地，而“𩇛”亦可定为“睢”之繁文。又据《地母经》女娲亦曰“女皇”，则帛文“某某子之子曰女皇”确指女娲。进而可以推知，由帛文𩇛戏、女皇、四神、炎帝、祝融、共工等所组成的神话系统，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皆与楚之先世有关。这对理解帛书神话故事的渊源颇关重要，且篇首残缺最甚的一段文字亦由此得以贯通。又比如，作者继考“四神”为四时之神，复指出四神之名目，与帛书四隅所绘的四木密切相关，概括言之，四神之名分别以青、赤、白、黑为号，与传统以四色配四时及帛书四隅之木设色相同。且帛书神名末字有二“𣎵”、一“单（檀）”、一“难（燃）”，显然是指四木，与四隅表示四时异色之木相符。选堂先生此一发现，揭示了帛书文

字与图像之间的内在联系，两者可以互相印证和说明，它对于解开帛书古谜的谜底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楚帛书之内涵及性质试说》一文中，选堂先生明确指出《楚帛书》应是楚国《天官书》的佚篇。其根据是：《周礼·春官》冯相氏主常度，保章氏主变动，一常一变，职司各异。帛书甲篇辨四时之序，主常；乙篇志天象之异，主变。常与变异趣，反映古来天官即有此区别。尽管帛书杂有不少阴阳家言，然其主体仍是楚人之天文杂占，故视为楚国之天官书自无不可。此说进一步揭开帛文中间甲乙两篇颠倒为文的奥秘所在，是迄今有关帛书文字结构最为合理的解释。至于《楚帛书之书法艺术》一文，则具体分析了帛书的书法特点及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指出帛书字体介于篆隶之间，形体扁平，用笔圆中带方。其书写特点是横写起笔先作纵势，收笔略带垂钩；纵写则往往故作欹斜，因而整个结体以不平不直取姿，故能挺劲秀峻，精妙绝伦。这些论述，对于探讨篆隶演变和隶书源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楚帛书》还收有曾宪通所作《楚帛书研究四十年》及《楚帛书文字编》二种。前一种是关于楚帛书研究的历史，作者根据四十年来数十种论著系统地加以概述，分为：帛书的出土和墓葬的年代，帛书的流传和照片摹本的派生，几种主要摹本的比较，指陈其得失，帛书文字的考释与内容的探究，帛书结构与性质的研讨，及帛书图像的考索等六目，纵横综析，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这一学问的成就及其演进的历程。《文字编》据帛书红外线照片摹录文字，将近千帛文按单字逐个编列，单字下注明编号、词例及有关考释，博采众说，间附己见，兼具索引与集释之效用，便于查检和观览。

《楚帛书》的图版据饶宗颐教授珍藏之帛书红外线照片精制而成。包括帛书红外线原大照片，帛文分行放大照片及放大十二倍之局部照片三项，并有据照片临摹之原式摹本及附释文之临写本二种，为研究者提供精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是治历史考古、古代文字和古代美术者必备之参考书。读者只要一书在手，便可探知楚帛书的庐山真面目了。

（原载1985年8月1日香港《大公报》，收入本书略有更张）

## 选堂先生与楚帛书研究

从一九四四年（甲申）秋蔡季襄氏作《晚周缙书考证》首次公布楚帛书材料时算起，关于帛书的研究至今已整整四十个年头了。帛书纵长约三十八厘米，横长约四十七厘米，上书蝇头小字近千文，四隅及周边绘有青、赤、白、黑之四木及十二彩色图像，是一幅图文并茂的十分珍贵的古代墨书真迹。四十年来有关它的论著总计在六十种以上，是海内外学者广泛感兴趣的一个课题。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楚帛书的神秘外衣正慢慢地被剥除下来，其真正内涵也被逐渐揭示出来，人们了解帛书的真面目已经为期不远了。现据本人所接触的材料，将四十年来有关楚帛书研究的各方面情况作一概述，借以了解这门学问的成就及其经过的历程。

### 一 楚帛书的出土和墓葬的年代

楚帛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盗掘出来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对于帛书出土的时间和地点总是秘而不宣，甚至“出东道西”，故意制造混乱。蔡氏《考证》只泛称近年出于长沙东郊杜家坡，因筑路动土而发现。此外还有出于三十年代后半期及一九四九年二说。一九六四年商锡永先生作《楚帛书述略》，向曾参与其事者调查，证明杜家坡之说并不可靠。据他调查所得，帛书发现的确实年月为一九四二年九月，墓地在

东郊子弹库的纸源冲（又名王家祖山）。一九七三年五月，湖南省博物馆对这座被盗过帛书的墓葬进行了发掘，除进一步弄清墓葬形制和棺槨结构外，还出了一幅人物御龙帛画和一批器物。这次发掘对于弄清墓葬的年代和帛书的出土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墓地位于长沙东郊子弹库，墓葬结构为一槨二棺，是一座中型的战国木槨墓。盗洞紧贴北壁，由地面直达内棺，棺内骨架完整，经鉴定为年约四十岁左右的男性。根据战国棺槨制度结合帛画上男性的形象来判断，墓主人应是士大夫级的贵族。随葬器物除帛画平放在槨盖板下面的隔板上外，绝大多数置于头箱和边箱。据盗掘者的回忆，帛书确出于头箱，发现时折叠为八折，一端搭在三脚“木寓龙”的尾部，一端搭在装盛泥金版的竹筩盖上，与蔡氏所谓“书用竹筩贮藏”者异。至于墓葬的年代，发掘报告根据出土陶器的组合及泥金版等特征，断其约在战国中、晚期之交。帛书的年代亦可据此而定。

## 二 帛书的流传与照片摹本的派生

楚帛书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其流传经过及现存各种照片摹本的源流，简记如下：

**一九四二年九月** 楚帛书在长沙子弹库墓地被盗墓者掘出。不久为长沙唐鉴泉（经营裁缝兼营古董的商人）所得。

**同年冬** 唐鉴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商承祚先生以帛书求售。商先生托友人沈筠仓前往了解情况，据说当时的帛书是“大块的不多，小块的累累”。正当商先生与唐裁缝反复议价之际，适蔡季襄回到长沙，帛书遂为蔡氏所得，蔡请有经验的裱工将帛书加以拼复和装裱。

**一九四四年秋** 蔡季襄氏取旧藏帛书及同出器物影本加以董理，命长男蔡修涣按原本临绘帛书图文，自作考释，成《晚周缯书考证》一书。

**一九四五年春** 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印行。书中收有套色的蔡

修涣临写本，是为最早流行之帛书临本。此一临本又经多次复制和重摹，多见于早期刊布的书刊。如：

（1）蒋玄怡《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第二卷，图版二八A据蔡本重摹而略去表示残文和缺文的方框。（一九五〇年）

（2）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图版十六，图一〇〇采自蒋本。（一九五〇年）

（3）陈槃《长沙楚墓绢质彩绘照片小记》，插图据蔡本照片重摹。（一九五三年）

（4）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附图据蒋本复制。（一九五四年）

（5）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第一卷，图版一二七至一二八采自饶本。（一九五四年）

（6）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插图翻自蔡本。（一九五五年）

（7）《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七期，图版二四采自蔡本。

（8）《抗议美帝掠夺我国文物》图版四四翻自蔡本。（一九六〇年）

（9）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插图采自蒋本。（一九六〇年）

（10）钱存训《书于竹帛》（英文）附图翻自蒋本。（一九六二年）

（11）《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九期封底图片翻自蔡本。

（12）巴纳（Noel Barnard）《楚帛书译注》（英文）封底纸袋内套色图本翻自蔡本。（一九七三年）

（13）庄申《楚帛书上的绘画》套色插图采自蔡本。（一九八三年）

**一九四六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楚帛书由蔡季襄携至上海，旋由美国人柯克思（John Hadley Cox）带至美国。初存于耶鲁大学图书馆，继入藏于弗利亚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一九五二年** 弗利亚美术馆将帛书拍成全色照片。据照片摹制的摹



本已先刊行，而照片则久未发表，直至一九六四年才由商承祚先生在《文物》上加以刊布。据弗利亚美术馆照片摹制的摹本有：

（1）梅原末治《近时发现的文字资料》（日文）所附的局部摹本。（一九五四年）

（2）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简书新释》所作原式摹本。（一九五八年）

（3）巴纳《楚帛书初探》（英文）所附棋格式摹本。（一九五八年）

（4）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下）插图采自梅原氏本。（一九五九年）

（5）郑德坤《中国考古·周代》所附李棪临写本。（一九六三年）

（6）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所作套色摹本。（一九六四年）

（7）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所附摹本。（一九六四年）

（8）杨宽《战国史》图版十五采自商本。（一九八〇年）

**一九六三年** 楚帛书寄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一九六四年** 楚帛书易主为纽约戴氏所有。一九六四年秋饶宗颐先生在戴处获睹原物，并据以写成《楚帛书十二月名核论》一文。

**一九六六年** 楚帛书归沙可乐（A. M. Sackler）氏。同年一月大都会博物馆试用红外线拍摄帛书照片（其摄影技术据巴纳所记英文为：Ektachrome Infrared AEZO FILM—Type8443）获得成功，图文异常清晰。红外线照片及据此照片摹制的摹本见于：

（1）《沙可乐所藏楚帛书》（英文），此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术会议上印发的说明书。正面印有帛书彩色照片，反面印着红外线黑白照片和出于巴纳博士之手的棋格式摹本。（一九六七年）

（2）饶宗颐《楚帛书之摹本及图像》，此文作于哥伦比亚大学学术研讨会后，作者以所得放大十二倍之红外线照片校正棋格式摹本若干则，文中载有红外线照片和作者新作之摹本。（一九六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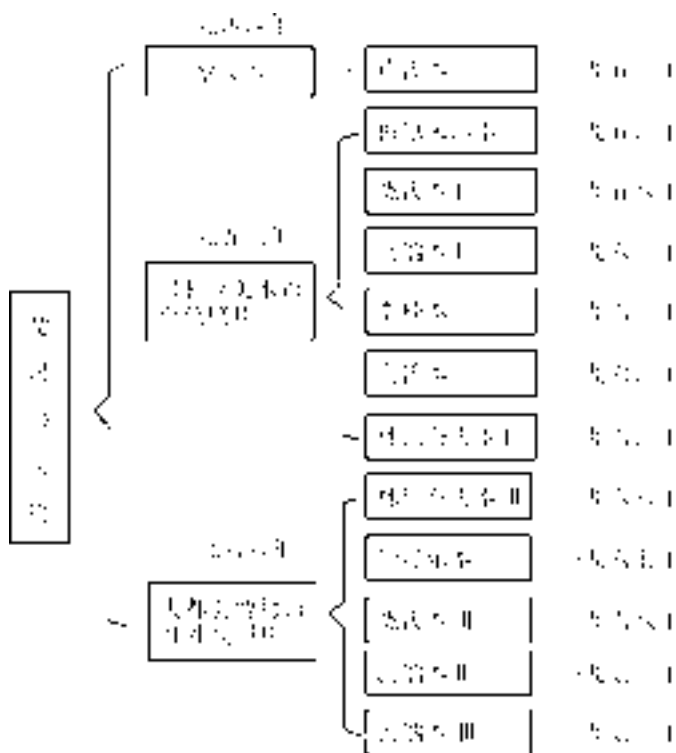
(3) 《古代中国艺术及其在太平洋地区之影响》(英文), 此为哥伦比亚大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卷首印有帛书红外线照片, 书中刊出巴纳《楚帛书及其他中国古代出土文书》一文所附的棋格式摹本, 其中文字部分与说明书上的摹本相同。(一九七二年)

(4) 巴纳《对楚帛书的科学鉴定》(英文), 卷首印有帛书的红外线照片, 书中的棋格式摹本是作者上一摹本的修正。(一九七二年)

(5) 巴纳《楚帛书译注》(英文), 书末附有六幅叠印的红外线照片和装在封底纸袋内略去棋格的新摹本及释文各一幅。(一九七二年)

(6) 钱存训《中国古代书史》(据英文版《书于竹帛》增订而成)图版二〇翻自巴纳一九七三年摹本。

根据上述各本源流,可将楚帛书照片摹本的派生情况表示如下:



### 三 饶宗颐先生与楚帛书摹本

帛书的原始材料，是研究者据以工作的基础。但是关于楚帛书的第一张照片直到一九六四年商承祚先生作《战国楚帛书述略》时才首次刊行。尽管当时在海外已有更为清晰的红外线照片流传，但对于大多数学者，尤其是在内地的学者来说，研究工作的主要依据仍然是摹本。如上所述，四十年来先后流行的摹本计有十三种之多，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四年前后差不多十年，各种摹本都直接间接来源于蔡修涣临写本；自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四年即第二个十年，蔡氏本逐渐为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所派生的摹本所代替，这一时期可以商承祚先生和林巳奈夫氏的摹本为代表；第三阶段自一九六六年到现在，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很快被红外线照片所取代，而以饶宗颐先生和巴纳博士所作的摹本最具权威。下面就饶氏摹本作一简单介绍。

在研究楚帛书的学者中，以饶宗颐先生所作摹本最具代表性，他前后共做过二个摹本：（他的一个据蒋玄怡临写本复制，发表在香港大学《东方文化》一卷一期（一九五四年），不算摹本。）第一个据梅原未治提供的全色照片临摹，作为《选堂丛书》之四在香港刊行（一九五八年）；第二个据红外线照片按原式摹出，刊于台湾《故宫季刊》三卷二期（一九六八年）。这两个摹本代表着楚帛书研究的两个不同阶段，尤以第二个摹本在文字上的贡献最大（此本只摹录文字，未绘四隅树木及周边图像），没有机会获得清晰照片的学者有了这个摹本，文字资料的问题便基本上解决了。此一摹本之所以精确度最高，是因为作者除获得沙可乐赠送之红外线原大及放大照片之外，还得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考古工作室放大十二倍之照片共一百一十张，此套特大照片对于考察帛书书法与校正残字残画有莫大的帮助。笔者在香港工作时，曾据这套照片推定楚帛书的基本字数，计甲篇三段文字二六七文，乙篇三段文字四一二文，丙篇十二段文字二七三文，三篇合计九五二文。如果连同未知的缺文在内，整幅帛书的原有字数，估计在九六〇字左右。据红外线

照片，包括完整和不完整的文字在内，帛书实存字数可达九二二文。而饶先生此本除少数仅存点画的残文外，计摹存九一二字，内残文九六字，正文八一二字，摹本与照片出入较大者仅五字而已。且正确无误的字比上阶段最佳之商氏本，林氏本来，竟激增一百数十字。由于此百余字之被发现和被认识，使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新的飞跃。

饶先生此本在摹写方面也体现了帛书书法艺术的特色。根据他的研究，帛书字体介乎篆、隶之间，形体扁平，用笔圆中带方；书写特点是横写起笔先作纵势，收笔则略带垂钩；纵写往往故作欹斜，整个结体以不平不直取态，故能挺劲秀峻，精妙绝伦。饶先生反复从放大十二倍照片中潜心领悟真迹之运笔体势，故摹写时落笔轻重适度，提按分明，字画疏密有致，方圆相济，最能存帛书真迹的神韵，看来十分逼真，李零谓“此本最为存真，是目前所见的最好帛书摹本”，并非过誉。

饶本最为存真的另一表现，是完全按照帛书原式摹写，不作任何更改，其行列虽不如棋格式一目了然，但却是帛书面貌的如实再现。其中，对于乙篇原帛对折处磨损最剧一列文字的处理尤具卓见。鉴于此一涉及帛书行款的问题研究者历来颇有分歧，笔者想借此机会加以辨正。

考乙篇对折处的绢帛裂缝适当各行第十六与十七字之间，自蔡氏本开始便将残损之字误析为二，诸家摹本则违从参半。一九五八年巴纳博士发表《楚帛书初探》，首创用棋格式处理帛书行列，正式在裂缝处空出一行，以示缺文。一九七三年巴纳氏著《楚帛书译注》，其摹本乃将前六行与后六行分别处理，前六行仍有缺文。饶先生此本不用一刀切的办法，而是根据影本实事求是地加以适当处理，态度比较客观。下面是对这列残文加以考察的结果和意见。

细审影本，绢帛裂缝处虽损及同列左右之帛文，却未伤及上下相邻之字。被损帛文大都可以复原，上下文义亦通达无碍，并无缺文痕迹。

首行裂缝适当“冬”字下半，冬下并无缺文。此二句读“春、夏、秋、冬，又口尚尚”。尚字读常，据放大照片实有重文符号。

第二行裂缝在“𠂔”字之下，“方”字之上，中间亦无缺文。此句读“降于其方”。近时饶先生根据《甘氏岁星法》“日有乱民，将有兵

作于其旁”。以为帛文“其方”即“其旁”。

第三行裂缝适在“𠄎”字正中，原文当作𠄎，即喜字之残，读为“禧禧”，是灾异出现的惊叹词，亦有文献可征（见《左·襄·三十年传》）。

第四行裂缝所在之字不识，残存“𠄎”形，影本上下亦无缺文。

第五行裂缝适残去“𠄎”字上半部。此句读为：“女（如）曰：‘亥佳邦所’。”据饶先生所考，亦有确解。

第六行裂缝在“寺”字正中，影本尚清晰可见。“寺”读为时，“三寺”即三时，其上下亦无缺文。

以上六字，棋格式摹本或在字之上下留出空格，以示缺文，或一字误析为二，皆失之。

至于第七行“出内（入）同”之内字，第八行“𠄎为则”之𠄎字，第九行“五正乃明”在“乃”与“明”之间，第十行“佳天乍𠄎”之𠄎字；第十一行“山川漓浴”之川字；第十二行“是则𠄎至”之至字，皆在绢帛折缝之断口处，而字字均可复原，上下文句亦无窒碍，由此证明后六行情形正与前六行相同。而棋格式摹本于此六行概无缺文之标志（按“出内同”内下缺文与裂缝无关），更可反证前六行之缺文符号乃是人为所增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此外尚有一重要之旁证，即此一绢帛裂缝亦通过乙篇右侧之四首形图像（或称为“如”月的月神），倘在裂缝之字析而为二或其上下原有缺文，则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必然大大拉长，位于右侧之图像亦必然随之有相应拉长距离的自然表现。可是细察红外线照片，此图像之四首形表现得整齐匀称并列，位于上方之一首虽为裂缝所伤，然其比例亦如其余三首一样，中间并无拉长的痕迹。整个图像约占五列（十六至二〇）位置，上方一首恰与“冬”字一列平行，下方一首则几与“日月”（合文）一列等齐（顺便指出，巴纳博士一九七三年略去棋格的摹本为牵合此五列中有缺文，而不得不把整个四首形图像上移，使下方一首上升至“尚”字之右上方，与影本大异。将摹本与影本比照自明）。由这一图像之完全符合比例，可以推知与之对应的五列文字中间并无缺文存在，

且由此更可验证饶先生摹本的处理办法，才真正符合楚帛书的原来面貌。

#### 四 楚帛书文字的考释与内容的探究

帛书文字的考释，是随着文字资料的逐步完善而不断推进的；对其内容的认识，亦是随着文字之获得确解而相应加深的。若从时间上划分，四十年来帛书文字考释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期，是以蔡修涣临写本及其复制本为研究对象的时期。如前所述，蔡氏本所见帛书文字不及原文之半，且多残辞断句，因此，这一时期只能据可以考见的个别辞句对帛书内容加以推测。如蔡季襄氏《晚周缯书考证》据帛文中有“乃命山川四冑”、“是邦四時”、“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及“群神五正”、“群神乃嘗”等项文义，推测帛书内容为“古代祀神之文告”（按上引蔡氏释文之冑为𠂔之误，邦为佳之误，時为寺之本字，嘗乃𡗗即德字之误）。蔡氏书中除对群神、五正、五木及五木之精等考证尚经得起时间考验外，其余多因文义不全或误释，主观臆测之说自不可免。由于蔡书当时流通未广，五十年代从事帛书研究诸家均不是从蔡本直接取材，而是辗转从蔡本派生出来的再摹本取材进行研究的。诸家所据本虽不及蔡本，却往往有新的发现可正蔡本之违失。如一九五三年陈槃氏作《先秦两汉帛书考》，后附《长沙楚墓绢质彩绘照片小记》，读帛文之“寺”为时，谓“寺雨”、“四寺”即时雨、四时，可正蔡氏以時雨为“祀雨师之神”，四時为“嬴秦时祭祀五帝坛址”等臆说。但陈氏以为帛书“文纪祀神，四正边所画者盖即其所祀神及祀神之牲兽”则与蔡说无别。一九五四年，饶宗颐先生据蒋氏本作《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分别考证帛书所纪四时与五木、五正；帛书所见之楚先公及楚方言古语；帛书所见之古文奇字等。认为“图中文字记四时五正及月令出行宜忌，殆为楚巫占验时月之用；而施之墓葬，以镇邪魅”。一九五五年，董作宾氏在《论长沙出土之缯书》中考定帛书的“佳”字与“帝

爰”，并据四时与四方之序确定帛书应以上冬下夏为正，与前此诸家的置图方向相反。至于帛书内容，董氏据“帝曰𡗗”以下一段比较完整的文字，认为帛书全文在宣扬古代帝王“天道福善祸淫”的遗训，而要点则在所崇拜之天神。

就在陈、饶、董等据蔡氏本的残辞断句探索帛书内容的时候，弗利亚美术馆的全色照片开始在学术界露面了。第一个利用这一照片研究帛书的学者是日本的梅原末治先生。他在《近时发现的文字资料》中首次介绍了弗利亚美术馆用特殊底片摄成的帛书照片。认为这个照片比原物清晰，将会给帛书的研究带来“新的希望”。但梅原氏所揭示的仅是这一照片的局部摹本（即八行一篇的上半段约百字左右），未作考释。发表这一照片的整个摹本并重新加以考释的是饶宗颐先生。饶先生从梅原氏处借到弗利亚美术馆照片后，立即加以临摹，并以《长沙出土楚缯书新释》为题将摹本公诸同好。作者新作的摹本和释文比起蔡氏本来竟多出一百多字。《新释》之作虽然志在呈材，但文中对若干文字的诠释在当时影响颇大，如释“炎帝乃命祝融”之祝融，读“山川四𡗗”为“四海”、读“长曰青𡗗”为青阳等，屡见学者征引。一九五五年，李学勤先生在《战国题铭概述》（下）中论及楚帛书，他据蒋氏本参照梅原氏的局部摹本，将帛书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十三行的一篇是关于天灾禁忌及《月令》式的刑德思想；八行的一篇是涉及五行、四时及九州形成的神话；边图格式则与《山海经》很相似。次年又在《补论》中专就帛书边文加以补正。作者除据饶氏提供的新资料重新写定释文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四边文字中首次发现十二神名与《尔雅·释天》十二月名相关，从而指明帛书四周的十二图象征十二月神，神下注神名及职司，兼记该月宜忌。此外，作者还根据斗柄方位确定帛书的放置方向应是上冬下春即蒋图的反置（与董说相同），指出由月次的方位可知帛书的用历是“建寅的夏正”。李氏在不到一年里所发表的这两篇著作，可看作帛书研究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他在前后所作的两篇释文中，从下列一些数字可以说明帛书研究的进展。

帛书篇段	《概述》释文字数	《补正》释文字数	二者相较所增字数
甲篇（八行）一段	四五	九〇	四五
二段	七五	八八	一三
三段	五	二四	一九
乙篇（十三行）一段	九三	一〇三	一〇
二段	一四四	一五八	一四
三段	四六	五七	一一
丙篇（边文）	三六（四段）	一九五（十二段）	一二三
总计	四四四	六七九	二三五

由于李氏《概述》采用的是讹误较多的蒋氏本，故释文中释出的字还不如蔡本的多。两相比较，后者竟比前者多出二百余字，尤以四边文字所差更为悬殊。李氏正是凭着全色照片边文首字可与《尔雅》月名相通，才有这个突破性的发现。但他的说法未为人所接受。要到一九六四年饶先生在纽约见到真物，发表《楚缙书十二月名核论》，此说才被肯定。

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以弗利亚美术馆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字考释、已经可以通读某些比较完整的句子，对帛书内容的理解，也可以深入到具体区分章节的地步。除上述饶、李二氏的著作外，还有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安志敏、陈公柔《长沙战国缙书及其有关问题》、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林已奈夫《长沙出土楚帛书考》、饶宗颐《楚缙书十二月名核论》等，这些著作对于文字的考释和内容的阐发，使帛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举其要者，如甲篇是讲日月、四时形成的神话，有关神话人物，上阶段仅知有炎帝、帝俊、女皇（或以为女童即母童或女𠩺）、及女皇所生之四子即四神；此一时期又有作为炎帝帝佐的祝融以及夏商的代表人物禹和契（据安志敏、陈邦怀、商承祚先生等说），这就使帛书的神话更具有南方系统的特色，并且同夏、商信史联系起来。又如乙篇的中心思想是“天象是则”，而天象灾异在蔡氏本中仅见卉木亡常、电震雨土及






日月既乱等残句。这一时期已经知道篇中反复出现的“德匿”亦是一种反常的天象（据商先生说），它与孛（彗星）、岁（岁星）的出现，以及日月星辰运行的失当，春夏秋冬时序的相违等，都可以告诫下民对于上天必须“敬而毋戈（忒）”。至于丙篇的十二节文字，据蔡氏本仅可见到零星的神名，根本无法了解彼此的联系；弗利亚本边文比蔡本增加近百字，其中绝大多数可推知其神名之首字。自从李学勤先生揭其端倪之后，又经饶宗颐先生从原物观察，参以古籍所记与原物图文印证，益信边文之十二月名确不可易。陈梦家先生还将三篇内容联系起来，认为帛书中央十三行的一篇述“岁”（日、月），八行的一篇述“季”（四时），四周十二章述一年十二个月及其禁忌。他认为帛书方形的四边代表四方和四季，方形内则代表日月与四时的阴阳相错。















当弗利亚美术馆照片在帛书研究上发挥作用并获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大都会博物馆帛书红外线照片试拍成功了。红外线照片的特点是，只要绢帛纤维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断裂或磨损过甚），帛书上原有的笔迹都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具有以往任何帛书资料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帛书红外线照片一出现，全色照片便立刻相形见绌，并且很快被红外线照片所取代了。

利用红外线照片修正自己旧作的是日本林已奈夫先生。他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发表的《长沙出土战国楚帛书考补正》，是对其一年前所作《长沙出土战国楚帛书考》的重要订正。前面谈到林氏《楚帛书考》所据之弗利亚美术馆影本最佳，而此文则是对其据最佳影本临写的摹本所作的修正。凡上文所摹所释不妥处，此文一一加以重摹重释，计甲篇四十四处，乙篇八十一处，丙篇九十二处，共订正二百一十七处。红外线照片的优越性由此可以得到具体的说明。




从一九六六年至现在，是利用红外线照片研究帛书的时期。由于红外线照片为帛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这一时期文字考释是朝着全面释读和纵深发展的，在某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重要的著作有严一萍《楚缙书新考》、金祥恒《楚缙书“𠂔𠂔”解》、饶宗颐《楚缙书疏证》、巴纳《楚帛书译注》、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

和饶宗颐《楚帛书新证》等。

严氏《新考》作于一九六七年，所据为大都会博物馆红外线照片与李棧斋手摄中间两段文字照片之印本，行款字数依棋格式摹本，但对丙篇有若干补充。作者按两周彝铭以“隹”字起句之例，其释文定十三行为甲篇，八行及边文分别为乙篇与丙篇。每篇以行为单位摹录帛文，逐字顺次诠释，文中引商、董、李（棧斋）之说甚多，并有不少新见。如商先生说八行首行开头之为神名，严氏则以为、慮二字古音相近，故读为慮戏，亦即伏羲。又谓二行之“女皇”即女娲，并引《路史后纪》女皇氏注，言“女娲本伏羲妇”，证明二者关系之密切。对于丙篇的性质，作者从十二个月所记行事推测，认为可能是当时楚国月令的一部分。篇末兼论帛书之历法为建寅，谓帛书以伏羲为主体而历法属于夏正，可见古来三皇三正的传说有其久远的历史。

金氏《“”解》专为考释帛书“”而作。作者认为商先生释“”为于史无征，因改释为从（勺）声之字。《说文》雹之古文作，所从之帛文简讹作。小篆从雨包声，帛书则从勺声。故断帛书之即《易·系辞传》之包牺。文中广罗古籍有关包牺的记载凡六十余条，不同写法达十四种，而以书“包”或“庖”者为最古；“”则戏之古字，由此证知帛书之言不得早于《易·系辞传》，为战国时物无疑。

饶先生《楚缙书疏证》是一篇全面论述和逐句疏释帛书文字及内容的长文，作于一九六七年哥伦比亚大学楚帛书研讨会之后，所据为大都会博物馆红外线照片，并参校放大十二倍之最佳影本。

《疏证》将帛书全文按八行、十三行及边文三部分顺次诠释，目的在于“正其句读，明其训故”。其中论为古之熊字，读万为冥。与禹并列为夏、商所崇祀之水神，论四时之神以色为号，解十日、四时与共工之关系，论绌之为羸缩，天之为天棖，以及证三首神为祝融等，都是慧眼独具的见解。陈槃庵先生在《跋尾》中赞此篇为“胜义绎络、深造有得，精思卓识，斯可谓难能矣”。

巴纳博士是亲自参加帛书红外线照片摄制工作的学者之一。由于

他在材料方面的利用上有较多方便的条件，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期连续发表了好几种关于楚帛书的著作，在新资料的传布方面颇为引人注目。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楚帛书译注》，是作者同类著作中观点和材料最集中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为四大部分：（1）楚帛书的发现；（2）楚帛书的字体和书法；（3）楚帛书译注；（4）楚帛书的韵律。除（1）、（4）两部分是过去旧作的修订外，（2）、（3）两部分都是新作，尤以第三部分即《楚帛书译注》所占比例较大（共一三六页，约占全书的一半以上）。书中所附红外线照片和多种图表极有参考价值。译注部分按八行、十三行和边文为先后，将每篇分成若干段落，分别以隶古定和通行体列出每字的释文，并注该字在字表中的编号，以备核对。三篇注释凡一二四条，以引述诸家考证为主，间附己见。作者对以往的研究作了一些整理和归纳，但自己有些看法比较奇特，不易为学者所接受。

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刊于《湖南考古辑刊》第一集。作者看了巴纳《楚帛书译注》的红外线照片，又在大都会博物馆亲睹楚帛书原物之后，觉得对过去一些看法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因作是篇。篇中提出下面几点新的见解。

（1）作者根据近年来整理研究马王堆帛书中见到的古地图，如《胎产书》、禹藏图和几种阴阳五行家著作的图都“以南为上”这一现象，认为“以南为上”至少是楚地出现的古图的传统，从而修正自己过去以“上冬下夏为正”的看法，重新确定帛书的摆法也应该“以南为上”。

（2）建议将八行、十三行和边文三篇，依次称为《四时》、《天象》、和《月忌》。并重新写定《天象篇》的释文和注解。认为《天象》篇所论天象灾异是彗星和侧匿两项，彗星包含天棓和孛，侧匿则兼括羸缩，其余均为彗星和侧匿所派生。

（3）《天象》篇在若干点上接近于《洪范五行传》，如强调天人感应，并提到五正，有明显的五行说色彩。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应属于先秦的阴阳家。

饶宗颐先生《楚帛书新证》是集中作者三十年来研究楚帛书心得的

总结性著作，是在旧作《楚缙书疏证》的基础上删除繁芜、益以新知，并参时贤近著重新改订而成的。篇中除对帛书文字有若干重要审订之外，其着重点却在对中间两段文字的训释与疑难问题的探讨上，其中以八行一篇所获新证最多。举例来说，作者据《易纬·乾凿度》知鬲戏亦号大熊氏，与篇首“曰故（古）大熊鬲戏”一语正合；据《墨子·非攻》知楚先居于睢山，可证帛文“居于𠄎”之𠄎乃楚先所居之地，而𠄎亦可定为睢之繁文；据《地母经》知女娲亦曰女皇，则帛文“乃取（娶）𠄎（且）□□子之子曰女皇”确指女娲。这样，由鬲戏、女皇（女娲）、四神、炎帝、祝融、共工等组成的神话系统，皆与楚之先世有关。这对理解甲篇神话故事的源流颇关重要，且篇首残损最甚的一段文字亦由此得以贯通。

这一时期帛书文字考释的著作还有唐健垣《楚缙书文字拾遗》、许学仁《楚文字考释》、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等。唐文是对严一萍氏《楚缙书新考》中未曾论定的若干文字重新加以讨论，初稿、续稿及补正凡二十八则。许文是作者硕士论文《先秦楚文字研究》中有关文字考释的部分，共考释楚器文字五十个，合文二组；其中帛书文字二十一个，合文一组。陈邦怀先生此文原作于六十年代中期，所据为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和摹本，写作过程曾与商承祚先生反复讨论，其释“禹”字已见于《述略》所引。旧稿考证凡三十四则，发表前据巴纳氏摹本加以修改，删存二十八则。周世荣文主要论述湖南楚墓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帛书文字也有所涉及。

综观四十年来楚帛书研究的成绩，不难发现，在衮衮诸公中，以饶宗颐、商承祚、巴纳三位先生用力最勤，而李学勤、饶宗颐两先生建树尤多。

## 五 楚帛书结构和性质的研讨

帛书结构比较特殊，整个帛面由三部分文字和二组图像所组成。中间两部分文字一为八行、一为十三行，顺序颠倒，各自为篇。篇又各自

分为三段，段末填以朱色方框为记。周边文字与十二图像相配，分列四方，每方三神像配以三段文字，随帛书边缘循回旋转。两方交角处即帛书四隅分别绘以青、赤、白、黑四色树木。帛文布局 and 神像构图都别出心裁，用意耐人寻味。因为中间两篇文字一顺写、一倒书，周边文字图像又循环周转，这就存在一个如何置图和如何读图的问题。四十年来，主要有两种意见：

（1）以八行一篇为正置图，按八行、十三行、边文顺序读图；

（2）以十三行一篇为正置图，按十三行、八行、边文为序读图。

以上置图根据各家照片、摹本的摆法，读图主要依据释文。第一种意见始于蔡季襄氏的《考证》，采用蔡氏摆法的有蒋玄怡、陈槃庵、饶宗颐、林巳奈夫和巴纳诸家；第二种意见始于董作宾先生，董氏根据东南西北四方之序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的传统，将蔡图倒置，改以十三行一篇为正。李学勤先生由于辨识了帛书中同于《尔雅》的月名，也将蒋图倒置，但释文则从边文开始，顺接十三行和八行两篇。陈梦家先生认为帛书的上下左右应以三首神像为正南。商承祚先生置图与董、李两氏相同，也据边文中出现春、夏、秋、冬四时方位为之确定，而释文则从十三行开始。严一萍氏读法与商先生相同，但补充从十三行起读的理由，是依古代彝铭以“隹”字起句的通例。赞同这一摆法和读法的还有安志敏、陈公柔、陈邦怀、李零诸家。由于蔡氏本人并没有说明其摆法和读法的依据，而董、李、商、严等则从不同角度申述第二种摆法的理由，致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似乎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可是近时情况又有了变化，第一种意见开始出现转机。首先是李学勤先生修正了自己过去的意见，转而赞同蔡图的摆法。他根据近年整理、研究马王堆帛书的经验，认为“以南为上”可能是楚地置图的传统，因而订正从前赞同董氏“以上冬下春为正”的意见，重新确定楚帛书的放置方向也应“以南为上”，即以八行一篇为正，三篇文字以八行、十三行、边文为先后。最近，饶宗颐先生更进一步阐明他向来主张以蔡氏的摆法为正当的理由，主要有三点：（1）八行以“曰故”二字发端，有如《尚书·尧典·皋陶谟》“曰若稽古”，自当列首；（2）十三行所论为王者失德

则月有𠂔，故作倒书，表示失德，无理由列于首位；（3）帛书以代表夏五月之神像为三首神祝融，当正南之位，是为楚先祖，故得以南为上。此外，饶先生还从帛书内容结构上说明三部分文字之间的关系，指出甲篇（八行）辨四时之序，乙篇（十三行）志天象之变，丙篇（边文）从而辨其每月之吉凶。他认为甲篇道其常而乙篇言其变，故甲篇居前而乙篇列后，前者顺写而后者倒书，所以昭其顺逆。两篇特殊结构之用意可以推知。

至于帛书边文十二段文字的起讫，自李学勤先生发现，经饶宗颐先生证成其与《尔雅》月名相同之后，始“取（𠂔）”、终“𠂔（涂）”的序列已大体确定。李学勤、严一萍、陈梦家、饶宗颐诸先生更从月次的排列指出帛书的用历属于夏正。但也有持异议者，如巴纳博士和林已奈夫先生仍然坚持始“姑（辜）”终“𠂔（阳）”的系统，认为帛书的用历不是夏正而是周正。可是，当我们把见于楚简和鄂君启节上的楚月名同秦简《日书》上的“秦楚月名对照表”加以比较研究之后，便可清楚看到，战国时楚用夏正是毋庸置疑的。（参看《楚月名初探》）

关于帛书三部分文字的内容和性质，前面已有所述及，这里再就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略述如下：

（1）文告说 文告说始于蔡季襄氏，是早期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蔡氏第一个把楚帛书称为“繒书”，并根据汉代“用繒告神”的俗例，谓帛书即当时的“告神之繒”；繒上所书文字，则是“古代祠神之文告”。陈槃氏赞同蔡说，以帛书内容为“文纪祀神”。董作宾先生认为帛书主旨在于宣扬“天道福善祸淫”的遗训，所举为古帝王告诫后人敬慎之词。而“天道福善祸淫”一语即出于古文《尚书·汤诰》。诰者告也，因知董说也属文告一类。

（2）巫术品说 此说是郭沫若先生首先提出的，见于《晚周帛画的考察》。郭氏在一注文中介绍帛书的图文布局之后，认为帛书“无疑是巫术性的东西”。安志敏、陈公柔先生认为郭说比较可信，因为“帛书出自墓葬，是用来保护死者的巫术性东西，可能性比较大”。帛文“有吝”、“尚恒”等，很类似卜筮之辞，边文“不可”云云，也有趋避之

意。还指出帛书的图像和内容更多地接近于富有南方色彩的《山海经》和《归藏易经》，而后者则是属于南方系统的卜筮之书。商承祚先生说帛书是“占卜式宗教迷信的东西”。其文辞则类似《诗》、《书》、《左传》和《楚辞》的风格。此外，饶宗颐先生说过帛书“为楚巫占验时月之用”。林巳奈夫先生以为帛书十二月名起源于楚国的巫名，而巫名又代表某一巫师集团，实际也是将帛书看成巫术品一类的东西。近时周世荣先生更将马王堆帛书《天文云气占》的图形文字与楚帛书相比证，认为楚帛书应是一种巫术占验性的图文。

（3）月令说 陈梦家先生于一九六二年秋作《战国楚帛书考》（未完成遗作），是一部专门考证帛书性质的著作。陈氏认为楚帛书的性质与公元前四百年间（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以后）的若干文献很接近，如《管子·幼官》、《周书·月令》（佚文）、《王居明堂礼》（佚文）、《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洪范五行传下》（佚文）等，并将上述各篇与帛书作了细致的比较，认为他们都是月令一类的书。其中《幼官》（即玄官）是齐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之首章是秦月令，其他各篇是汉代的月令，而帛书则是战国中期的楚月令。作者认为，帛书四周十二章就其方位排列与内容来看，应是较早形式的月令。严一萍氏《楚缙书新考》也将帛书边文十二月纪事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诸篇对照，发现帛书所记十二个月行事以“戎”与“祀”为主，与十二纪、时则、月令等篇所记内容之广泛有很大不同，且行事之可与不可也有相反的规定。因断言帛书纪事为另一系统，可能是当时楚国月令的一部分。此外郭沫若先生认为楚帛书类于《管子》的《玄官图》或《五行篇》；俞伟超先生说“是一部相当于《明堂图》的楚国书籍”。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将楚帛书置于《月令五行相生说》一节加以论述，也有类似的看法。

（4）历书、历忌说 历书是李榕先生在其所作帛书摹本的题名上提到的。李氏把摹本（见郑德坤先生著《中国考古·周代》）称为“写在帛书上的楚历书”，可以代表他对帛书性质的意见。可惜作者没有就

帛书性质问题写成专文，我们无从得知其详。李零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详尽地论述帛书是一部与历忌之书有关的著作。他说帛书在大范围上与《管子·玄宫》、《玄宫图》、《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记·月令》、《佚周书·月令》、《淮南子·时则》，以及《大戴礼·夏小正》等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别，主要是：帛书与玄宫图二者置图方向相反；帛书没有明堂图的四宫以及与四宫相配的太室；帛书虽与月令性质相近，但形式上比月令原始，没有复杂的五行系统，内容上比较单一，没有月令诸书那种说礼色彩，只讲各月禁忌。因此，作者认为帛书当与古代历忌之书相近。从帛书有月无日看来，只能算是月忌之书，而且是这种书中较为简略的本子。

（5）阴阳家说 李学勤先生《论楚帛书中的天象》将帛书《天象》篇（即十三行）与《洪范五行传》互相比勘，发现《天象》篇的内容在若干点上接近于《五行传》，除两者某些语句十分类似之外，在内容上，帛书强调天人感应，同时提到“五正”，有明显的五行说色彩，均与《五行传》相近。作者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帛书与《五行传》无疑有共同的渊源，应属于先秦的阴阳家。

（6）天官书说 饶宗颐先生在《长沙楚墓时占图卷考释》中论及楚人之天文学，谓楚之先世出于重黎，重黎即羲和氏，乃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后世阴阳家所从出。读李零、李学勤论文后，又写成专文《楚帛书之内涵及性质试说》，就帛书的性质问题加以讨论。作者不赞成历忌之说，认为李零所举历忌诸书皆极晚出，帛书体裁也与杂忌之书不类，且帛书兼言宜与忌，杂忌书只言忌而已。饶先生认为，《周礼·春官》冯相氏主常度，保章氏主变动，一常一变，职司各异。帛书甲篇辨四时之序主常，乙篇志天象之异主变，常、变有趣，反映古来天官即有此区别。他说帛书虽兼有阴阳家言，然于乙篇保存保章氏遗说特多，所言主体仍是楚人之天文杂占，故视为楚国天官书之佚篇自无可。

以上除早期之文告说外，其余五说皆不离历代术士所传的“数术”之学，应属《汉书·艺文志》所称天文、杂占之类，其思想则与“阴阳家者流”为近。



## 六 楚帛书图像的考索

帛书上的绘画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位于四隅的四木；另一组是分居四方的十二神像。蔡季襄氏《晚周缙书考证》有《缙书图说》一篇论之甚详，他写道：

本书所载长沙出土缙书四周图像，即为当时神权图画之良好标本。由此图像可以窥见当时绘画设色之作风，及荆楚宗教之思想。图就缙书四周用五色绘成，每方绘有奇诡神物各三，四隅则按四方之色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树木，惟西方白木在白缙上无法显出，故以双法代之。此项树木之意义，盖藉以指示所祀神之居勾方位，祭祀时使各有所凭依也。

蔡氏将帛书看作祀神的文告，十二图像为所祀之神，故以四隅之四木为指示所祀神之方位。董作宾氏更将绘画的“四木”与帛文的“五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帛书原有以五木表示五方的观念。他在致陈槃先生的信上说：“四正角上有四木，文右一章第五行云：‘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盖木有五色，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今止有四木，则中央黄木，既漫灭不见矣。”（见陈槃《先秦两汉帛书考》后记）饶宗颐先生也曾怀疑帛书中间有黄木，后来在帛书藏主戴氏处见到原物，反复审视，帛书中间并无黄木痕迹。红外线照片也显示只有四隅四木而无中间黄木。陈槃先生对董氏的方位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四木代表四方“理应安置四边正方之处，今乃置之角间，则非东、南、西、北之谓矣”。饶宗颐先生以为“四隅所绘树木当指四时之木，即指四时行火时所用之木”。“四木绘于四隅者，疑配合天文上的四维观念。”近时饶先生《楚帛书新证》又考甲篇四神乃四时之神，其名目与四隅四木有关。概括言之，四神之名以青、朱、𤟉（白）、墨（黑）为号，与传统以四色配四时及帛书四隅所绘四时之木设色相同。且神名

之末一字中有二𣎵（榦）、一单（檀）、一难（𣎵），当指四木，与四隅表示四时异色之木相符，可以互相印证。

周边十二图像从蔡季襄氏开始，即将所图奇诡神物与《山海经》、《淮南子》、《国语》等所描述的怪异神话相比附，认为帛书图写的就是当时所崇祀之山川五帝、人鬼物魅之形。后来虽然由于辨识了神名首字与《尔雅》月名相同而晓得十二图像为十二月月神，但蔡氏企图从古籍中索求解释帛书图像的做法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为一部分学者所热衷采用，其中以陈槃庵、安志敏、陈公柔诸先生用力最多。根据各家考证的意见，如谓“取（齔）”月神为委蛇（安、陈文），“余”月神为肥遗（饶文），“𣎵（皋）”月神为三首神祝融（饶文），“仓（相）”月神为长角之兽（安、陈文），“藏（壮）”月神为一足夔（安、陈文），“𣎵（阳）”月神为两足两角羊（陈槃文），“𣎵（涂）”月神为口内衔蛇之神（董氏书），或谓一臂神吴回（陈槃及安、陈文）等，多见于《山海经》，也有据《淮南子》、《庄子》、《帝王世纪》等记载而加以比证的。然而仔细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其中问题不少。

首先，图像的某些造形虽然与《山海经》等古代神话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就整个图像本身或某一具体细节而言，却很难与神话传说的记载完全吻合。

其次，各家根据不清晰的图片所描述的形象以及比证的结果，有的已被红外线照片证明是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如所谓一臂神的吴回，红外线照片显示的图像是两臂俱全，则吴回之说，自属出于想像。

再次，个别的比证即使是有说服力的，但从整体看来，仍显得零散不成体系，不易令人信服。

所以，陈槃先生在举证若干神话记载以说明某一图像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红外线照片出现后，饶宗颐先生在《楚缙书之摹本和图像》一文最后总结说：“缙书十二月神像乃战国时楚俗图绘，尚保存较古之形态，及代表南方思想之一类型，更足宝贵。然于图形之解释殊非易事，今但知十二图像为十二月之神，最

足资研究者为三头人身神像及一首两身之蛇。余不可考，不敢妄说。”

林巳奈夫先生《长沙出土战国帛书十二神考》彻底否定从《山海经》等书寻找解释图像的方法，认为将十二神进行个别比附是徒劳的。对于帛书十二月神的名目，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认为帛书的十二月名起源于楚国的巫名，每一个巫名代表着一个巫师集团，由于这个集团职司某月，便把这个集团的名称作为该月的月名，林巳奈夫先生这个设想虽然很有道理，但仍嫌缺乏文献上的有力支持。此外，有人从帛书与葬俗的关系推想帛书上的十二图像可能与大雉中的十二神及十二兽有关（安、陈文），还有认为帛书图像以十二神兽配十二月，与后世数术家以十二兽配十二辰的所谓“十二生肖”立意相同（曾文）。可是大雉与十二生肖只见于汉以后的记载，其与帛书关系如何，只好存考。

最近李零在其《楚帛书研究》中指出，帛书十二神像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十二月名本身。“十二神就是十二月神，它们的名称应当以各章章题来定，而无需远涉他求。”但同时他也承认，“关于各章章题的含义，以及它们与十二月神图像的关系，目前还不能做任何肯定的结论。”

总之，在帛书十二图像的研究方面，虽然前辈做了不少工作，但至今仍不能构成有系统的结论。目前比较认同的看法是：

（一）十二图像由其旁注首字与《尔雅》月名相同，可确定它们为十二个月的月神无疑。

（二）每个图像之旁所注三字，由“秉司春”、“𠂔司夏”、“玄司秋”、“𠂔司冬”可推知其含义应该是指该月月神之职司。

（三）图像、职司及月事宜忌三者存在一定的关系。

至于某月之神何以取象某形？职司除四时可见外，其余各月神所司何职？图像、职司与月事之间的具体关系又是怎样？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继续加以考索。

（节录自《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第一版；载郑伟明编《论饶宗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 选堂先生“三重证据法”浅析

1982年5月，“香港夏文化探讨会”在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选堂先生在探讨会开幕式的致词中谈到有关研究夏文化的材料和方法问题时，首次提出用“三重证据法”来研究夏文化。其时笔者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追随选堂先生从事楚地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会后，郑德坤所长命笔者协助林寿晋先生草拟这次夏文化探讨会的新闻稿，在港报上作了简要的报导。所以，笔者是选堂先生“三重证据法”当时在座的聆听者之一，故想借此机会对选堂先生的“三重证据法”作些回顾和诠释，以供研究者参考。

### 一 “三重证据法”的提出

选堂先生在《致词》中首先谈到“夏礼”的问题，他认为，目前要细谈夏文化尚嫌太早。所谓夏文化，从广义说，可从文献记载上的夏礼，结合出土资料加以探讨，并从天干命名和丧礼立主二事来考察殷人如何因袭夏礼的迹象。接着，他把话锋一转，便转到“三重证据法”方面来。他说：

我想借此机会说一说研究夏文化的材料和方法的问题。现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田野考古中探索夏文化的遗存，这无疑是十分

重要的。夏文化的研究能否出现决定性的突破，有赖于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就夏文化的整体而言，地下遗存毕竟有它的局限性，而且遗存也不一定有文字标志足以表明文化的内涵；所以，我们还得把考古遗存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尽管古籍中关于夏代的材料不多，但是许多零星的记载，却往往透露着夏代社会的资讯，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发掘。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甲骨文。在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在时间上应该属于夏代的范畴，可看作是商人对于夏代情况的实录，比起一般传世文献来要可靠和重要得多。我们必须而且可以从甲骨文中揭示夏代文化的某些内容。这是探索夏代文化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总之，我认为探索夏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结合起来，即用“三重证据法”（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多了一种甲骨文）进行研究，互相挾发和证明。倘能在这方面做出成绩，那么，我们对于夏代情况的了解，将会更加具体而全面。那时来讨论夏文化的有关问题，就可说是“适时”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众所周知，自从王国维在上世纪初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的“二重证据法”<sup>①</sup>以来，学术界通过对大量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同以往大不相同的局面。学者们对新的研究方法有重新加以总结并进一步升华为新理论的必要。选堂先生一向注重材料与方法的统一，认为它是解决一切学问的关键。就甲骨文而言，先生认为甲骨文的材料问题已经解决，

---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国学月报》第二卷，第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北京：述学社出版，1927年10月31日，《王静安先生遗著》第365—399页。《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各种著录已相当完备，学者可省去翻检之劳。但方法上却面临着一个更新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常常会受到习惯性思维的影响而互相效仿，习焉不察，跳不出旧日的圈子，这样长此以往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极力主张“必须打破旧框框，从新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上面提到的“三重证据法”，就是先生从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具体体现。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对“三重证据法”的说明中提到的“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多了一种甲骨文”，这句话是特指“夏文化”研究说的，对一般方法论而言，尤其是对殷商文化研究来说，王国维的“地下之新材料”当然也包括甲骨文在内的。“三重证据法”的创新之点，是把有文字的出土新材料同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区隔开来，且特别强调“有文字材料”的重要性。这不但同当前大量涌现的出土文献的客观现实相符合，而且对于古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将更趋缜密和科学，同时也有利于广大的研究者能更加自觉地加以应用。先生强调，面对地下层出不穷大量涌现的出土文物，我们必须时时注意方法的更新和角度的变换，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先生高瞻远瞩发自内心的呼吁，应该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

## 二 “三重证据法”的发展

2003年，选堂先生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的开篇《论古史的重建》中，对其“三重证据法”有进一步的申述。他说：

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的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

先生进而提出今后必须采取的三种途径：

(一) 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 作为我们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

(二) 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 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 做深入的探究;

(三) 在可能范围下, 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 经过互相比勘之后, 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选堂先生认为, 出土文物如果没有文献作为媒介说明的根据, 直接的报导, 只有考古学上的数据。这和当时的人地关系无法取得某历史事件的联系与说明, 仅有“物”的意义, 没有“史”的实证。他深有感触地说: “须知, 地下层出不穷、浪翻鲸掣似的出现古物, 正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冷静地去借重它们, 以比勘古书上的种种记录, 归纳出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 从而寻绎出有规律的历史条理来。”这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学方法。

先生又在《谈三重证据法》的“补记”中再次强调出土文字资料的重要性, 他说:

我所以强调甲骨文应列为“一重”证据, 由于它是殷代的直接而最可靠的记录, 虽然它也是地下资料, 但和其他器物只是实物而无文字, 没有历史记录是不能同样看待的, 它和纸上文献是有同等的史料价值, 而且是更为直接的记载, 而非间接的论述, 所以应该给予一个适当的地位。

1992年, 杨向奎先生在他所著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也有“古史三重证”的讲法, 杨氏认为: “民族学的材料, 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 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 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sup>①</sup>针对杨

---

① 杨向奎: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序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氏这一见解，饶先生指出：民族学只可作为间接的“辅助资料”，而不是直接的史料。他说：民族学的材料只可帮助说明问题，从比较推理取得一种相关的理解，但不是直接记录的正面证据，尽可作为“辅助资料”，而不是直接史料。选堂先生又指出：“民族学的材料，和我所采用的异邦之同时、同例的古史材料，同样地作为帮助说明则可，欲作为正式证据，恐尚有讨论之余地。如果必要加入民族学材料，我的意见宜再增入异邦的古史资料，如是则成为五重证了。”

值得注意的是，饶先生在这里提出了古史的“五重证”，包括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个层面。直接证据分实物与文献两大类，实物指地下出土的器物 and 遗迹，文献指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传世的古代典籍。这些都是直接的史料，而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则是当时人的文字实录，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饶先生最初提出的“三重证据”指的就是这种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包括杨向奎先生提出的民族学材料和饶先生自己补充的异邦古史资料在内，由于这些不是直接的史料记录而是间接的论述，只能从比较推理中求得相应的理解，帮助说明问题，故只可作为辅助资料，而不能作为正式的证据。由此可见，选堂先生实际上是主张以“三重证据法”为主，但并不以“三重证据法”为限，必要时还可以采用其他的间接证据。所以，将这“五重证”称之为“多重证据法”亦未尝不可，只不过这多重证据中存在主次之分而已。换言之，饶先生并不排除将民族学材料作为研究古史的证据，只不过将它同当时实录的古文字资料相比较，两者确有直接与间接之别罢了。因此，我们今天进行古史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必须充分利用新出的古文字资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加以拓展，用明晰的、具体的“多重证据法”代替相对笼统的“二重证据法”。它包括直接证据的考古实物，出土文献，传世典籍和间接证据的民族、民俗史材料，异邦的同时、同类资料在内，综合地加以运用，才能在新的条件下把古史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选堂先生所着力倡导的“三重证据法”中的“三”字，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是实数的“三”，指的就是上述三种直接的证据；另一是虚数的“三”，即指多数，包括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在内的多重证据。这便是迄今为止对古史和古文献（含古文字）研究在材料和方法论上最新和最全面的概括和论述，是一项具有时代标志的重大创举。


### 三 “三重证据法”的应用举例

选堂先生“三重证据法”的核心，是将地下发现的文字资料同其他的遗址、遗物加以区分，而出土文字资料中又特别强调利用甲骨文研究夏代和商代的历史和文化，故本文关于“三重证据法”应用的实例，仅限于列举选堂先生近期运用甲骨文、牙璋和古籍记载探讨夏商文化的若干个案，以见“三重证据法”应用之一斑。

#### （一）从甲骨文考察夏代的礼制

选堂先生曾经指出，“礼”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大动脉，研究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都应该把对“礼”和“礼制”的研究作为一个重点。中国最早的夏礼，可以从天干命名和丧礼设“重”中见其端倪。

关于天干命名，先生认为夏末诸帝帝号有胤甲、孔甲和履癸。诸帝号皆在天干上加以美名，这和殷王的戊甲、阳甲、沃甲等完全一样，可以看出商人在王号制度上是有因循夏代的迹象。至于命名的天干是不是忌日的庙号，先生根据《合集》1106这条有关立庙主号为“帝”的诳日卜辞，起初有丁、乙、辛三日的选择，最后才定在丁日，由此判明庙号出于忌辰之说是站不住的；并从帝辛、武庚不可能有庙号推论殷代先公先王的示癸亦当是生称，不可能是后人根据他的忌日所立的庙号。所以，一般甲骨学者根据谯周言“死者庙主日甲”而把所有殷代先王的甲乙名称都说成是忌日的庙号是不足信的。至于“重”上悬铭旌记死者之名，何以但书生日之甲乙而不书子丑？《白虎通》卷八《姓名》云：“不以子丑何？曰：甲乙者，干也；子丑者，枝也；干为本，本质，故以甲乙为名也。”可见班固以为殷人尚质，故以天干为名。对此，选堂先生却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我疑心殷人姓子氏，对‘子’有所忌讳；故不以十二辰为名而全用十干。只有高祖亥一名见于卜辞。亥还是

夏时人，乃用地支最末之亥为号。卜辞亥亦作，王观堂谓亥乃正字。若然，则夏世殷商的先人命名，亦曾一度杂用十二辰，后来乃统一之，改用天干，以上甲微为始。这是一项重要的礼制。”




至于丧礼立主的制度，则是在“措之庙立之主”之前，先立一根木头，相当于铭旌的杠。这根本就叫做“重”，置重于中庭，把死者的名字写在铭旌上。重是未有木主以前代替神主的东西，在晋代称为衰门，王肃《丧服要记》云：“鲁哀公曰：‘衰门起于禹。’”（《御览》引）可见“重”是夏世丧礼的用物，原是夏制，殷人因之，并缀木主于其上，即所谓“殷主缀重”，至周人才撤去之。人但知立庙主，而不知立庙之前尚有代主之“重”，其作用与主同。这是一种临时的主，其源也出于夏礼。

夏代是迄今为止仍未发现文字的朝代，选堂先生利用甲骨卜辞的材料同古书的记载互相抉发，证明殷人的天干命名与丧礼立重与主，均来源于夏的礼制。

## （二）据卜辞研究商殷之地域

卜辞水名只有河、洛而不见江、汉。过去因囿于旧说，一直将商殷地域范围局限于大河南北。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在四川发现三星堆遗址，90年代在长江三峡开展大规模考古工作以来，对于商代巴、蜀文化的面貌及其受到商文化影响的程度，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在这个大背景下，选堂先生敏感地把研究聚焦到西南历史地理和文化方面来，他十分注意从甲骨文本身去归纳材料，然后从先秦典籍中寻找出与甲骨文所记载内容有承接关系的例证，加以比较和论证，为窥探殷商地域的历史真相，做了一系列饶有意义的工作。

### 1. 力证先蜀之方为邛方，乃古时江源之强国。

甲骨文习见的方常作下从等多种异体，唐兰首释为邛，即邛笮之邛，其地略当四川之邛县<sup>①</sup>。陈梦家据《说文》以为邛在济阴<sup>②</sup>。金

①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53—54页。

②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73—274页。

正耀从青铜器含铅的同位素证明卜辞之𠂔方应是邛笮之邛，支持唐说之可信。选堂先生力证卜辞中双钩之“𠂔”即“江”之省。《合集》20615片云：“丁巳，𠂔方水。”先生指出，双钩之𠂔即带口之𠂔的复笔，此片字特大，所以彰示其事，殆记𠂔方大水泛滥。《说文》：“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崦（汶）山入海。”卜辞有河、洛、淮，双钩之𠂔即“江”之省。江水古亦称沱水，《史记·武帝纪》：“青阳降居江水。”《帝系》作沱水，沱水必因氏人所居而得名。江（沱）水出蜀郡氐道县，蛮夷所居曰道，是汶山江源古为氏人区域，殷代称之为𠂔方。据卜辞，𠂔方是对殷王朝威胁最大之方国，论者以其地在河南、山西、河套说之，均缺乏根据。今知𠂔应在江源，当为蜀地出邛竹杖之邛。邛方以江源而得名，在氐道县。汉之江源县，王莽复古改名曰邛源，盖溯其源流出于邛方。益信邛方为蜀地岷江上游的一大部族，其为殷西部之劲敌，可以无疑矣。先生又从“邛方”的线索入手，对卜辞中的蜀、瞿土人、氐、危方、兴方、瞿方等陇蜀地名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勘；并将与“邛方”有征伐关系的对象，如丰、微、北唐、獬、戈诸地，通过同版卜辞，特别是同条卜辞的上下文关系，均可找到其内证。殷代𠂔方辖境虽不可确知，然大体上必沿安宁河流域自西昌以北至今之越西、雅安、邛崃诸地属之。汉代邛人之居，或即其旧疆，故至汉末犹保存“邛谷”一名。

## 2. 发现卜辞之“𠂔”即漾水，乃漠水之源。

武丁卜辞有残辞“于𠂔不”等若干条，“于”下之“𠂔”可判明其为水名，实即漾水。其中一条与“𠂔方”同见于一片。考《禹贡》有“幡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记载，可见漾为汉水之源。《水经》：“汉水出陇西氐道县幡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郦注引阕駟云：“汉或为漾”，又云：“漾水出獬道，东至武都入汉。”可为佐证。汉水流域出土有蜀戈，若戣、戠等兵器，说明与蜀关系十分密切。有一辞与“𠂔方”同见一片者，足见𠂔地必属蜀境无疑。

## 3. 从卜辞中发现作双钩形的“𠂔”及“帝江”，“帝江”乃江水之神。

如上所述，选堂先生力证卜辞中作双钩形的“𠂔”为“江”字之

省，“江”指江水，江源则是“邛方”得名的由来。先生又于卜辞中两见“辛亥卜，帝江𠂔？”之辞。其中“江”字上部原作四点之水，下从带口之𠂔。江乃水名，带水之“工”与双钩之“工”有异曲同“工”之妙。江水之江，指江水所经之地，作为方名，殷人又称为𠂔方，后称邛方；江水之神则称为“帝江”。考江神之史实，可追溯到殷代。神之高者可称帝。《山海经·西山经》有神曰“帝江”。根据选堂先生的归纳，帝江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 (1) 与神耆童为邻；
- (2) 所在为日出的汤谷；
- (3) 是一团混沌无面目的红色火。

这是有关江神的神话，其中“耆童”即楚简习见之楚先老童，老童、祝融于楚国祭祷简中每每同时出现。此条言帝江与祝融之先代老童相毗邻。是知帝江之所居即祝融降居之江水，故“帝江”之“江”在这里特指江水是合乎情理的。帝江既是江水之神，即指四渎之江水，说明殷人占卜是否降患于帝江是可以成立的。选堂先生既力主“𠂔方”即四川江源之邛方，继之又发现汉水之源的“漾水”及江水之神为“帝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殷卜辞‘工方’，历史所未载，极可宝贵。惟‘帝江’见于《西山经》，今得卜辞证其确为殷代之神名。在殷地理的零星资料中发现‘江水’，其重要性不亚于在先公行列中觅得王亥，其快慰为何如耶？”

### (三) 从牙璋分布印证《淮南子》所称之商人疆土

出土牙璋存在各种不同的形态。过去由于对文献记载未能真正理解，学术界对其定名尚未最后确定。据《御览》引《吕氏春秋》称“成功用璋”，似与告成功之用有关。选堂先生据《山海经·南山经》有用璋祭山之礼的记载，以为牙璋的外形类似以掌擘山的工具，可能古人认为牙璋具有这种“开山”的作用。先生于1991年在越南出席远东学院90周年的庆典，在会上介绍国内外有关牙璋的出土情况；199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牙璋研讨会”，又以彩陶和牙璋为焦点，对牙璋的研究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选堂先生认为，过去因受到顾颉刚先生《古史中地域的扩张》一文的影响，认为时代愈后，历史传说对地域的知识愈加扩大。误以为《尧典》“宅南交”一类的记载，是出于汉人的观念。因而把三代的地域尽量缩小，谈及殷代的地理，也只局限于大河南北。幸而频年以来考古事业的发展，令人们的看法完全改观。例如，三星堆文化面世后，使我们对于巴蜀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将这一新的认识结合到甲骨文研究中，就会发现，卜辞中旧时被误认为在北方的一些部族，如今看来应该是在巴蜀秦陇地区，而旧以为位于商朝中心的田猎区，有一些很可能是在河渭流域。目前发现的商代遗址，据彭邦炯初步统计，已达181个县市，其分布东至辽宁、内蒙古，西及四川，南极湘赣<sup>①</sup>。如果再从发现牙璋的地点观察，则东濒黄海，南至交州及闽粤海隅，均可见到牙璋传播的足迹。我们将三星堆和越南出土的牙璋与偃师二里头带有成排的𠄎牙对比，便不难发现，同一类型的牙璋不但远播西南地区，其足迹甚至抵达越南。可见《淮南子·泰族训》所称商人疆土“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完全符合事实。

（原刊香港《明报》月刊“四十一周年特大号”第86—90页，又《华学》第九、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

---

<sup>①</sup> 彭邦炯：《商史探微》，四川：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80页。

## 选堂先生学艺领域的新飞跃

1980年秋，笔者有幸陪同饶宗颐先生在神州大地从事学术考察活动，达三个月之久。先生足迹遍及十一个省市的三十三个博物馆，行程达数万里。在这次旅行中，饶先生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批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兴奋异常，回港后特意刻了一方“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的印章作为纪念。

先生这次国内旅行所带的行李十分简朴，但却随身带有《徐霞客游记》和《杜诗镜诠》这两部书，在旅途中随时翻阅。他一路写生，特别是在敦煌、三峡、承德、泰山、扬州和富春江，都留下不少画稿，为他日后的画作提供了不少素材。路过景点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饭前主人已备好笔墨，请先生挥毫。这时候，先生往往会利用餐桌上的纸巾打好草稿，饭后一书即就，皆大欢喜。先生的不少诗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兴抒怀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饶先生30年前的这次神州行，是先生30年来学艺大飞跃的一次新起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

### 一 适时地提出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

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一册，开宗明义第一个命题，便是“论古史的重建”。先生指出：“以前对于古史的看法，是把时间尽

量拉后，空间尽量缩小。”又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停滞在几本古书、在纸上文献，翻筋斗式地，去任意作先后的安排，来武断事物出现的层次；或者只赤手空拳打几套玄学式的历史学的猜拳游戏。”先生着重指出：“须知，地下层出不穷，浪翻鲸掣似的出现古物，正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冷静地去借重它们，以比勘古书上的种种记录，归纳出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从而寻绎出有规律的历史条理来。”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古史研究，大体经历过“信古——疑古——证古（释古）”三个阶段，毫无疑问，饶先生都是立足于每个阶段的最前沿，引领着学术潮流向前迈进的。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有大量的篇幅，就是致力于证古和释古工作的。在重建古史的基础上，先生更期待未来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创造出思想文化和科学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 二 提倡用“三重证据法”研究古史

“三重证据”就是用传世文献、考古器物 and 古文字资料三者互相印证，也就是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以地下出土器物印证纸上记载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重“文字记录”。饶先生指出：“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

饶先生的“三重证据法”是1982年5月在香港“夏文化探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目前要细谈夏文化，尚嫌太早。”他话锋一转说：“但甲骨文里头的先公先王，不就是夏代人吗？”接着他以夏末诸帝号皆在天干上加一美名（如胤甲、孔甲和履癸），同殷王名号的戊甲、阳甲、沃甲等，完全一样。可以看出商人在王号制度上存在因循夏代的迹象。最后他指出：“探讨夏文化必须把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结合起来，互相挾发和证明。”

然而饶先生运用“三重证据法”的杰作，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的《西南文化创世纪》一书。这本书首次探讨并揭示了我国西南文化在商代文明进程中的独特成就。

甲骨文中有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方国——叫“𠂔方”，旧读为“鬼方”。从武丁卜辞可以看出，商王朝与“𠂔方”之间的战争历时甚久，规模不小，动辄使用三千兵力讨伐（见《合》6168—6185），其中一次动用的兵力竟多达五千之众（《合》6167）。可见其势力之强大。但其地在何处？过去学术界界定在黄河中下游。饶先生慧眼独具，他以三星堆的发现为契机，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法，重新审视甲骨文中相关的材料，揭示其中奥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几项考订工作：

①力辩𠂔与工为一字之异写；

②指出卜辞中作为神名的“帝小工”实为“帝江”之误。“帝江”见于《山海经·西山经》，乃江水之神。

③考释武丁子组卜辞的“丁巳，江方水。”（《合》20615）中的“江方”，就是“工方”，乃指江水流经之地。其神曰“帝江”。

④古代蜀人称帝者甚多，有卢帝、保帝、望帝，江之称帝，自是蜀人之习惯。

通过以上4点，不但证明卜辞中的“𠂔”字释为“工”确定无疑，而且还找到了“𠂔方”与蜀地有关的直接证据。此外，本书还详考“𠂔方”的“工”当读为邛，殷代的“𠂔方”当含有后来的邛崃、邛都等地，均为古代巴蜀之地，则“𠂔方”之地望，亦就不辨自明了。

### 三 “从世界观点出发”研究汉字起源和汉字文化

唯一一本没有收进《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著作，就是1998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这部书。这部书反映饶先生对汉字、汉文化的独特见解。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学者以新发现的史前陶器上所刻划和绘写的陶符为依据，来探索汉字的起源。他们的意见虽然不尽相同，但所用的基本方法，都是拿陶符与商周时期的甲骨、金文作对比。可是史



前陶器上的符号，其年代与最早的甲骨、金文相距每每有上千年，甚至几千年，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实在没法证明。

饶先生1976年在法国从勃罗蒂教授研治西亚楔形文字，并译有《近东开辟史诗》，这使他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先生也非常注意研究新发现的史前陶符，但他并没有把史前陶文简单地和甲骨文、金文作对比，而是将中国陶器符号同闪族字母、苏美尔线形文字相比较，结果发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上的符号，同腓尼基字母比较，竟有20个以上完全同形，从而提出了“字母型符号”说，并进而论述“字母型符号”与戎狄之间的关系。

然而，中国人既然很早就与异族有接触，且使用异族的字母，为什么中国文字不使用字母呢？对于这个问题，饶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他说：“由于古代万国林立，方音复杂。欲统一语言已不容易；至于进行语言化，把语言代替文字，更谈不到了。汉字无法走上字母道路，理由在此。而文化传统过于深厚，更无此必要。”

饶先生还引用美国古德玮教授的话说：“虽然西方传教人士很早已将字母传入华夏，但始终无法引导汉字纳入字母化的道路。”他指出，“汉字传承精英文化，蕴积至为深厚，不受西方影响。”饶先生着重指出，“汉字不走上使用字母的道路，在古代早已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另一方面，由于饶先生对甲骨、简帛等中国古文字资料有深湛的研究，所以在世界性学术视野下，他并没有套用西方现存比较文字学的框架，而是别具匠心地提出“汉字树”这一创说。

关于“汉字树”的内涵，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语、文分离”。汉文字以形为主，摆脱语言。使语言与文字呈现相对分离的状态。在“书同文”的背景下，实行着文字对不同方言的控制，使汉字具有超方言的特性。

二是“文字不随语言变化”。汉字始终以形为主，只有部分记音，故文字形体不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今天可以读懂数千年前的卜辞和竹简文字，就是汉字具有超越古今的特性。

三是“文字、文学、书法艺术三者连锁发展”。汉字一形一声，走

上规范化的道路；汉字的形文与声文的对称美，构成了文学和书法的艺术，三者相辅而相成，彼此连锁发展，造成一棵枝叶繁茂，风华独绝的汉字树，构成汉文化最大特色且引人入胜的魅力。

（此文为曾宪通在“岭南风韵——饶宗颐书画艺术特展”座谈会上的发言稿，2011年10月于广东省博物馆）

## 读选堂尊翁《饶锬文集》有感

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的《饶锬文集》，最近作为《潮汕文库·文献类》丛书正式面世了。这是整理和重刊濒于亡佚的潮人名作中一项极富意义的工作，它将对当前的潮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新版《饶锬文集》封面有陈伟南先生亲笔题署书名。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天啸楼集》五卷和《潮州西湖山志》十卷据原书影印；由陈贤武、黄继澍整理新辑之《拾遗卷》和《饶钝盒先生作品系年》则另行排版阑入其中。全书典雅大方，灿然可观。

饶锬（1891—1932）先生原名宝璇，后更名锬，字纯钩，号钝盒，又别号尊园居士。先生出身富豪之家而无纨绔陋习。自幼生性喜书，藏书、读书、著书为其一生所好。自言“藏书万卷，读书千卷，著书百卷”。其天啸楼藏书逾十万卷，富甲一方。据曾楚楠氏统计，先生已刊、未刊之各类著述，已达十六种之多（见《天啸楼集》重印《前言》，尚有《吴越游草》及《西湖游记》各一卷未计，见《饶锬文集》第81页）。倘若天假以年，其成果将无可估量。人们但知饶宗颐先生是当今“潮学”的创始人，拜读《饶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之后，令人更加明白饶宗颐先生的尊翁早就是“潮学”研究的带路人，他对“潮学”研究的思想启蒙和学术深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一 在潮汕文人群体中独树一帜

饶锬先生从小酷爱诗文，以童稚之年负笈漳浦，备列温丹铭大师门墙。温氏以其为文颇合于古人矩矱，对他深寄厚望，希望他为潮汕文人之能成家者。稍长即游学四方，“探禹迹之旧墟，扬秦火之灰尘”，跋涉三千里。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创办《国故》月刊，主编《粤南报》，其诗文在潮汕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集》所收各类文体，包括序跋、传记、书简、寿文、志铭、哀诔等，都是当时流行的散文。郑晓屏氏《墓志铭》谓：“君文无宗派，以桐城义法出入唐宋明清诸大家，无意于古而与古会，当于庐陵（欧阳修）、熙甫（归有光）间别置一席，时贤中罕见其匹也。诗不逮其文，亦有法度，得意处往往联镳两宋，所谓不懈而及于古者。”当时潮汕一带的文人群体，大抵以若干深具家学渊源的望族为核心，除州城饶氏外，枫溪柯氏、漳浦冯氏、澄海蔡氏、揭阳郭氏、大埔温氏等，加上师生同窗，亲戚朋友等情谊，实际上已初步形成一个松散的文人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先生以其超人才华和丰厚实力，往往起着举足轻重乃至独领风骚的作用。先生早年接受进步思想，曾参与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组织的“南社”活动，又与江南巨子高吹万等共同倡议组织“国学社”。在“南社”和“国学社”的影响下，潮汕一带立社聚讲、授徒较艺的风气也有所形成，先后有瀛社、韩社、壶社接踵而至，先生都给予积极关注、指导和鼎力支持。他在《韩社题名录叙》中谈到，吾潮所称魁儒畸士，其成就终不能与中原角逐，其故何也？“学无渊源而志趣不务大之弊也。盖学无渊源则习焉而不精，志不务大则薄有所能辄矜以自喜，两者不知去取而欲其所成就以跻乎古作者之列，难矣！”故先生提倡“幼稟家学，壮而游乎四方”！先生为人豪侠，思才若渴，欲“广求天下奇士得聚处一室，相与上探汉魏，研讨幽微，以其跻乎古人迥绝之境”。与潮人郑晓屏、杨光祖、石铭吾、詹安泰等志趣相投，昕夕酬唱。在他分别与冯印月、柯季鹗“披襟抵掌，谈天下事”之后，对这两位“不相识亦甚相慕”的年

青气锐者，积极促其订交，成为当年文坛流传的一段风雅佳话。壬申（1932年）元日，由辜师陶、杨光祖发起，先生邀请十六位时彦名士，觞集于菴园之盟鸥榭，分题吟咏，宣布“壬社”成立。社中同仁共同拥推先生为首任社长。随后，先生又亲自作《壬社序》为记。可惜未及半载，先生竟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石铭吾代表全体社员撰挽联云：“一代文章托吾子，九重泉路尽交期。”足见壬社同仁对先生之倚重与难舍。

## 二 主张治学“以考据义理为先”

我国“考据”之学肇始于两汉，故又称为汉学；极盛于乾嘉，即所谓乾嘉学派，故又称为朴学；是历代治经治史的传统治学方法。其内容以传统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核心，辅以目录、校勘、版本和历史、考古、金石等相关知识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其特点是罗集大量资料，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实证，无征不信和立意创新的精神，这些对于今天的学术规范和古籍整理都有现实的意义。

辛亥（1911年）之秋，清廷鼎革，饶锬先生避乱家居，终日沉浸于“考据”之事。他认为“学问之道，考据义理为先，文章其余事耳”。温丹铭氏在《赠饶君纯钩并序》中说：“纯钩，余分教同文学堂时学生也。近数年来，见其所作古文辞颇合义法。今岁以创《国故》月刊故来书通问。秋仲之潮，因造访焉，款留深谈，出所著《〈佛国记〉疏证》、《王右军年谱》相质，详审精博，盖文人而兼学人矣。喜赠以诗。”并在诗句“义安开郡后，千载得斯人”下自注云：“吾潮向但有诗人、文人，而无学人；宋明义理之学，尚可得数人，若考证则纯无矣。”又在诗句“山原无择壤，道岂限传薪”下自注云：“君独学深造，不由师承。”（见《文集·拾遗卷》第178页）很显然，温丹铭氏在这里明确指出饶锬先生是吾潮首位从事考证的“学人”，并且申明，他在“考证”方面的成就，并非来自师承，而是由他自己独学深造得来的。

然而，我们从《文集》中得知，先生有关“小学”的功底，其实是深受其仲兄次云先生的影响的。他在《仲兄次云先生行述》一文中记述仲兄刻意治小学且已达致“斯极”的情况：

兄性嗜学，手不释卷。初读文选，苦其字难猝通，乃刻意治小学。自《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韵》以下，于古今人之言“六书”者，靡不探讨。其于《说文》尤致力焉。每校一过，辄别纸札记，朱墨并下，字同蚊脚，阐幽抉微，精核有突过前人者。……兄既通小学，遂旁及金石刻文，凡奇形怪体，正别俗伪，假借通转之字，皆辨之。故就问字者，有叩必应，闻其说，无不豁然意满。兄于斯道，其可谓能至于斯极者矣。

甲寅（1914年）之后，先生与仲兄始家居相依，辄夜聚首，剪烛品鹭术业，畅论字书音韵源流及文章声病，常至漏三下乃罢。在乃兄的启迪下，先生曾计划仿扬雄《方言》为《潮雅》一书。《潮雅》者，揭示潮州方言中所保存之中原雅语也，先生拟就岭东方言与中原语音“穷其声变，察其本抵”，并以其所知者“征之经传”。次云先生对此深表赞同，并从容为其“诊发数十事”，上稽古训，疏通证明，如剖符之复合。由此可见，先生专注于考据工作虽非师承，但他与仲兄次云先生经常切磨砥砺的家风实在有所促成。

如何打好“小学”的基础？先生在《答某君书》中，严厉批评当时流行的两种说法：即“习小学者当以《康熙字典》为宗”；“用字出于字典之外者必为臆造。”他认为这完全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并且指出：在未有《康熙字典》以前，小学之书已汗牛充栋，其最古而尤要者，若《尔雅》、《说文》、《方言》、《广韵》、《集韵》、《广雅》、《释名》等书，虽皆见引于字典，要多割裂淆乱。他反复告诫学者必须苦读原书，方能窥见古人为书之旨。并再三强调：“此数书者虽繁枯难识，然习小学者不能舍此而他求也。”

字词训释和名物考订是考据工作的基本功。本《文集》中处处呈现

先生在这方面杰出的才能。如《天啸楼记》云：

子独不见夫风乎？夫风天之声也，其来也其声飒飒然，其动于物也泠泠然。及其变而为颺也，卷沙拔木，崩崖裂石，天地为之惨淡，飞潜为之屏息。彼其泠泠而来者，天声之自然者也。其变而为颺也，天声之不平者也。凡自然之声谓之声，不平之声谓之啸。余穷于世久矣。动与时乖迕，外动于物，内感诸心，情逼时则为不平之鸣，而一于文辞诗歌焉发之。故吾之为文与诗纵怀直吐，不循阡陌。愁思之音多，盛世之辞寡。是虽生际乱世使然，夫宁非天之啸与？此吾之所以名吾楼也。

这篇短文从释“风”与“颺”，释“声”与“啸”入手，风起云涌，波浪壮阔，气势磅礴。“外动于物”，而“内感诸心”，“不平则鸣”之于“文辞诗歌”。这正是先生之文与诗“纵怀直吐，不循阡陌”的最好注解。故知先生以“天啸”为藏书楼命名，寄意高远，从中也不难发现其阐发“考据义理”的功力。

在“天啸楼”落成后，先生即于楼下度隙地为私家园林。在广袤不及亩的蕞尔小园里，先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十三个“景点”，有树、石、池、桥、亭、榭，在“画中游”的门联中，至今还保存着选堂先生十四岁时所写的名对：“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修廊曲折，俨若园然。遂将园林名之为“蕓园”，并作《蕓园记》云：

谓之蕓者，蕓即茆，取《诗》：“思乐泮水，薄采其茆”之义也。

按：“蕓”字异写作“菀”，是一种睡莲科的多年生草本，又有茆、水葵、露葵等异称。生于湖沼、河滩等的浅水之中，其嫩叶可供食用，俗称菹菜。文中引诗见《诗经·鲁颂·泮水》。“思”为助词，无义。

“泮水”，指学宫前的水池。“薄”，急忙。“茆”即莼菜。大意是，在学宫前的水池里忙于采摘莼菜，是多么快乐的呀！寓意“学而有得”。先生表示：“余曩者亦曾从事于学矣，为之勤而未始有得也。今幸获有斯园以居，……余自是将屏人事，绝嗜欲，发楼上藏书而耽玩之。以蕲由学进而知道之味，如《诗》‘采茆’之譬。”可见先生命名“蓴园”，也是从阐发《诗经》的义理出发，并以诏后人，一胥“以学为本”也。

先生在《壬社序》中对于“壬”字的考述，极具“训诂”的意味：

余谓壬之为言任也，义与人心之心同训。而诗为心声，言壬不啻言心，以壬名社亦无不合。又壬为北方之位，阴极则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言阴阳交则物怀妊，至子而萌也。今之世非所谓阴阳交会时耶？然而至子而萌则又有待也。

在这段文字中，“壬之为言任也”，见《白虎通义·性情》；壬“义与人心同训”见《尔雅·释亲》；“壬位北方”至“战者接也”见《说文·壬部》。段玉裁注曰：“《月令》郑注：‘壬之言任也，时万物怀任于下。’《律书》曰：‘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律历志》曰：‘怀任于壬’。《释名》曰：‘壬，妊也，阴阳交，物怀妊，至子而萌也。’”可见先生将“壬社”的“壬”字解释为“心”和“任、妊、怀子”等涵义，是根据上述的六七种典籍才做出的合理判断，充分展现他治学的缜密与精严。

在《西湖山志》卷一“总志”类中，关于山名西湖及湖之肇浚年代，各书均未明言，先生据许骞《重辟西湖记》、唐肃宗乾元《诏》、王汉《金城山记》而为之考订云：

大约西湖当唐时为放生池，迨宋方名为湖。其后林嶧、林光世相继辟浚，西湖之名始著称。至明又名北濠。自湖为放生池时，湖



山实称银山，南宋以后始有西湖山之称耳。

《饶氏得姓考》一文引证的文献极多，更能体现先生“考据”的风格。关于饶氏得姓，唐以前之书皆云“饶，姓也”，而不云出自何氏，旧谱相承的说法是：

唐尧之后，食邑于平阳，因益食为饶，以平阳为郡望。

“旧谱”的意思是，“饶”本是“唐尧”的“尧”字，由于“食邑于平阳”，故增益“食”旁才成为“饶”字。其地“以平阳为郡望”。先生论证的方法是：

1. 典籍所载，帝尧之后未闻有封平阳以“饶”得姓者；
2. 《说文》训“饶”为“饱”，“饶”字从“食”得义来源甚早，不应于尧之子孙“食邑于平阳”才增益“食”旁；
3. 《路史》称“舜庶子七人，皆釐降于齐人：圭、胡、负、遂、卢、蒲、衡、甄、潘、饶、姚，皆其裔也。”则饶之出于舜，罗泌固已言之。
4. 古“平阳”之见于群书者有五，无一属于齐地。知饶氏之地望，无由出于平阳。
5. 结论：饶氏之始，旧谱谓出自唐尧，考之群籍，绝无征验；博稽典要，盖出于虞舜之后也。

文中1、2先否定旧谱，3、4乃建立新说，5为结论。全文征引群书达一十七种之多，探源究本，疏通证明，言之凿凿，令人叹服。所有这些，再次证明先生在《答某君书》中所说的：“文章之道，未有不读书而能工者也。”确是至理名言！以上仅就《文集》所见，略陈小学及考据之学在文章写作中的应用，至于上述温丹铭氏提到的《〈佛国记〉疏证》和《王右军年谱》二书，更是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对考据手段的运用就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因不属《文集》的范围，此从略。

### 三 力倡“征文考献”为当务之急

饶锷先生在《与蔡纫秋书》中力倡“征文考献”为当务之急。他说：

窃尝谓居今之世而言整理国故，涂径虽不一端，而一邑当务之急则莫先于征文与考献，其在吾潮尤不容或缓者也。盖潮之为州，北阻山而南滨海，于禹域为极南之地。当昌黎之未至，已有赵德之习儒，大颠之依佛。然稽之志乘，自宋迄清，吾潮人之以政事显者，代不过三数十人，至于文苑儒林之流，其文其学之足为世诵习者，更不数数。

先生进而分析说，究其原因，“良由士之长于斯土者，既限于耳目之濡染，又无大人先生为之推毂游扬，是以虽有班扬之才，许郑之学，而老死蓬蒿，名字不出里巷。”他举乾隆年间的陈于燠为例，陈著有《枕余偶摭》一书，小楷精抄积二十余厚册，其考据之精审，有足以望领亭林而抗衡伯厚者，使其书出而传布于世，亦《日知录》、《困学纪闻》之亚也。由此推之，“吾潮九邑前辈遗著之沉霾于荒丘委巷而未发者，当不止于是也”。先生屡向地方官建言“续修县志”和“刊布先哲遗书”，终得不到积极的回应，于是便细集见闻，勾稽排纂，成《瀛故拾遗》、《潮州诗征》数十卷。可见先生不但积极提倡，且身体而力行，着手收罗和辑集。

在《报郭辅庭书》中，先生还就重印先哲遗书的书目问题，申述自己的意见：

然仆以为吾乡先正遗书之宜刊布者，又不止《东涯》一集。今举其最著且要者，如郭忠节之《宛在堂集》、林提学之《井丹集》，是二书者，皆吾潮旧籍之灵光。惜乎传本绝稀，苟有任剗剔

之役，尤为不朽盛业。昔张文襄谓刊布古书为积善之雅，其人可五百年不泯灭，执事岂有意乎？

谈到刻书的版本问题时又说：

然刻书故宜求精，而所刻之书尤须审择，前年贵乡郑君有《龙溪精舍》丛书之刻，仆初闻之深为跃喜，及阅其目则殊失望。盖所采者类多习见之书，既非能如鲍氏、潘氏之选刻孤本、秘笈，又不能如丁氏、伍氏之蒐集乡哲遗书，以此用心未免耗费矣。

在刊布先哲遗书的工作中，对古籍的真伪辩证尤为切要。其中，有关大颠祖师《心经注解》一书的真伪问题相当典型而曲折，值得在此加以回顾。最初，郭辅庭执事从《续藏经》中发现了大颠祖师的《心经注解》，欣喜过望，正拟雕版印行，却因印光大师审定为伪书而作罢。而王弘愿居士曾在《灵山正宏集跋》中引及此书，亦以为伪书。然而饶锸先生对大师和居士的见解“则甚以为不然”。在此书中，他从四个方面申述自己的见解：（1）颠师有《心经释义》一书，载在志乘，流传已久，晚近与其他唐人解经一道从日本回流。颠师为一方大德，日人何苦为南方一大德作伪书？（2）夹山行辈虽较颠师稍晚，然年实相接。颠师寿九十有三，此书或其晚年所撰。不得以书中引夹山语作为伪书的确证；（3）永明之前禅宗玄觉、慧海诸师咸有撰述，即五祖、六祖亦同，岂彼诸书亦皆后人伪造？（4）以《注》中文意支离遽断其伪，此尤不可。盖书经千载，文字讹误固所难免，后人于此须加细心校读自明。先生最后指出：

总而言之，吾潮先哲文字之可考者莫古于赵德《昌黎文录》与此书，《文录》今已不传，而此书沉霾千载竟得再显于世，此其可葆贵宜何如也？……苟执事能将原本见贻，仆当别为精密之考证，以祛当世之惑也。

《报郭辅庭书》中所言有关辨伪的主要观点，详见于新版《潮州艺文志》308页“释家类”唐释（宝通）《多心经释义》目下之“鐸按”，从“按”文中可见先生日后并未见到原本，也未作进一步的精密考证。后来，饶宗颐先生特地作《大颠禅师与心经注》一文，言“先君著《潮州艺文志》，于释家类据卢说收入宝通此书，且尝与潮阳郭辅庭书札往还，讨论《心经》此注当为州人著述，当日印光法师则目为伪书。余于此蓄疑甚久，近日始敢言其是非。”根据饶宗颐先生的研究：

（1）日本《续藏经》第四十二函有《大颠心经注解》，明代《万卷堂书目》卷三著录，作《大颠注解心经》。按此书本题“大颠禅师了通述”，前有了通序文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解序”，正文第一行大字，称“大颠和尚注心经”，与“万卷”目符合，则此书作者应是“了通”而非唐代“宝通”。僧人每每同名，“大颠”亦其一例，“了通”与“宝通”同号“大颠”，原非一人。（2）了通此《注》，引用晚期禅家说甚夥（下引略），诸禅僧皆晚唐至五代间人，宝通无由采摭其说，故知“了通”必另是一人，非“宝通”明矣。综上所述，今按：此书从郭辅庭初定为州人大颠所注，到印光大师、王弘愿居士疑为伪书；饶鐸先生复据卢氏光绪《海洋县志·艺文略》论其不伪，又经饶宗颐先生据原书了通《序》文及“注”中采摭后世禅僧之说，进而论定《大颠注解心经》一书的作者是北宋的了通，而非唐代的宝通。因两人同号“大颠”而引起混淆。从此书之真伪辩证经历多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足证辨伪学问之深与论定之难；而饶氏父子具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更加令人叹服！

在“征文考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饶鐸先生的《潮州西湖山志》和由饶鐸、饶宗颐两先生合著的《潮州艺文志》，这两部著作专门罗集一山、一州的历代诗文、学术著作和地方历史文献，是表彰乡贤事迹，考究一方学术源流的集大成者，堪称吾潮“征文考献”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是潮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石。因此我们称饶鐸先生是潮学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 四 “作培养天才的泥土”

《文集》中保存着大量与饶氏家族有关的珍贵资料，对我们了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成长背景，特别是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环境有莫大的帮助。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饶锷先生是如何影响和培养自己的儿子成才的。

饶锷先生的父亲，是当时潮州首富，曾任潮州商会总理，潮州地区第一个善堂“集安社”就是他亲手创办的。饶锷本人既是潮州商界的巨子，又是岭东学界的饱学鸿儒。然而，他走的不是经商而是治学的道路，这对饶宗颐先生影响极大。天啸楼逾十万卷的藏书，伯父家中丰富的金石古董和书画碑帖，对幼小的宗颐先生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加上宗颐先生天资聪颖，勤勉好学，终日在知识的海洋浸泡吸吮。三四岁父亲教他读杜诗，背周敦颐的《爱莲说》，六七岁看的书比一般大学毕业生还要多。他富于幻想，童稚之年即撰写小说《后封神榜》，十岁遍看《史记》、《汉书》，能背《孙子、吴起列传》，十六岁作《咏优昙花》诗，一时惊众老宿，遂有神童之誉。正是饶锷先生笃志于学的精神，导引着宗颐先生走上治学的通途。

饶锷先生对宗颐先生的第二个影响是引导他掌握朴学的治学方法。宗颐先生出生时，长辈给他起了个吉祥的名字叫“福森”。饶锷先生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便更名为宗颐；又因为敦颐字濂溪而命宗颐字为伯濂。父亲的用心，是用先哲的名字来激发孩子的睿智，规划人生的奋斗目标，更用《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及“中通外直”来陶冶其做人的情操和品格。周敦颐主张“出佛入儒”，对儒道释都有精湛的造诣，这些对于宗颐先生幼年心智的开发，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饶锷先生不论在为法显大师的《佛学记》作疏证，还是编纂《潮州艺文志》，总让儿子在旁帮忙，诸如翻检群籍，核对资料，抄写稿子等等，“先君斟酌校陈编，每有所获，辄命写录，因得粗窥为学门径。”（饶宗颐《潮州艺文志序》）

父亲从事考证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便在不知不觉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宗颐先生常常对后辈说：“我现在用的这套办法，是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此处所说的“这套办法”，指的就是清人顾炎武、戴东原、段玉裁等朴学大家治经、治史的考证方法。

饶锬先生对宗颐先生的第三个影响是从地域文化的乡邦文献入手。饶锬先生一生“以振故学为职志，于乡邦文献尤为眷注”，（饶宗颐《天啸楼集跋》）“因有感于乡邦文献之凋残，又以郡县旧志于先贤简籍虽有载述，然多疏漏踳驳，不足以殫考证而资表彰，于是大索遗书，钩稽排纂，初拟补《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它邑。”（饶宗颐《潮州艺文志序》）正当先生大展宏图之际，不料却因积劳成疾，书未成而先生竟遽归道山。弥留之时，惓惓然以是书未成为憾。万幸的是，哲嗣宗颐先生继承先父遗志，发愤自励，订讹补遗，旁事搜讨，终于完成《潮州艺文志》一书，并于1935年和1936年连载于《岭南学报》第四、五、六卷上。别署：“饶锬钝盒辑，长男宗颐补订。”此书专门罗集潮州历代文人的诗文、学术著作以及地方历史文献，是表彰乡贤事迹，考究一方学术源流的集大成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随后，饶宗颐先生以弱冠之年应聘为中山大学通志馆研究员，开启他从韩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学术之旅。

记得1959年笔者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时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左联作家冯乃超先生为中文系55级毕业同学题词时写道：“我们许多人都想作‘天才’，但鲁迅先生却劝我们作培养天才的泥土。”如今人们都公认：“博古通今、东西融贯、学艺双携的饶宗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天才”。然而，当我们通读《饶锬文集》这部著作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饶锬先生正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作培养天才的泥土”的成功典范——这同样也是当之无愧的。

（原载《潮学通讯》2010年第2期，收入本书有所增益）

## “饶学”之根在潮州

人们期待已久的“饶宗颐研究所”，就在饶宗颐先生生长和工作过的地方——广东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隆重挂牌成立了。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笔者作为曾经受到饶先生栽培的潮籍后学，谨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众所周知，饶宗颐先生不但博古通今、东西融贯，而且学艺双携，是当今公认的世界级汉学大师。然而大师在学术和艺术上的成就，却是在故乡潮州奠下根基的。这是因为，童稚时期的饶宗颐先生即怀有与一般同龄人不同的奇志。

首先是出自祖先的热切期盼。

饶先生的祖先原在江浙一带，大概是到宋代理宗年间才离开。宋末因避战乱从福建进入广东，先在大埔落户。在大埔经过了11代，都在农村务农。12代以后转到潮州来，还是农民。13代后进城，开始做小生意，此后就慢慢地在潮州府城发迹、发达起来。到16代的少泉公，便已经是潮州的首富了，但仍没有机会读书，以致他在弥留之际深有遗憾地给子孙留下遗嘱。遗嘱中说：

我饶氏近世鲜有显达。我以少年遭家难，不克读书，使有光于乡族，今悔已无及矣。愿我后世子孙，不失读书种子，以绍先志，是余之所望也。（《先大父少泉府君行状》，见潮汕历史文化研

究中心编：《饶锬文集》，香港天马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8—109页）

正是少泉公出于光耀乡族的强烈愿望和丰厚的家庭资力，才出现了第18代饶锬先生这样“藏书万卷，读书千卷，著书百卷”的“读书种子”。到了第19代的饶宗颐先生，更是“显达于世”的“读书神童”了。少年时期的饶宗颐先生在父亲的“天啸楼”读书，一天可以读完几本书，读得很杂，如道家的书、医书，也涉猎不少佛书，最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封神榜》。当时他几乎没有同龄的朋友，倒喜欢跟老头子写信，与当时的书法界名流刘三、蔡守有书信来往，但他们都不知道当年与他们鸿雁往来的还是个不满20岁的人。有记者问：“先生读书可以做到‘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吗？”先生答道：“‘一目十行’可以做到，‘过目成诵’倒未必，但看过的书需要时能够找到，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常常有人好奇地问我，先生身边是不是有许多人帮他收集资料？为什么在他的著作里总是有那么系统翔实材料？据我所知，先生身边的助手是帮他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著作里的资料，都是先生脑子里装着的。

其次是出于父辈的精心引导。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方法和途径，是由饶锬老先生言传身教带出来的。这是老先生对宗颐先生的第一个影响。《饶锬文集》中保存着大量与饶氏家族有关的珍贵资料，对我们了解饶宗颐先生的成长背景，特别是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环境有莫大的帮助。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饶锬先生是如何影响和培养自己的儿子成才的。

饶锬先生的父亲，是当时潮州的富商，曾任潮州商会总理，潮州地区第一个善堂“集安社”就是他亲手创办的。饶锬本人既是潮州商界巨贾的公子，又是岭东学界的饱学鸿儒。然而，他走的不是经商而是治学的道路，这对宗颐先生影响极大。天啸楼逾十万卷的藏书，伯父家中丰富的金石古董和书画碑帖，对幼小的宗颐先生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加上他天资聪颖，勤勉好学，终日在知识的海洋中浸泡吸吮。三四岁时父亲



教他读杜甫的诗，背周敦颐的《爱莲说》，六七岁看的书比一般大学毕业生还要多。他富于幻想，童稚之年即撰写小说《后封神榜》，10岁遍看《史记》、《汉书》，能背《孙子、吴起列传》，16岁作《咏优昙花》诗，一时惊动众老宿，遂得神童之誉。正是饶锬先生笃志于学的精神，导引着宗颐先生走上了治学的漫漫长路。

饶锬先生对宗颐先生的第二个影响是引导他掌握朴学的治学方法。宗颐先生出生时，长辈给他起了个吉祥的名字叫“福森”。饶锬先生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便更名为宗颐；又因敦颐字濂溪而命宗颐字为伯濂。父亲的用心，是用先哲的名字来激发孩子立志超先贤、规划人生的奋斗目标，更用《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及“中通外直”来陶冶其做人的情操和品格。周敦颐主张“出佛入儒”，对儒、道、释都有精深的造诣，这些对于宗颐先生幼年心智的开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饶锬先生不论是在为法显大师的《佛学记》作疏证时，还是在编纂《潮州艺文志》时，总让儿子在旁帮忙，诸如翻检群籍、核对引文、抄写稿子等。正如宗颐先生在《〈潮州艺文志〉序》中所说：“先君斟校陈编，每有所获，辄命写录，因得粗窥为学门径。”就这样，饶锬先生从事考证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便在不知不觉中对儿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宗颐先生常常对后辈说：“我现在用的这套办法，是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此处所说的“这套办法”指的就是清人顾炎武、戴东原、段玉裁等朴学大家治经、治史的考证方法。

饶锬先生对宗颐先生的第三个影响是引导其参与编纂传承地域文化的乡邦文献。饶宗颐先生在《〈天啸楼集〉跋》中指出，父亲一生“以振故学为职志，于乡邦文献尤为眷注”，“因有感于乡邦文献之凋残，又以郡县旧志于先贤简籍虽有载述，然多疏漏踳驳，不足以殚考证而资表彰，于是大索遗书，钩稽排纂，初拟补《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它邑”（饶宗颐《〈潮州艺文志〉序》）。可惜的是，父亲正当大展宏图之际，却因积劳成疾，书未成而竟遽归道山。弥留之时，惓惓然以是书未成为憾。万幸的是，哲嗣宗颐先生继承先父遗志，

发奋自励，订讹补遗，旁事搜讨，终于完成《潮州艺文志》一书，并于1935年和1936年连载于《岭南学报》第四、五、六卷上，别署：“饶锷钝盒辑，长男宗颐补订。”此书专门罗集潮州历代文人的诗文、学术著作以及地方历史文献，是考究一方学术源流和表彰乡贤事迹的集大成者，也是对清代朴学精华遗产的最大继承，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随后，弱冠之年的饶宗颐先生被聘为中山大学通志馆研究员，开启了他从韩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学术之旅。

第三是源于潮州人文传统的熏陶。

青少年时期的饶宗颐先生没有到祖、父辈的商场里去经商，也没有成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而是成为一个走上治学道路的大学者。除了父辈对他的影响之外，潮州人文传统对他的熏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要特别提到三个人：韩愈、薛侃和郭子奇。韩文公一直是先生崇拜的偶像，其治潮的流风余韵，尤其是韩文的大气磅礴，更令他敬佩不已。他在中学里唯一学到的东西，就是从当年的古文老师王慕韩（弘愿）居士那里学到的“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一重要的法宝。这一点与他父亲主张的“从欧文入手”不同。先生认为，只有从韩文入手，才能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然后由韩入欧，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这确是作文的正途；要不然，一开始就柔靡，后面的文气就上不来了。只有从韩文入手，才能摆脱凡俗，做到老劲有力而独出机杼，这使他终身受用。

饶先生在20岁之前只为两位潮州先贤写过年谱，即《薛中离年谱》和《郭子奇年谱》。先生十分佩服薛中离（侃）的人格和气魄，认为中离之学“有入门，有归宿，一生气魄，百折不回”，实在令人感佩！郭子奇是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的政论文和纪事诗都非常出色，有《稽古篇》和《宛在堂集》传世，是晚明柱擎南天的重臣。清人俘虏他之后，许以高官厚禄，他坚决拒绝，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先生认为，这样忠贞刚毅的爱国情操，是值得表彰的。先生正是善于从潮州传统文化中吸取富有营养的成分，用先人的气魄、情操来浸润和陶冶自己的品格，才成就其高瞻远瞩、清朗明觉的高尚情怀。

至于作为“学艺双携”的有关“艺”方面的修炼，先生也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扎下牢牢的根基了。饶先生从6岁起就在父亲开的画馆里开始习画，在伯父家里既画山水又临帖。家里还有许多元刻本的古帖，使他有条件接触到碑体。书法从碑体入手和作文从韩文入手一样，是令他终身受用的。先生12岁即习诗赋古文，并师从杨棣先生学绘画。因为杨家收藏任伯年的画特别多，共有好几十件，先生差不多都临过一遍，因而对人物画已了然于胸，具有相当的素养，这就为后来编辑“敦煌白画”的画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之，虽然先生在潮州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其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良好修养为他后来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他后来成就为大学问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大师之根在潮州并不为过。

1996年8月，正当饶宗颐先生80华诞之际，“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在韩山师范学院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美国、日本、法国、荷兰、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共88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86篇，涉及先生研究的诸多领域，如哲学、宗教、考古、史学、目录学、文学、潮州学及书画等。会后有人提到“饶学”的问题，即把“饶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研究，但尚未普遍流行开来。究其原因，大概在姓名后缀以“研究”字样的比较常见，如“孙中山研究”、“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等，但在“学”字前冠以具体姓名的却比较少见。当然并不是没有。如对中国文字学的始祖许慎及其代表作《说文解字》之研究，既有称“许慎研究”或“《说文解字》研究”，也有统称为“许学”的，但并不多见，这是事实。所以，我认为把饶宗颐先生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把饶先生所从事和开拓的学科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既可以称为“饶宗颐研究”，也可以简称为“饶学”。如果我们把饶锬和饶宗颐先生超过一个世纪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看做一个整体来研究，那就非称为“饶学”不可了。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饶宗颐先生先后提出过“潮学”和“华学”的名称和概念，已经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认同并达成共识。现在应当在“饶宗颐研究所”和“饶宗颐学术馆”公开而鲜明地打

出“饶学”的旗号，使“饶学”成为与“潮学”、“华学”共同存在的相关学科，并着力把它建设好。根据笔者粗浅的理解，所谓“饶学”，是指汇通古今东西文化的学艺综合体。就学术这一层面而言，应包括先生所热心倡导和积极从事的“潮学”、“华学”和“东学西渐”三大板块。在“饶学”的学艺世界里，古今文化没有鸿沟，东西文明没有隔阂，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这是由潮州和香港两地的历史与地缘文化不断优化和升华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我们相信，加强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必将对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记得15年前，陈伟南先生在“饶宗颐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我觉得饶先生是一座高山，一座还在不断上升的山峰。在他的感召下，一定会在汉学和其他学科出现层峦叠翠的局面。这群山峰大多数肯定在通都大邑，著名学府；但潮州是我的家乡，韩师是我的母校，我希望这群山峰有些属于潮州、属于韩师。（《曾宪通主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80页）

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饶宗颐研究所”这座山峰已经在潮州、在韩师高高升起来了。我们祝愿这座正在升起的山峰能够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研究“饶学”、传播“饶学”和发展“饶学”的重要基地，用雄辩的事实向世人昭示：“饶学”之根在潮州！

（原载《饶宗颐研究》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封面题字：饶宗颐

出 版 人：詹秀敏

特邀编辑：陈韩曦

责任编辑：詹秀敏 李 谓 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王 越

1980年，饶宗颐（选堂）在成都参加第三届古文字学术研讨会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历时近三个月，一共走访了十一个省市，参观了三十三个博物馆，接触到大量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

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一年，获得很多的知识，至今不忘。很多人在一生中都有很多的奇迹。我那一年的健康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从欧洲一直到日本和中国，持续不停地走，精神一直都很好。所以说有一些东西是天给的，假如有上帝，可能是上帝赋予我的一种体力吧。

——饶宗颐

上架建议：名家 学术



定价：58.00元